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格拉底传/(英)泰勒,(奥)龚珀茨著;赵继铨,  
李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ISBN 7-100-02750-0

I. 苏… II. ①泰… ②龚… ③赵… ④李… III.  
苏格拉底(前470~前399)-传记 IV. K835.45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9329 号

SÙ GÉ Lǎ Dǐ ZHUÀN

苏 格 拉 底 传

[英] A. E. 泰勒 著

[奥] Th. 龚珀茨

赵继铨 李真 译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2750-0/K·584

---

1999年11月第1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1999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6 1/2

印数 5 000册

定价: 10.00元

# 目 录

## 苏格拉底传 ([英]A. E. 泰勒著)

第一章 导言	3
第二章 苏格拉底的早期生活	20
第三章 苏格拉底的晚期生活:对他的审判和处死	55
第四章 苏格拉底的思想	82
书目说明	110

## 希腊思想家 ([奥]Th. 龚珀茨著)

第三章 苏格拉底的生活与工作	115
第四章 苏格拉底的教导	135
第五章 苏格拉底的结局	159
附录 苏格拉底(第欧根尼·拉尔修)	186

# 苏 格 拉 底 传

[英] A. E. 泰勒 著



## 第一章 导言

一位伟人的一生，特别是在相隔多年之后，就再不可能仅仅是一部无可争辩的事实的记录了。即使当那样的事实是丰富的，而传记作者的真正职责是对它们解释的时候，他也必须洞察它们所透露的纯粹偶然事件背后的目的和性质，并且只能以创造性的想象来做到这一点。至于两位给与人类生活的影响最深的历史人物——耶稣和苏格拉底，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异常地缺乏；也许对于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来说都只有一个陈述，对于这个陈述，一个人，除非他被视为疯子，是不可能加以否认的。耶稣“死于庞提乌斯·彼拉特(Pontius Pilate)<sup>①</sup>之手”，这是可靠的。苏格拉底在“拉各斯(Laches)作执政官的那一年”(公元前399年)被指控为犯了不敬神的罪而在雅典被处死，这同样是可靠的。超出这样一个陈述的任何其他叙述必定是一种个人的构想。因此，甚至这个不加铺张的素描，也必须对于它的作者引出他自己构思的材料的资料来源，以及引导他运用这些材料的原则，首先作出某些说明。

苏格拉底自己没有留下他自己的思想和活动的记录。他没有留下这方面的记录，是由于他所处的那个社会的性质的直接的后

---

<sup>①</sup> 庞提乌斯·彼拉特是公元一世纪时统治犹太地区(Judea)的罗马帝国的地方长官，是他下命令将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加以处决的。根据其拉丁文原名又译为庞提乌斯·彼拉多。——译者

果。虽然他的生涯中我们知道得最多的那一段,即他的老年时期的生活,延伸到一个不寻常的和不那么愉快的时刻,但是苏格拉底是在伯里克利<sup>①</sup>伟大时代诞生和成长的人;实际上,在那位政治家死的时候,他已是一个年过40的人了。雅典人在那些自由自在的日子里没有写书;那是伟大悲剧的时代,而不是散文文学的时代。因此,除了某一个别的有启发性的(但并不是绝对无疑的)暗示以外,我们没有关于苏格拉底在接近50岁以前的任何言论和活动的同时代的记录。当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和阿米卜西亚(Amipsias)这两位著名的喜剧诗人,由于某个原因都选择他作为他们关于公元前423年的时事滑稽剧抨击的对象时,他已经或者超过47岁了。两年之后,第三个喜剧作家欧波利斯(Eupolis)又照此办理,把他作为抨击的对象。我们还拥有阿里斯托芬的光辉的讽刺剧《云》,虽然在描述中也许被作家润色,但是它是唯一的在苏格拉底生前同他有关的文献。

对这位哲学家的审判以及处死所造成的深刻影响立刻导致整个文学作品的创作。曾经受过他影响的年轻人在这些作品中试图描写他的人格和谈话,以保持对他的记忆。这些记述大多数已经消失了,但是我们还有给人深刻印象的一系列对话。在这些对话中,柏拉图使苏格拉底成为中心的人物。我们还有色诺芬(Xenophon)创作的、为导师辩护的《回忆录》,以及也是出自他的手笔的一、二篇同一类型的、分量不大的著作。我们还有第三个同时代的、斯菲图(Sphettus)的埃斯克勒(Aeschines)的几页苏格拉底

---

<sup>①</sup> 伯里克利(Pericles,公元前495—前429年),是雅典的著名政治家。在他担任雅典执政官时,正是雅典最强盛的时期。——译者

的对话。显然,这一些是关于这个哲学家的任何描述的主要资料。问题是要懂得处理它们的正确方法。重要的在于记住:所有这3个作者比他们的主人公年轻许多岁。柏拉图比苏格拉底约年轻43岁,色诺芬差不多肯定还要年轻几岁,尽管我们没有埃斯克勒的确切时期,但是粗略地说,他是和他们同时代的<sup>①</sup>。因此,这3个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提供有关苏格拉底55岁以前的值得信赖的回忆。当他们告诉我们有关他的鼎盛期或者早期生活的任何事情时,他们所说的不是根据直接的了解<sup>②</sup>。

传记成为一种公认的文学体裁仅仅在公元前3世纪(公元前300—前200年)时才在希腊人中间出现。这种传记文学是亚历山大里亚时期的特征。像诗人一样,哲学家在那个时期成了读者大众好奇的对象,并且,一批作家用他们的写作来满足这种好奇心。这样产生出来的作品已经消失了,但是在一位名叫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的作者写的《哲学家的生平》(Lives of Philosophers)中把他们的材料给我们保存了下来。这本书最后形成的时间大约在公元200年。在这部著作中对于苏格拉底的记

---

① 苏格拉底生于公元前469年或者更前一些,柏拉图生于公元前428或前427年。在公元前401年,当在后撤的10个千人团的将军中选出一个将军来的时候,色诺芬认为他自己由于极其年轻而严重不利(《远征记》Ⅲ, i. 25)。因此他似乎不是生于公元前大约426年或425年以前。埃斯克勒被柏拉图提到时(《申辩》33e)还是一个年轻人,他的父亲曾被苏格拉底的原告们请来作证人,以表明他们是否真正地相信哲学家“败坏”了他的儿子。他是3人中在苏格拉底死亡时唯一的在场者(《菲多》59b)。柏拉图(同上)处于病中,而色诺芬因在“亚洲某地”而缺席。

② 因而当柏拉图在《泰阿泰德》中告诉我们,这位对话中的年轻主人公(后来他是柏拉图学园中最卓越的数学家)给苏格拉底在其生命的最后一个月中留下的印象时,他写的是他熟知的事情。当他描绘苏格拉底早年同巴门尼德和芝诺会见时,他是在处理他自己出生前20年以上的事件。

述,作为生活在托勒密(Ptolemies)时期和稍后的文人关于这个主题所知道的或猜测的主要的有永久价值的东西而保留下来。当然,它保存了某些具有巨大价值的陈述,它们由保证其真实性的早期作者的名字所证实。但是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传记作者的批判性标准是不高的。他们的公众更多的不是要求准确,而是要求生动有趣的轶事、丑闻和机智的反驳,而作者必须研究他的公众的口味。再者,这个时代的作者在确定有关一个公元前第5世纪的雅典人的生涯的事实方面,也并不是处于很有利的地位。资料是贫乏的,而且由大量未经解释的、顺便的暗示所组成,常常充满某些喜剧中的有关主题的笑料,而它的意思对于我们和对于亚历山大里亚时代的人一样是晦涩的。在那样的条件下编纂传记,决不能期望对于任何一个人的人格有更好的理解,至少是对于一个像约翰逊博士<sup>①</sup>那样,在他自己生活的时期已经成了传奇的中心人物是如此。因此为了郑重起见,我们对于苏格拉底的叙述,几乎完全依靠能够说出对他直接了解的人,就是说,主要依靠阿里斯托芬、柏拉图和色诺芬。

我们依赖这些作品中的任何一个陈述或者所有陈述到什么程度呢?如果被19世纪广泛采取的某些理论是合理的,那么依赖它们之中的任何一个将是轻率的。阿里斯托芬被说成是一个喜剧诗人,他的工作不是说真实的东西,而是歪曲它。他的苏格拉底与色诺芬和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之间的区别是这样的清楚,以至我们不能把它们当作同一个来源的肖像。要么诗人和他的读者必定不知

---

<sup>①</sup> 约翰逊(Samuel Johnson, 1709—1784年):英国著名的词典编辑者和作家。——译者



道他的剧本中表面的主人公,要么他的对象很可能与实际人物的漫画是有所不同的。他的讽刺作品很可能不是指向个人而是暗示一种“倾向”,我们必须把他的苏格拉底看作像莫里哀的答尔丢夫<sup>①</sup>那样,仅仅是一个想象的典型,他对这个典型添加一个特殊的同时代人的姓名作为标记,而不在乎他的选择的恰当性。无疑,柏拉图具有深切的了解和戏剧的天赋,这些了解和天赋使他能够描绘出一幅忠实生动的情景。但是一般的看法是,他的目的不是一个肖像画家的目的。他所描述的苏格拉底或者是一幅关于一个大哲学家应该是什么样的幻想的图画,或者是一个代表他自己的“面具”。这一点是由假定柏拉图和色诺芬之间说法的不一致来证明的。色诺芬的苏格拉底是一位杰出的、而且简直是啰嗦的、具有良好常识的道德的说教者,对于非实用的思辨和“无用的”科学,具有明显的厌恶<sup>②</sup>。柏拉图的苏格拉底是一位幽默家和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具有深刻的形而上学信念,并且对于他的时代的最高科学有着广泛的了解。因此,人们假定:天才、幽默、形而上学是柏拉图灌注到他的图画中去的;它们是伪装起来的自我显示。<sup>③</sup> 首先,我们会作出这样的推论:获得有关苏格拉底的历史事实的真正途径就是把我们的信赖寄托于色诺芬以及采用他的陈述去把柏拉图的对

---

① 答尔丢夫(Molières Tartuffe):法国剧作家莫里哀所作同名喜剧中的伪君子。——译者

② 无论如何,我们将会看到,关于这一点的通常的陈述忽略了色诺芬自己的某些非常有意义的段落。

③ 特别是有人主张(而且现在仍然是很普遍的看法),作为一种自明的设定,在《菲多》和《国家》中讲到的所谓“理念论”肯定是在苏格拉底死后和写成《菲多》以前柏拉图他自己的创造。因为对话描绘苏格拉底在死的那一天好像是谈论他早年所已经提出的看法一样谈论这个理论,所以,如果这种见解成立的话,它就将证明柏拉图告诉我们的有关苏格拉底的任何事情都是完全不值得相信的。

话中的伟大人物还原为平凡的人物。(19世纪著作家有关“历史的苏格拉底”已经说得很多,实际上指的是柏拉图笔下的剔除了他的天才的苏格拉底。)可是,进一步的探究表明,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色诺芬自己充当一个证人的能力是有困难的。从他自己的著作中,看不出他与苏格拉底有特别亲密的关系。当他最后一次看到这位老师的时候,看来好像可以肯定,他不可能在24岁以上<sup>①</sup>。无论如何,当苏格拉底受审和判刑的时候,他已在亚洲遥远的地方了。他自己关于苏格拉底的作品必定是他后来回到希腊之后在各种间歇之中写作的。那时他生活在被雅典放逐的情况下,而且没有更多的机会询问苏格拉底集团中幸存的成员。在某些著作中,他把自己对农业和乡村生活的显著兴趣,赋予众所周知的热爱城邦的苏格拉底,以力图考验我们的信念,而且它们之中最值得重视的《回忆录》,也由于它具有公认的“辩护的”目的这个事实,而进一步地被推到了不可信的境地。还要指出:有充足理由认为,色诺芬为了弥补他自己也许不是很强的记忆之不足,用他过去曾经常常加以“对照”的柏拉图对话作为他描写的素材。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于本世纪初在许多第一流的学者中间有着一种倾向,他们对任何“历史的苏格拉底”的认识的真正可能性完全持怀疑主义的态

---

<sup>①</sup> 色诺芬自己于公元前401年离开雅典去参加居鲁士王子(Prince Cyrus)的远征队之后没有再看见过苏格拉底,这是可靠的。甚至我们不知道在这以后至公元前394年他被放逐以前他是否还回到过雅典。柏拉图告诉我们很多关于苏格拉底集团成员的事情,但是从来没有提到过色诺芬的名字,从这个事实也许可以推论出,他跟苏格拉底从未有过很亲密的关系。另一方面,埃斯克勒把可能是我们的作家的色诺芬引进他的对话《阿斯帕西亚》(Aspasia)中。可是学者们对此的识别感到有困难。(这个困难是:埃斯克勒的色诺芬是一位已婚的年轻人,而我们没有我们的色诺芬在他的生涯中这样早的时期已经结婚的证据。)

度<sup>①</sup>。这种不可知论对于历史学家总是一种令人伤感的最后一手；就苏格拉底的情况而言，如果我们根据某种可靠的一般原则谨慎地去阐明我们的证据的话，那么很幸运，还有一条出路。

让我们从阿里斯托芬和他的喜剧家伙伴们的证据的价值这个问题开始。首先我们必须牢记古老的阿提卡喜剧完全是对个人的嘲弄，不是讽刺那些概括出来的社会“典型”。讽刺的对象应该是一个众所周知、声名狼藉的人，这对于喜剧家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们可以完全确信，当阿里斯托芬抨击苏格拉底时，苏格拉底已经是一位众所周知的人物了，而且这位诗人把这个讽刺剧的微妙之处当作是观众会清楚领会到的某种东西。我们还必须记住一般的原则，那就是成功的讽刺一定要根据众所周知的事实，或者被认为是如此的东西<sup>②</sup>。为了喜剧的效果，它不得不对某事加以歪曲，但这件事又不是讽刺家的纯粹的虚构。这样，当阿里斯托芬在他的戏剧中把苏格拉底表现为好像一个正规的“学派”的首领作为它的主要之点时（这个学派把自然科学跟我们称作“唯灵论”的东西结合起来），要是我们把他对任何事情的描写都看成像它们的“表面价值”那样，那我们可就太愚蠢了。但是如果我们不问我

---

① 他们中最卓越的第尔斯(Diels)说，他像一个“未知的 $x$ ”。（我的这个陈述的直接根据是第尔斯给一位英国学者的未发表的信。）我并不相信现在已被破除的观点，即亚里士多德关于苏格拉底思想的偶然说到的议论能够作为色诺芬和柏拉图两人的“对照物”。当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来到雅典时，苏格拉底已经死去30多年了。我认为我自己和其他人已经证明，他在任何时候说出的关于这位老哲学家的话没有不是他从柏拉图的对话中学来的（我对此是深信不疑的）。（参看C.里特尔：《苏格拉底》第83页。）

② 《云》在舞台上并不成功，虽然我们从柏拉图的《申辩》中提到它，看出在苏格拉底生活的晚期，它在文学上已是著名的了。但是它原来不成功的理由，在我们现存这个剧本的文字中，已被阿里斯托芬自己公正地指出了；它既不包含粗鄙的胡闹，也不包含淫猥下流的东西。

们自己：什么是解释这个讽刺剧的真正的事实，以及我们是否不能辨别由柏拉图或色诺芬告诉我们的、从不同的视角重新表现出来的这些事实，那么我们就将是同样的愚蠢。

其次，阿里斯托芬作品中的苏格拉底及其“学生”和“思想作坊”，跟柏拉图的（或色诺芬的）苏格拉底以及他对于愿意听他讲话的每一个人的“使命”之间，确实是一个鲜明的对比。但是当我们记得阿里斯托芬按照他曾经是，或者按照被认为他曾经是的那样去嘲讽苏格拉底的时候，那时柏拉图和色诺芬都不过是婴孩，我们将会看到这个对比可能会极大地由于这个日期上的差别而加以说明。45岁的苏格拉底在某些方面是一个跟55岁或60岁的苏格拉底有区别的人，可以被证明是个事实；而且这个明显的事实实际上由柏拉图和色诺芬他们自己的著作提供出来了，如果我们特别留心阅读它们的话。虽然我希望始终保持小心翼翼，但是为了这个概述的目的，我将相应地利用阿提卡喜剧中的证据。

当我们进而考虑柏拉图和色诺芬他们两人之间的真实的或被断言的差别时，很可能立即给我们的印象是：这些差别常常不适当地被夸大了。除了一、二点细节以外，色诺芬关于苏格拉底在任何事情上都没有说过和柏拉图告诉我们的在形式上相矛盾的东西。他所作的是把一些事情省略了，或者使它们降到平凡的地位。他为我们提供的资料范围是有限的。相当完备地编写他的主人公的、从早年到晚年的传记，只运用柏拉图的材料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根据色诺芬提供的更加贫乏的资料去写那样的记述是完全不可能的；<sup>①</sup> 尽管仔细地阅读将常常提示我们，他偶然地也证实了柏

---

<sup>①</sup> 在1917—1918年《英国科学院院报》(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的一篇题为《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传记》的文章中，我曾试图对这一点详细地予以说明。

拉图的某些最富有特色的断定。再则，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肖像的鲜明个性在色诺芬那儿全都看不见了，他忽视了使得柏拉图的主人公成为一个“原型”的大多数特色。例如，苏格拉底的“嘲讽”，或者他的特有的幽默，和他的独特的“苏格拉底式的怀疑”态度，都是我们唯一地从柏拉图那儿了解到的。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对任何事情都没有怀疑，而且说话也不幽默。当然，这样的解释是可能的：苏格拉底是一个普通的人，是柏拉图把他变为一个第一流的人物，认为他有个性，而实际上这种个性是属于柏拉图自己的。<sup>①</sup>但是假设这个实际的人（即苏格拉底）具有柏拉图加之于他的惊人的才能也同样是可能的，而且在色诺芬的比较单薄的素描中缺乏这些，是由于缺少完善的洞察，或者由于作者缺少戏剧的能力。这个平凡的个性也许是作者的个性，并不是他的主人公的个性。我们还必须记住色诺芬的《回忆录》公开宣布的目的要求他以平凡的见解描述苏格拉底。虽然这本书缺乏构思的一贯性，显然是零零碎碎地构成的，但是它的总的特征是由表现为一个正式的申辩或辩护这个事实所决定的，因为苏格拉底反对造成对他的审判的指控。色诺芬的目标是要争辩，按照他们自己的前提，那些发现苏格拉底犯了漠视宗教和引诱“青年”犯错误的罪的法官们犯了错误；他是用虔诚来标榜自己是所有他的起诉人的真正的样板，而且他实践的和谆谆教海的这种道德恰恰是普通的有教养的雅典公民期望显示于他自己的一生，并且要影响他的儿子的，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

---

<sup>①</sup> 例如，不止一部论柏拉图的优秀著作都因为假定在《会饮》中的苏格拉底的精彩的画像是代表柏拉图的心理上的自我揭露而被弄糟了。不论它真的是那样还是不是，至少它不是它声称的那样的。

的话。当然,这是清楚的,如同伯奈特<sup>①</sup>曾经说过的,那样一个辩护的失败恰恰是因为它太成功了;假如苏格拉底曾经是色诺芬要我们相信的那样,他就不会被控告了。色诺芬的辩护目的是绝对地需要他竭尽所能地隐藏他的角色性格中本来具有的任何特征,因而挫败呆笨的和持常规见解的读者。因此在读他的叙述时我们决不能忘记应用于所有这类争论的原则,即辩护士的最有价值的陈述恰恰是对那些和他提出的情况不相容的东西的偶然的承认。例如,当色诺芬在一段话中顺便说到苏格拉底曾经在某个时期很有几分像一群研究科学的学生的首领这个事实时,他就破坏了他自己辩护的理由<sup>②</sup>;在另一段话中说到苏格拉底拥有先进的几何学和天文学的知识<sup>③</sup>;而在第三段话中说到国外的毕达哥拉斯派曾经都是他的亲密的交往者<sup>④</sup>;而这给了他在所有这些点上的证据以特殊的意义。即使我们假定色诺芬在这里的描绘是依据柏拉图的对话,譬如说《菲多》(他肯定读过这篇对话),那么,他会这样做就证明他看到柏拉图的描写和他知道的苏格拉底是一致的。如果我们按照刚刚提到的注意之点去阅读色诺芬,那么我相信就会发现他对这位哲学家的考察,任何地方都没有同更详尽的柏拉图的叙述有重大的抵触,而且有时以引人注目的方式进一步地证实了它。

我们还必须而对主要的异议,这个异议曾经导致反对柏拉图的对话,即认为它对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的生活和思想的描写不

---

① 伯奈特(Burnet):英国著名古希腊哲学学者。——译者

② 《回忆录》I . vi. 14。

③ 《回忆录》IV . vii. 2—6。

④ 《回忆录》I . ii. 48。

是忠实的。显然,没有柏拉图我们就没有苏格拉底的连贯的传记资料,而没有苏格拉底的连贯的传记资料就将抛弃对他的人格提供任何说明的东西。柏拉图提供给我们一幅他的对话的中心人物的非常完满的、生动的和始终如一的图像,这也是真的。但是这本身并不证明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自始至终不可能像奥赛罗<sup>①</sup>或者福斯泰夫<sup>②</sup>那样是一个创造性想像的产物,而且很多人仍然持这个看法,尽管它不像50年前那样自信地主张它是这样的。难道我们能提出一个充分的理由去否定这个曾经一度被普遍接受的信念吗?对这一点作详尽无遗的讨论将需要整整一卷的篇幅,但是我在这里可以指出主要的需要考虑之点,它们在我看来是有决定性意义的<sup>③</sup>。

首先,最近50年或60年来学者们的仔细研究,如刘易斯·坎贝尔(Lewis Campbell)、康·里特尔(C. Ritter)、卢托斯拉夫斯基(Lutoslawski),以及其他人的仔细的研究,确定地证明了某一组重要的柏拉图对话(《智者》、《政治家》、《菲里布》、《蒂迈欧》、《法律》),由于他使用的词汇和文风的显著的特色,标志着它们必定晚于这位哲学家的其他作品,而且明显地属于他的生命的靠后的时期,在这期间他是一个有组织的、具有它自己很明确的学说的学派

---

① 奥赛罗(Othello):莎士比亚悲剧剧名和该剧的主人公。——译者

② 福斯泰夫(Falstaff):莎士比亚剧中一个肥胖、快活、滑稽的角色。——译者

③ 在缺乏这样一卷书的情况下,我将向读者首先推荐伯奈特教授的某些著作,特别是在哈廷斯(Hastings)的《宗教和伦理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of Religion and Ethics)第六卷中的条目:“苏格拉底”,他编定的版本《菲多》(牛津,1911年)的导言,以及《希腊哲学》第一部分《从泰勒士到柏拉图》(1914年),第八章,“苏格拉底的生平”。另外还可以进一步参考卓越的柏拉图学者康斯坦丁·里特尔最近的优秀著作《苏格拉底》(杜宾根1931年)。在早期著作中,伊伏·布隆斯(Ivo Bruns)的《希腊的文学画像》(1896年)是非常好的。

的首领。显然,比起大部分的柏拉图对话来,写作这些作品已是生命的晚期了。在这个较大部分的柏拉图对话中有一、两篇,如《国家》、《菲德鲁斯》(Phaedrus)、《泰阿泰德》等,从文风的特点看起来,似乎是处于转变的时期。因而学者们的一般看法是大量的柏拉图对话必定是在柏拉图确定地建立他的学校——柏拉图学园之前创作的;《智者》—《法律》这一组对话则是在学园本身肯定地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机构建立起来之后创作的;转变时期的作品或者是在它最初建立的时期,或者是在它存在的最初 10 年期间创作的。<sup>①</sup> 现在,在所有早期的对话中,苏格拉底总是辩论的中心人物和领导者,我们发现在《智者》开始的这一组对话中,这个情况完全改变了。在这些最晚的对话中唯一的一篇(《菲里布》,它讨论伦理和道德心理学方面的问题)是苏格拉底为领导人。在《智者》、《政治家》、《蒂迈欧》中,他是在场者,但是在对话中没有扮演什么角色,而在《法律》中他是完全被省略了。有关《智者》和《政治家》的逻辑的和政治的学说是通过一个不知名的来自埃利亚的客人陈述的,《蒂迈欧》的物理理论是通过一位意大利的毕达哥拉斯派[人士]陈述的,《法律》的大量的法律条文是通过一位不知名的雅典人陈述的。除了伯奈特提供的说明外,我看不出这个方法上明显变化的理由。伯奈特认为,柏拉图的历史意识,不允许他使苏格拉底成为柏拉图所熟知的他自己和他同时代人的哲学的和科学的兴趣

---

<sup>①</sup> 这个学园(欧洲的第一所大学)创立的确切日期不知道,但是它不可能是在柏拉图 40 岁(公元前 388—前 387 年)以前,也不可能是在这以后许多年。《泰阿泰德》已经清楚地表明写于公元前约 368 年,而且必定是“转变时期”的一组对话中最迟的,如同《国家》是它的最早的一篇对话一样。(就我个人而言,我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国家》实际上必定是写于或者刚好在学园建立的前夕,或者在学园建立没几年内)。“晚期”对话,即从《智者》到《法律》,完全可以肯定是在公元前 360 年以后才写成的。



和学说的解释者。我想,在这里我们有确实的证据,柏拉图不用苏格拉底这个人物作为他自己的“面具”,或者作为“哲学家”应该成为的想像的典型。如果他曾这样作过,那么就没有可以理解的理由,说明这个游戏为什么不应当这样无限地保持下去。我们可以正当地推论,在柏拉图描写有关苏格拉底的更多的对话中,那位哲学家处于中心地位的图景,柏拉图至少是意识不到有任何背离历史的真实之处的<sup>①</sup>。

其次,在柏拉图的早期作品中有一组对话,在那里任何其他目的似乎都被排除了。它们是涉及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和处死的情况的《欧惕弗罗》、《申辩》、《克里托》、《菲多》。这个案件是一桩轰动一时的案件,我们可以从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在他的《布斯里》(Busiris)中论著作家波吕克拉底(Polycrates)和他在一本小册子中对于起诉的论点的责难,看到这一点。可以肯定,柏拉图的《申辩》必定在审判的那几年里流传着,而且必定被实际的审判员中的多数读到,同样被许多曾经是听众的人们读到。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错误的描述对于他的作者会是自取灭亡,而且我们可以推论,柏拉图借他老师之口说出的那个特有的“辩护”(实际上是一种对

---

<sup>①</sup> 在这方面,应该特别提到《蒂迈欧》19b以下各页这一值得注意的段落,在那里苏格拉底不得不承认他自己对描述一个城邦从事战争或者外交活动的情形无能为力,而且似乎把这种缺陷归之于他的政治经验的缺乏。在《国家》中没有任何像这种意义的对苏格拉底的限制。在《菲里布》中苏格拉底作为领袖人物的再现是由下述事实来说明的:正如《高尔吉亚》(Gorgias)一样,它所处理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与早期著作曾经处理过的一样的。当然,它并不是提出所有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对话都是像被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 1740—1795年:苏格兰律师,萨缪尔·约翰逊传记的作者。——译者)记录下来的实际谈话的准确的报道,尽管它们中的某些对话很像根据的是实际谈话。这仅仅意味着这些对话想要表现一幅真实历史人物的境遇、兴趣和观点的忠实图画。

抗),就它的主要特征来说,是实际上说过的话的一个复制品。真的,现在很多方面已经为大多数具有重大影响的著名学者(例如,里特尔和威拉莫维兹-莫伦多夫)所承认。但是我和伯奈特认为,我们必须出自一贯性而向前跨进一步。同样的考虑以同等的效力适用于《菲多》,适用于它的有关苏格拉底生命最后时刻的描写。柏拉图告诉我们,他自己由于一场疾病而不在场,但是我们知道,根据他本人的一位亲密的学生提供的证据<sup>①</sup>,他和苏格拉底集团的其他成员,在苏格拉底被处死以后,实际上立即前往麦加拉,与哲学家欧克里德在一起达若干周之久,而欧克里德是《菲多》中参与谈话的人物中的一个。这样,柏拉图必然得到了这一值得纪念的日子的有关事件的一些目击者的详细信息,这是无疑的。同样可靠的是,当《菲多》流传的时候,引进到对话中的许多(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作为旁观者或是对话者的人都还活着(例如,欧克里德本人和主要对话者之一的西米亚斯)。柏拉图竟然能够在这样一个主题上故弄玄虚,甚至在面对人们必然察觉的情况下,他还是希望这样做,这是我难以理解的。除非《菲多》是故弄玄虚,否则,立即会得出,它的主要学说(即所谓“理念论”,它被描写成苏格拉底在他青年时期所确立的学说,并且为所有他的听众所熟悉),就真的是苏格拉底的原则,而不是柏拉图的发现了。如果事情是这样,那么,相信柏拉图在这些对话中随意对待历史真实的假定的理由就消失了,而且没有什么东西阻止我们去接受最直接地由它们的内容提出的看法,即它们的直接目的不是提出它们的作者本人的

---

<sup>①</sup> 在《第欧根尼·拉尔修》第三卷第6节中引证了赫尔谟多洛(Hermodorus)提供的事实:“在28岁的时候,他(柏拉图)和其他苏格拉底派人士撤退到麦加拉的欧克里德那里。”(同上,第二卷第106节也有同样的陈述。)

学说,而是保存一个没有留下它自己的文献的伟大思想家和伟大时代的回忆<sup>①</sup>。

其实,真理似乎是这样的,柏拉图像康德一样,也是一个仅仅在中年之后达到最独特的个人见解的哲学家。在他是一个具有一种学说和他自己的一个学派的哲学家之前,他是一个伟大的戏剧艺术家,他运用他的戏剧才能使得苏格拉底和他的集团对于与他们同一代人来说是栩栩如生的。如果没有柏拉图,对于这些人来说,苏格拉底等人不过仅仅是一些名字罢了。当他写这些伟大的戏剧性的对话时,他很可能还没有他自己的“学说”,而当他有了一种“柏拉图哲学”来传授时,他的戏剧力量就已经削弱了。显然,我们必须记住,柏拉图是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苏格拉底对话的创造者<sup>②</sup>。如果他的目的首先是灌输他自己的哲学,那么为什么他必须选择这样一种表达方法,就是不清楚的了。为了这个目的,在作者自己之前的一代人中的众所周知的人物之间的对话,将会是一个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手段。但是如果柏拉图的目的首先是保持对一个伟人和一个伟大时代的生动的记忆,那么我们会立刻明

---

① 有时人们假定亚里士多德说过“理念论”不为苏格拉底所知,这是不真实的。即使他曾这样说过,也不过是他自己的一个推论。亚里士多德常常把这个理论和柏拉图的名字以及它的追随者联系起来,这是真的。在有一段文字中(《形而上学》,1078<sup>b</sup>11),他说到“那些最早说有形式(或理念)的人们”,他可能是指柏拉图(尽管这是不确定的)。因为这个理论由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对话确定地引进了哲学文献,这样一个表达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自然的。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陈述(1096<sup>a</sup>13),即这个理论是由亚里士多德的“朋友们”引进的,什么也没有证明。苏格拉底的一种学说大概是一种在一个团体中共同主张的学说,对于这个团体,柏拉图的任何学生都会“友好地”说到它。

② 下面这一点是可靠的,或者几乎是可靠的,即:色诺芬的所有关于苏格拉底的著作迟于柏拉图的大多数“苏格拉底的”对话。同样的情况,对于埃斯库勒的对话,就其能够被发现的看来,这一点同样是真实的。

白为什么他想发明这种最适合于他的目的的特殊文学形式。

人们会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柏拉图要创作这样多和如此精心写作的作品，如果珍藏在它们之中的这个思想在所有主要特征方面都是别人的。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他生活在（作为他透彻地了解的）一个“战后的”社会中，这个社会保持着它自己时代的伟大。用想象力重新塑造 5 世纪这一伟大时代的主要思想家及其集团（这个集团是他曾在其中活动过的），立刻成为对苏格拉底、对被毁掉的雅典的光辉，也附带地对柏拉图所属的那个著名的雅典门第的一种虔诚的责任，以及对于个人伤感的逃避（这种个人的伤感是柏拉图在“第七封信”中表明过的）。人们经常忘记，没有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对话的证据，对于这 60 年左右的精神生活，我们真正地会一无所知。从打退薛西斯<sup>①</sup>到尼克亚（Nicias）的和平，这段时间恰恰是阿提卡历史上最生气勃勃和辉煌的时期<sup>②</sup>。事实上，历史学家们经常在他们的作品中引用这些对话来描述这个伟大时代的精神活动，但如果柏拉图可能被怀疑玩弄历史真实，如同在他有关苏格拉底的陈述中他经常被说成是这么干的，那么这些历史学家就失去了这样做的权利<sup>③</sup>。他的文学方法的理论（它自己的信奉者们都经常地加以忽视）就简直不像是一个健全的理论。

这样，以下有关苏格拉底的考察所依据的假定是：柏拉图关于

---

① 薛西斯（Xerxes，公元前？—前 465 年），波斯国王。——译者

② 这一点在伯奈特的遗著《柏拉图主义》（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28 年）一书中以一种特殊的影响提了出来，参看第 5 页及以下各页。

③ 每个历史学家在陈述有关“智者的时代”时，就其所说的大多数话来说，依据的是柏拉图的对话，像《普罗泰戈拉》和《高尔吉亚》，尽管把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看作是一个虚构的人物的作者，应当对柏拉图的《普罗泰戈拉》或者《高尔吉亚》或者《特拉叙马科》前后一致地持同样的见解。

他的老师的描写实质上是准确的,他提供的有关苏格拉底的情况是打算作为历史事实的。当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在柏拉图的头脑中,就他把苏格拉底的死看作一个殉道者的沉思来说,没有对苏格拉底的“理想化”,但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任何这样的理想化过程是不自觉的,而且在对话中没有故弄玄虚。其次,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柏拉图告诉我们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是精确的历史真实。当他描绘苏格拉底时,像他经常所做的那样,由于那是发生在他自己的童年时代(如在《会饮》中),或者甚至是在他出生以前很久的时候(如在《巴门尼德》中)的事情,他是在叙说他不可能有亲知的事情,并且很容易把这些事情搞错。但是我们必须记住,根据他自己所说,他的家庭成员,从他的外曾祖父(《蒂迈欧》中的克里底亚),一直到他的叔父卡尔米德以及他的两个哥哥,都跟苏格拉底或多或少有亲密的交往。因此,他可以很好地获得大量超出他自己记忆范围的信息<sup>①</sup>。如果通过运用这个假定得到的这些结果是内在地自身一贯的,而且通过其他证据在关键之点上得到证实,那么我们可以公正地承认,这些结果无疑是合情合理的。

---

<sup>①</sup> 色诺芬告诉我们的许多事情,我们会发现是富有启发性的,他也必须依靠更老的人的证据。但是就他来说,我们并没有与我们在柏拉图那里所具有的同样的理由对于他的提供信息的人的能力感到信任。他唯一指出姓名的提供信息的人是赫尔莫基尼(Hermogenes)。他是富有的卡利亚斯(Callias)的异母兄弟。这个人在柏拉图(在《克拉底鲁》中)描绘的群像中没有给人以深刻印象,而色诺芬自己(在他的《会饮》中)则把他作为具有很好辨别力的人。也许会推论出另一个提供信息的人是安提斯泰尼(Antisthenes),他肯定地比色诺芬或柏拉图年长,但是,当色诺芬从事于写作他自己的“苏格拉底的”著作时,并没有证据表明他和安提斯泰尼有任何特别的交往的机会,而且很难说他有这种交往。当然,现代的关于色诺芬可能从安提斯泰尼的著作中借用材料的推测仅仅是推测而已。

## 第二章 苏格拉底的早期生活

由于在雅典没有官方的出生登记,我们没有安提奥克德(Antiochid)部族的和阿洛佩克(Alopecae)行政区(或者如我们所说的教区或选区)的苏福罗尼斯库(Sophoniscus)和费娜勒特(Phaenarete)的儿子苏格拉底的直接记录。可是,间接地我们能够 在很狭小的范围内确定他的出生年限。当然有一个关于对他的审判和定罪的官方记录,这些事情发生于公元前399年春天(指“拉各斯做执政官的那一年”),而柏拉图曾经告诉我们他被审判的时候是70岁或者甚至更年老些<sup>①</sup>。因此,如果我们假定他是生于公元前470年,即仅仅在普拉台亚(Plataea)决定性地击退了波斯军队之后的第九年,那么我们将是很接近于正确的了。这样,当苏格拉底出生时,伯里克利还是一位很年轻的人,索福克勒(Sophocles)和欧里庇德(Euripides)都是孩子;埃斯库罗(Aeschylus)大约在伯里克利执政前二年创作了他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的戏剧《波斯人》。在上演《阿加门农》(Agamemnon)<sup>②</sup>时,这位哲学家可能还是一个孩子,并且他还亲眼目睹了索福克勒和欧里庇德每一部伟大的悲

---

① 《申辩》17d。不同的手稿在这点上说法各异,在“70岁”和“70多岁”之间。在《克里托》52e3,苏格拉底则提供他的年龄是“70岁”。

② 阿加门农:迈锡尼国王,曾经发动特洛伊战争,是希腊联军的统帅。《阿加门农》是埃斯库罗的悲剧三部曲《俄涅斯特》的第一部。——译者

剧。雅典的一切伟大建筑和艺术作品是在伯里克利时代兴建起来的,联结市区和皮雷乌斯(Piraeus)港口的长长的城墙、帕特农神庙(Parthenon)、菲迪亚斯(Phidias)的雕像、波吕格诺特(Polygnotus)的壁画,都是他亲眼看见开始建造和完成的。德洛(Delos)同盟(雅典海上帝国的萌芽)在他出生以前不到10年就已经形成。当通过把伯里克利的竞争对手克蒙[Cimon, 米尔蒂亚德(Miltiades)的儿子]以贝壳放逐法加以驱逐(公元前461年),和建立由公众支付报酬给民主的陪审庭的制度而奠定伯里克利民主政体的基础时,他的年龄应该是已经到了能足以开始注意他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了。当雅典和斯巴达缔结“三十年和平协定”时,他已经是一位24岁或25岁的青年了。这个协定(以放弃雅典支配陆地的抱负为代价)让雅典自由地去加强对爱琴海的控制,从而成为世界上海军力量最强的国家。在爆发最终导致雅典的伟业毁灭的长期战争时,他已经是年近40了。由于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记住这些事实是重要的。苏格拉底的形象是由柏拉图在关于他作为一个老人受审和死亡的对话中描绘的。它不可避免地笼罩着后来一切时代的想像,这正像我们所有人的心中在想到约翰逊时,是博斯韦尔描绘的约翰逊,而这位博斯韦尔一直到他将近54岁时并且经历了一生的所有斗争之后,还从未见到过约翰逊。在我们弄清楚这一点之前,即苏格拉底的青年与早年时期曾经历的社会和柏拉图与色诺芬在其中成长起来的社会,为那种与把“战前”和“战后”的欧洲划分开来的同样的鸿沟所分割,我们甚至不能开始理解历史上的苏格拉底。

有关苏格拉底的双亲我们知道得不多。柏拉图在《拉各斯》<sup>①</sup>

---

① 180d.

中告诉我们,苏福罗尼斯库与其著名的同社区成员——“公正的”阿里斯蒂德(Aristides)<sup>①</sup>的家族有着亲密友好的关系,并且暗示他是一位在社区中相当受尊敬的人物。在《克里托》<sup>②</sup>中暗示,他认真细心地在“体育”和音乐方面给他的儿子以公认的初步教育。费娜勒特(这个名字似乎表明她是一位良好门第出身的妇女)跟另一个丈夫曾经有一个名叫帕特罗克勒(Patrocles)<sup>③</sup>的儿子,柏拉图在《泰阿泰德》<sup>④</sup>中告诉我们,她具有作为一位女助产士的高级技能。(这个陈述有时被当作是一个玩笑,但是,如果它是一种虚构的话,那似乎是没有意义的。当然,我们不会犯年代错乱的错误,即假定费娜勒特是一个职业助产士。<sup>⑤</sup>)据至今还常常被作为事实加以重复的那个亚历山大里亚的传说,苏福罗尼斯库是一位工匠、雕塑家或石匠,并且我们从鲍萨尼亚(Pausanias)<sup>⑥</sup>和第欧根尼·拉尔修<sup>⑦</sup>两人那里知道,公元二世纪雅典卫城(Acropolis)上的一组美惠女神雕像<sup>⑧</sup>是作为苏格拉底本人的作品来展出的。可是,这似乎是很可疑的。考古学家们似乎同意鲍萨尼亚描述的这一组

---

① 阿里斯蒂德(Aristides, ? ——约公元前 468 年);雅典的政治家和将军,曾任执政官。——译者

② 30d.

③ 柏拉图:《欧惕德谟》(Euthydemus), 297e。

④ 149a.

⑤ 柏拉图的论点是,苏格拉底把他自己对年轻朋友提供的服务,即帮助他们“生下”理念,风趣地比作他母亲的技术。苏格拉底真正地这样说过似乎被以下的事实所证明,即在戏剧《云》中(该剧本创作时,柏拉图还是一个婴孩),阿里斯托芬有一个关于“概念的流产”的笑话(《云》,137)。如果它不是对某种说话方式的滑稽的模仿,使得听众会理解为典型的苏格拉底式的特征,那么,这就会是愚蠢的事。

⑥ i. xxii. 8。

⑦ ii. 19。

⑧ 美惠女神:希腊神话中赐予人类美丽和欢乐的三女神。——译者



女神雕像,必定是一位较早的雕刻家的作品;(苏格拉底这个名字乃是一个普通的名字)。现存的最早提到苏格拉底是一位石匠的儿子的,是出自第三世纪韵文作者弗留斯(Phlius)的提蒙(Timon)的某些讽刺诗的片断。正如伯奈特说过的,这似乎是非常清楚的,即柏拉图或色诺芬都未曾听到过这样的故事。如果柏拉图已经知道,那么,他就不会让苏格拉底说像他在《申辩》中所做的那样,当他竭力想寻找一位比他自己更聪明的人时,他首先马上想到的是政治家,其次是诗人,最后才考察“工匠”。我和伯奈特一样,认为这个陈述可能是由于误解柏拉图的对话中苏格拉底关于代达罗斯(Daedalus)的一个玩笑的说法<sup>①</sup>而引起的。代达罗斯是传说中的木制偶像的制作者。苏格拉底开玩笑说代达罗斯是他的祖先。这个玩笑的真正意思是,苏格拉底的家族有一个追溯到代达罗斯的家谱,恰似菲莱代(Philaidae)家族[皮西斯特拉托(Pisistratus)和阿尔克比亚德属于这个家族],追溯它们的起源到埃亚库斯(Aeacus)。总之,如果柏拉图是可以信赖的,那么似乎很明显,苏格拉底自己并未从事过任何手艺的职业。他是被描述为常常享有充分的空闲去作他兴之所至的事,并且一开始就和雅典的最杰出的人物(伯里克利集团和克蒙集团)有交往了。

不管苏福罗尼斯库是不是一个雕塑家,我们不应当产生把苏格拉底看作属于一个像现代“无产阶级”那样的贫苦阶级的错误想法。他在年老时是极端贫困的(在一场灾难性的战争以后导致了一场普遍性的“财政危机”),但是柏拉图对此的看法是,这个贫困

---

<sup>①</sup> 柏拉图:《欧惕弗罗》,10c。这似乎肯定是《阿尔克比亚德, I》(Alcibiades I. 121a)的作者(柏拉图)对于与代达罗斯关系的理解。认为我们没有关于代达罗斯部族存在的其他论据,这不是一个充分的反对理由。

直接地是由于专注于一项“使命”而没有时间去料理“私事”<sup>①</sup>。无论如何,直到他46岁的时候,他不可能是属于雅典公民中最穷的阶级,因为在公元前424年他还作为一个“重武装步兵”或者全副武装的步兵在服役,而且必定有官方认定的使他有义务参与这种服役的收入。在讽刺剧中突出提到他的所谓的贫困是喜剧诗人后来制造出来的,它表明,他的贫困是刚刚不久的事,虽然这不是绝对的证明。因此,似乎有理由相信第三世纪学者法莱鲁姆的德米特里乌斯(Demetrius of Phalerum)<sup>②</sup>的一个陈述,即苏格拉底除了继承一栋住宅的遗产以外,尚有一笔由他的朋友克里托给予的少量资金(70米那<sup>③</sup>)。

苏格拉底从最早的时期起很可能有某些我们称之为身体、精神两方面的“怪癖”。柏拉图和色诺芬两人详细讲述了他的身体的强健和忍耐的能力,并且部分地阐明了他作为一名战士的杰出的经历。当他在70岁死的时候,他留下了两个小的孩子,其中的一个看来是尚在襁褓中的婴儿<sup>④</sup>,这是他身体壮健的进一步证明。特别强调的是:他在吃、喝方面罕见的克制和节制,以及在特殊场合下,他有痛饮而不醉的能力。他在成年时期,常常在冬天和夏天穿着同样简单的长袍,习惯于赤脚行走,甚至根据柏拉图的说法,

---

① 《申辩》,23C。

② 普鲁塔克(Plutarch):《阿里斯蒂德》,7。

③ 米那(minae):古希腊重量及钱币单位,相当于1/60塔兰特(Talent)。——译者

④ 至少《菲多》(60a)告诉我们,当苏格拉底的朋友们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到监狱看他时,他们发现他的妻子克珊蒂珀(Xanthippe)已经“带着这个孩子”在那里了。克珊蒂珀可能在那里度过了这个夜晚,并且是带着这个孩子,因为他太小而不能把他留在家中。

在一次严酷的冬季战役中,他也是如此<sup>①</sup>。但是,他长得远非清秀和匀称。阿里斯托芬把他的走路比作水鸟的大摇大摆,并且取笑他的转动眼睛的习惯;柏拉图和色诺芬两人提到他的鼻孔的宽大和他的显著的扁平鼻子,又提到他的眼睛的某些特征,即可能眼睛突出或者它们之间距离的宽度<sup>②</sup>。在柏拉图的《会饮》中阿尔克比亚德说,他看起来有些奇形怪状,像一位森林之神萨蒂尔(Satyr)或是一位西稜努<sup>③</sup>。

苏格拉底在精神方面更为独特。他的最惊人的独特之处是神秘的“声音”或者是“超自然的征兆”<sup>④</sup>。从他的童年时代以来,它就伴随着他。按照柏拉图的看法(他非常简单地看待这个怪癖),这个“征兆”本身是偶尔出现的,经常在很平凡的场合出现,并且总是采取突然抑制的形式<sup>⑤</sup>;经验表明,忽视它的前兆通常会导致不愉快的结果。色诺芬在他自己的性格中有一种迷信的气质。他宁愿更多的叙述这种怪癖,他把这种怪癖看作为一种私人的神谕,并且坚决认为,它还对苏格拉底和他的朋友的活动给予正面的指示,而忽视它则是不安全的。第4世纪时的对话《特阿格斯》(Theages)

---

① 参看柏拉图《会饮》,220a—b,对他在波提迭亚(Potidaea)的冰冻的战壕中的艰苦状况的描述。阿米卜西阿斯在《康诺斯》(Connus),公元前423年中把他描写为“生来是与鞋匠作对的”。至于阿里斯托芬的描述,参看《云》362及以下各行。

② 比较柏拉图的理由(《会饮》,215b及以下各页)和色诺芬的理由(《会饮》5)。

③ 西稜努是希腊神话中的森林之神,面貌丑陋;有时把它与另一个丑陋的森林之神萨蒂尔混同而不加区分。——译者。

④ 这就是后来的作家们称之为苏格拉底的“精灵”或“守护神”的东西。柏拉图从来没有以这种方式说到它。他仅仅称它为“超自然的征兆”,或是“超自然的某种东西”。参看苏格拉底自己对他的法官所提供的有关它的充分的说明,《申辩》31d。

⑤ 在《国家》496c中,苏格拉底谈到作为个人怪癖的“征兆”,他自己的这种怪癖也许就是一个独特的情况。

(错误地被认作是柏拉图写的)包含若干引人注目的轶事,即有关谁漠视由“征兆”提供的警告,谁总是得到灾难性的结果。柏拉图对于这个事情的说法是最少耸人听闻的,很可能是最准确的。显然,根据大家所说,这个“征兆”并不是“良心”的本性。这和正确与错误完全无关,并且有关它的任何一个理由并不诉诸于道德行为的意义,但是它相当于一种对坏命运有“神秘的”鉴别力的东西。我们感兴趣的主要地是在其它事物中,它是一个迹象,它表示苏格拉底真实地具有“好幻想”的气质;尽管他不像大多数幻象的占卜者,他对他的性格这个方面控制得很好,如同圣·保罗(St. paul)对于他的“使用方言说话”的天赋一样。被柏拉图详细描述的这个好幻想的人的气质的另一个特征是他的专心和出神的突然发作,有时相当于实际上发呆或者“狂喜出神”。显然这些通常都只持续短暂的时间,但是柏拉图记载有一次在这位哲学家身上发作时,他正在波提迭亚前线服役,并且持续了整整一天一夜<sup>①</sup>。这类事实有助于理解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对话的强烈的神秘主义气质的特色。这一点通常被解释为在柏拉图本人那里出现了神秘趋向的证据。但是考虑到在后期对话中(在那里苏格拉底已经不是突出的人物了)显然地消除了这种倾向,看来更合理的推论是,这样的著作(如《会饮》和《菲德鲁斯》)中的神秘主义首先是属于苏格拉底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再提到它。

根据柏拉图的看法,就苏格拉底来说,约束这种气质并制止它发展成为迷信的,不仅是“顽强的理性”(他跟萨缪尔·约翰逊共同

---

<sup>①</sup> 《会饮》描写苏格拉底在他赴宴途中遭到一个短暂的这类“着迷”的突然侵袭(《会饮》174d)。在同一对话(220c—d)中,阿尔克比西德(他是一个目击者)描述了在波提迭亚的这种场面。

使用的概念),而且是机智的幽默(在这一点上,他类似于伦敦弗利特街<sup>①</sup>(Fleet Street)的“圣哲”)。这种幽默就是他的反对者在柏拉图的对话中看作是他的“习惯性的嘲讽”。在这里,嘲讽这个词的原来的意义是指一个人的令人厌恶的特征,即这个人通过一种假装的对他的才能的贬低,设法做到逃避他的责任<sup>②</sup>。在柏拉图著作中,苏格拉底的这个假装被不喜欢他的批评者所指责,因为他习以为常地作为谦卑的询问者出现,他需要拜倒在比他自己知道得更多的人脚下,然而很明显,他才真的是他们在理智方面的优胜者。因此,他的不承认被当作是一个不真诚的借口,用以使他自己的暴露别人缺陷的工作更加容易。当然,柏拉图自己的信念是,苏格拉底的职业是毋庸置疑地庄重的。他基于同样的理由宣称自己无知,即他认为某些他的同时代人自己炫耀的智慧是很少的:他有一个关于“真正的知识应当是什么样的”可靠的严格的标准,所以,他知道他和他们之中的所有其他的人要达到这个标准还差多么远。因此只有他按照他们的真正的分量来察看他自己和其他的人,并且把人们的虚荣和他们的表现之间的对比诉诸他的幽默感。

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神秘主义者几乎普遍采用的借自关于

---

<sup>①</sup> Fleet 是流经伦敦汇入泰晤士河的一条小河的名字。以之命名的 Fleet Street 是伦敦新闻业集中的地方,故成为伦敦新闻界的别称。这街名我国通常译作“舰队街”,其实,它与“舰队”毫无关系,以译为“弗利特街”为好。——译者。

<sup>②</sup> 动物世界的典型的“嘲讽者”,在希腊寓言的语言中是狐狸列那(Reynard the Fox)。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嘲讽的人”是这样一个人,他的谈话是通过装模作样的假谦虚,虚伪的贬低他自己以及跟他连结的每一事物,从而使人讨厌。他的装腔作势和吹牛跟亚里士多德关于正直的与不受“自我意识”影响的人的坦率诚实两者形成对照。

两性感情的象征性的语言,似乎就是指向一个有象征意义的激动和引起性爱的激动之间的真正连接。对于这个规则,苏格拉底显然也不例外,而这是他的时代上流社会集团的生活方式的结果。他的想像是借用相同性别的人之间的具有浪漫感情的词汇。柏拉图在其著作中曾经提供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即有关他和他的才华横溢的同胞(大约比他年轻 15-20 岁)<sup>①</sup> 阿尔克比亚德之间的著名的交往。这个依恋的例子(这个时期必定是阿尔克比亚德还是一个十足的小孩,而苏格拉底已是一位 30 岁的人了)是柏拉图用浪漫的、热情的语言描写的,并且柏拉图进一步证实了埃斯克勒在他的对话《阿尔克比亚德》<sup>②</sup> 中还流传下来的一句话放到了苏格拉底口中。色诺芬自然不谈苏格拉底对阿尔克比亚德的这种依恋(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把苏格拉底带到审判台前的民主派政治家看来,这是反对他的一个主要理由),但是他同意柏拉图的陈述,即苏格拉底的习惯是开玩笑地说他终身是爱神的牺牲者和爱的艺术的主人<sup>③</sup>。柏拉图和色诺芬两人都清楚地表明,这种语言是开玩笑的,我们必须谨慎,不要误解它。苏格拉底道德上的绝对的纯洁性是在《会饮》中通过阿尔克比亚德他自己的嘴说出关于他的“诱惑”的故事的先决条件,并且在柏拉图的两篇伟大的关于“性爱的”对话(《会饮》和《菲德鲁斯》)中,它们的主题

---

① 特别参看《普罗泰戈拉》309a,《高尔吉亚》481d,并且最重要的是放进阿尔克比亚德本人人口中的叙述,《会饮》217a—219d。

② 参看埃斯克勒在《阿尔克比亚德》中的话,残篇 4(克劳斯编),在那里苏格拉底把他对阿尔克比亚德的“爱”(εργως)跟酒神巴库斯的(Bacchic)“着魔”加以比较。

③ 除了在柏拉图著作中有关这类的经常的谈论外,参看在色诺芬的著作中对于同样意思的玩笑式的断言,《会饮》viii, 2;《回忆录》111. xi, 16 页及以下各页。

处理的整个对象,是把神秘的爱与肉欲的或情感上的腐化区别开来。<sup>①</sup>

因此,我们应当认为苏格拉底作为一个有独创性的天才,在他的成年的早期,在他的性格中已有一种热情的爱者(passionate lover)、宗教的神秘主义者、热切的唯理主义者和幽默家的独特的混合;我们要尽可能地在保存下来的记录的基础上,再现伯里克利时代的强烈的精神生活对这样一种性格的反作用。这是一项冒险的任务;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依赖柏拉图给我们提供的指示,并且根据它们说明我们的其它证据,那么这个任务是能够完成的。

真的,就一个方面说,我们大约还要考虑更早的世代的影响。柏拉图对话中的苏格拉底经常提起奥尔弗斯<sup>②</sup>的宗教教义,以此为他自己相信灵魂不朽和来世生活的重要性提供证据。而在《高尔吉亚》、《菲多》、《国家》中,他叙述有关天堂和地狱等富于想象力的神话的细节,众所周知,这些都是奥尔弗斯式的。像我们在《法律》的暗示中所看到的,柏拉图也把“古代的说法”(它清楚地指的是奥尔弗斯教义),看作是具有不朽的宗教真理的核心的寓言;但是我们在《国家》第二卷中还看到对不道德的神话和宗教的严厉的抨击,针对奥尔弗斯的比针对荷马(Homer)的要多得多。这是柏

---

<sup>①</sup> 值得指出,苏格拉底被指控为“腐蚀青年人”和他跟年轻人的关系的这一方面完全无关。关于“同性恋”的罪责,会是他的起诉者手中的有效武器,而他们并没有提出这个责难,这两方面都是肯定的。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真正的指控是“教育”阿尔克比亚德与克里底亚,从而对他们攻击民主制负有责任。我仅仅谈到这个明显之点,因为不久前在《季刊》(Quarterly Review)的一篇文章中它相当严重地被歪曲了。

<sup>②</sup> 奥尔弗斯(Orpheus)是希腊神话中的歌手,善弹竖琴,传说他演奏的音乐可感动鸟兽木石。后演变为神秘的奥尔弗斯教派的宗师。——译者

拉图的看法,即在他出生的时候<sup>①</sup>,奥尔弗斯已经堕落到庸俗的“赦罪”和“免罪”的肮脏交易了。所以,当时的奥尔弗斯主义不大会激起柏拉图或是苏格拉底的重视。无论如何,品达(Pindar)的最伟大的奥尔弗斯的颂诗则是属于苏格拉底出生以前的年代,而这就指出了这种可能性,即苏格拉底真的在童年时期已经加入了奥尔弗斯教<sup>②</sup>,并且永久地受它的影响。如果这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将有助于考察我们将会发现的苏格拉底和特拜(Thebes)与弗留(Phlius)的毕达哥拉斯派之间的联系,同样有助于说明在对话《欧惕弗罗》中柏拉图明显地渴望表明苏格拉底的虔诚和幻想教派分子欧惕弗罗之间的区别,以及有助于说明埃斯克勒的一个对话《特劳格斯》(Telauges)的存在,在这篇对话中苏格拉底结识了一个有特别卑劣习性的“冥界的”信徒,并且明显地批评了他的道路。

无疑地,从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精神看,苏格拉底得出了对于合法当局的不言而喻的服从的重要性和对于严格的合宪法性的崇敬的毕生观念。这导致他在后期生活中,冒着严重的人身危险去反对愤怒的民主派和民主政体的颠覆者对于宪法的同样的践踏;并且最后,为了坚持国家对它的公民的行为加以裁决的权力这个信念,他屈从于一场审判(他的起诉者以为他会逃避这场审判)和

---

① 《国家》中加以描写的这个谈话,必须被设想为最迟发生于柏拉图的童年时代的早期,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因为他的最年长的哥哥阿迪曼托(Adimantus)的形象在那里是一个年轻人,而在公元前399年他的年龄已大到足以代表当地的父辈了,如同我们在《申辩》(34a)中看到的,在那里苏格拉底提到他,把他作为一个柏拉图的亲属,他能够得到信任来提出苏格拉底自己的社团对于柏拉图的影响的有权威性的见解。

② 必须记住,奥尔弗斯教不是一个政治团体。它像一个现代的教会,是以它的庄严的誓言、通过自愿加入而被吸收,并且是“国际性的”。最初的毕达哥拉斯派把一种类似的宗教(基于不朽的灵魂的教义)跟他们的科学相结合。



一项判决(他本来很容易就能免于这项判决)。他的整个一生是一个崇敬法律的榜样。这种对法律的崇敬,我们习惯地想到罗马人而不是希腊人,然而他是唯一地避免了罗马人仅仅在字而上提高法的地位而临驾于它的精神之上的错误的人。

苏格拉底在其中度过他青年时期和成年早期的这个社会的精神气氛,以及它对苏格拉底发生的影响,有必要多说一点。我们必须牢记的重要事实是,在克蒙和伯里克利时代兴起的雅典,它在政治上和商业上的重要性,已经使它像我们时代的伦敦一样,成为一个伟大的首都和希腊世界的思想家汇集的地方。它成了一种所有观念的“信息交换所”。这就是为什么在下一世纪柏拉图能够在雅典创办一所学园(这所学园成了高等教育的一个“国际的”中心),和为什么在我们听到古希腊的科学和哲学时,我们会想到“雅典的学派”的原因,尽管事实上哲学与科学都发源于雅典以外并和雅典人的性格是这样的不相合,以致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他们在任何意义上也都是仅有的雅典哲学家。

到那时为止,哲学和科学彼此尚未区分开来。它们曾经是小亚细亚海滨伟大的伊奥尼亚(Ionian)城市的希腊人的理智好奇心的创造。大约从公元前600年起,他们决心建立一个理性的和首尾一贯的关于环绕他们世界的理论。在理性运动发端的一、两代人中,这个推动曾经由伊奥尼亚最大的天才人物之一和数学的真正奠基者毕达哥拉斯带到意大利南部的希腊社会,结果是,对未来欧洲思想在各个方面的发展而言,西方迅速地变得比东方更加重要得多。那些开创性的伊奥尼亚科学家的最初兴趣是在“我们上而的事物”,即似乎以一种既复杂又令人迷惑的方式运动的天体,然而它们终究是由某个统一的规律所规定的,只要我们能够发现

这个规律是什么。随后,希腊医学的兴起导致了生物学方面的思辨代替天文学方面的思辨在“科学世界”处于支配地位,同时数学已得高度的发展,并向毕达哥拉斯派提出了数自身的科学很可能是打开宇宙奥秘的钥匙的思想。<sup>①</sup> 到苏格拉底进入他的 20 多岁这个阶段的时候,东方和西方的宇宙理论已具体化为彼此对立的了,其最突出的“外在的和可见的迹象”就是两种系统提出的关于在事物的系列中的地球的形态和地位的不同说明。一般的东方的观点是,一切都是由一个单一的材料组成,包括我们本身的精神在内。这个材料是“气”,而气是指薄雾或者蒸气的意思。任何东西都是薄雾或者蒸气,而事物之间的区别仅仅是由于在凝聚和稀疏的程度上的变动而已。甚至人类的“灵魂”也是气,实际上正是周围大气的一部分,我们通过呼吸而把它吸入我们的身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继续去呼吸的时候,我们才有生命和意识,又为什么在我们死的时候,我们就“丢了魂”的原因。地球,一大团高度凝聚的气,它处于我们特殊“世界”或者星系的中心;它是一个宽阔的圆盘,漂浮在它下面的气之上,像一片叶子在一条溪流的水面上浮动一样。就像东方的观点在原则上是一元论的一样,对立的西方观点则在原则上是二元论或多元论的。对于一般现代读者来说,在这些理论中最著名的是西西里的医学学派的奠基人恩培多克勒

---

<sup>①</sup> 英语读者在伯奈特的《希腊哲学》第一部第 1—101 页中,将发现一直到公元前约 450 年的最令人满意的整个发展的梗概。更详细的情况可以研究同一作者的《早期希腊哲学》(1920 年第三版)或者皮·塔纳里(P. Tannery)的《希腊科学史》(Pour l'histoire de la science Hellène, 1930 年第二版)。关于早期数学史的简洁的说明,参看格·洛里亚(G. Loria)的《古希腊的数学史》(Histoire des science mathématiques dans l'antiquité Hellénique, 巴黎, 1929 年)。看来很清楚,在苏格拉底成年的早期,希腊的几何学家已拥有包括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第 I、II、III、IV、VI 各卷内容的材料了。

(Empedocles)的理论。他主张一切事物决不是在变化状态中的凝聚的气,而是4个原初的“根”(roots,以后的术语叫“要素”,elements)的混合物。这4个根就是火、大气、水、土。和东方理论更加清楚的对比是毕达哥拉斯派提出的观点,毕达哥拉斯派试图用精确的数学方法构想出事物,如同由“单位”或者“点”以一种典型的几何模式排列在周围的“空间”(它并未清楚地与雾气或黑暗区别开)而构成如此多的图形一样。于是,毕达哥拉斯派发现了地球的球形形状,从而推论假定它依靠任何支持而浮动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回到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的光辉思想。阿那克西曼德虽然猜想地球是圆筒形,但是他在伊奥尼亚的科学诞生时就已断言,地球不靠任何事物支撑,而是在整个星系的中心自由地摆动,因为它是对称地被安放的,因而就没有为什么它必须朝一个方向偏离而不是朝另一个方向偏离的原因。这个典型的东方和西方关于地球形状的观点之间的直接冲突,是公元前第5世纪中叶科学思想状况的一个范例。科学曾经热情地追求了一个半世纪,结果正如苏格拉底在柏拉图的《斐多》中暗示的那样,似乎没有什么东西是确定的,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即如果任何一个它的竞争对手的阐明是对的,那么其余的一切必定是错的<sup>①</sup>。

甚至比冲突的科学学派的矛盾主张更使人为难的是,埃利亚的哲学家(巴门尼德和他的学生芝诺)对他们所有人的激烈的批评。巴门尼德从不能被思想而无自相矛盾的东西就不能是真的唯理主义的原则出发<sup>②</sup>,宣称被科学描述为世界的基本特征的运动

---

① 96a—b, 99b—c。

② 即自相矛盾地来思想的东西不会是真的。——译者

和变化是自相矛盾的,因此必定是虚幻的。真实存在的应该是单一的、统一的、始终不变的“绝对”<sup>①</sup>;因为宇宙学者想像的自然界不是这样一个绝对,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运动和变换的舞台,自然就只能是一个幻觉。芝诺为了反驳论敌,对毕达哥拉斯派的数学原则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检验,这表明数学思想本身就是一大团矛盾,而事实上却导致了数学基本概念的重建。这种重建工作从柏拉图时代开始,而在我们的时代才勉强完成<sup>②</sup>。这个明显地无可辩驳的对理性认识的要素的袭击的结果,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产生了一种对自然界认识的可能性的广为流传的、普遍的怀疑论。到苏格拉底已是一位大约20岁的青年人的时候,最有才能和杰出的人都不愿意把物理世界作为一种研究的对象,因为那种工作几乎无例外地都是第二流的志趣,即继续修补旧的体系。像阿布德拉(Abdera)的普罗泰戈拉这样的第一流的人物,都已把他们的思想转向不同的方向。在道德的和政治的迅速进步的年代,需要的是摸索慎重考虑后产生的和清晰地系统化的立法、政治、个人的生活行为等方面的原则,去代替对传统和习惯的信赖;而在这里对于运用智力于真正的目标,似乎是一个富有成效的开端。这也说明了一种新的职业,即“智者”<sup>③</sup>或是收费的“人们的教育者”的职业

---

① 巴门尼德非常天真地认为这个绝对像一个固体物质的球体,但这仅仅是一个历史的插曲。

② 芝诺的著名的“悖论”(阿基里斯、飞矢和其他)就属于这种论辩。据我所知,对它的重要性和意义的最充分的研究是H. 哈斯(H. Hasse)和H. 舒尔茨(H. Scholz)的《希腊数学基础的危机》(Die Grundlagenkrise der Griechischen Mathematik, 柏林, 1928年)。

③ 这个词在这个时期的意义,只是我们的祖先在安妮女王(Queen Anne)时代所称呼的“机智的人”,并且包括宇宙论的理论家和“人文主义者”。我们不应当把由我们的词“智者”和“诡辩”所表达的道德上的任何贬抑加进它里面去。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和柏拉图创造了这些含义,他们用这个词表示一种对于哲学的虚假的冒充者的意思。在他们的时代巡回的“人们的教育者”已不复存在了。

的兴起。一些不久前曾经是研究自然的学生发现一种新的和有报酬的职业,即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专门阐述“美德”或“善”,也就是,专门阐述关于“如何处理好一个人的私事和一个城市的事务”的知识,而这种精确的知识对于一位年轻的追求权力和盛名的人将是最渴望获得的。欧洲的人文主义的研究就是在这个运动中开始的,如同自然科学是开始于米利都(Miletus)的“智慧的人”(“wise men”)的宇宙论的思辨一样。在阿提卡地区一个帝国的民主政体(Imperial democracy)在伯里克利时代迅速崛起,自然地使雅典成为一个世界的首都,在这个城邦里阐述“善”的教授能够保证有热情的听众和丰厚的收益。

在伯里克利的雅典,旧的对于数学的与物理科学的兴趣和新的研究法律及道德的人文主义的兴趣,这两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在这位政治家<sup>①</sup>的童年时代的早期,这个按照东方的说法的古老的学说,以及它的扁平地球,确实由阿那克萨戈拉带到了雅典,并且这个被柏拉图和伊索克拉底两人承认的传统说法表明阿那克萨戈拉承担了对伯里克利本人的教育<sup>②</sup>。阿那克萨戈拉很可能在苏格拉底成年以前<sup>③</sup>被伯里克利的政治上的反对者所迫而离

---

① 指伯里克利。——译者

② 伊索克拉底(xv. 235)明确地说:“伯里克利是两位智者——阿那克萨戈拉和达蒙(Damon)的学生”,这同一件事是柏拉图在《菲德鲁斯》(270a)中的以众所周知的语言蕴含着的,即伯里克利的讲演术的“提高”应该归功于他跟阿那克萨戈拉的交往。

③ 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的说法是把阿那克萨戈拉(他在雅典曾经住了30年)从雅典逃亡的年代定在正好爆发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前,约在公元前432年。但是这跟柏拉图的描写显然相矛盾。柏拉图曾对阿那克萨戈拉以心灵作为宇宙秩序原因的学说在年轻的苏格拉底的心中升起了希望,以及他的随之而来的失望,作过一长段的说明。柏拉图坚决主张,苏格拉底仅仅是从阅读阿那克萨戈拉的著作知道他的思想的(《菲多》97b以下各页),并且清楚地指出,阿那克萨戈拉在苏格拉底成长到足以跟(转下页)

开了雅典,以逃避因为“不敬神”而给予的判决。但是在以后的许多年里东方型的宇宙论仍旧由他的后继者阿尔克劳(Archelaus)和阿波罗尼亚的第欧根尼在那儿讲授。克俄斯(Chios)的伟大的几何学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自己就定居在这个城市。柏拉图使我们确信,并且也没有理由去怀疑这个事实,即巴门尼德和芝诺曾经拜访过这个城市,在那里苏格拉底与他们认识,当时苏格拉底还是一位很年轻的人,而芝诺必定在那儿住了一些时间,因为不止一位著名的雅典人因受他的教导而付给他可观的酬金<sup>①</sup>。柏拉图的对话给我们描述了由于杰出的“人文主义”运动的领袖普罗泰戈拉和高尔吉亚的访问而引起的轰动。无论如何,普罗泰戈拉自己必定是加入了伯里克利的集团。伯里克利把普罗泰戈拉安排在一个委员会中,这个委员会被委以为意大利南部的重要殖民地图里(Thurii)制定一部宪法(公元前443年),芝诺好像也是他的同事之一。

---

(接上页)他作任何个人交往以前就已经离开雅典了。这也符合于关于阿那克萨戈拉实际上“教育”过伯里克利的陈述,符合于对于亚历山大里亚的编年学上的说明的唯一自然的解释(第欧根尼·拉尔修,ii.7),即他“开始在雅典成为一个哲学家是在卡利亚斯[作执政官的]那年,当时他正好20岁”,并且在那儿住了30年。因为编年学家把他生年定于公元前500年,这将意味着,他来到雅典时是在萨拉米海战的那一年(公元前480年)——可能是薛西斯(Xerxes)军队中的一个应征士兵——,而大约在公元前450年离开这个城市。(在我们的手抄本中名叫卡利亚斯的执政官可能系卡利亚德斯[Calliades]之误,后者是人们所说的萨拉米[Salamis]之战那一年的执政官。)这些日期看来是必然的,尽管我的年表曾被一位著名的德国著作家说成是“不可能的”。流行的看法看来似乎是根据第4世纪的历史学家埃福鲁斯(Ephorus),而年表是他的一个弱项。

① [柏拉图的]《阿尔克比亚德》I.119a提到伊索洛库的儿子皮托多罗(Pythodorus)和卡利亚德斯的儿子卡利亚斯每人付给芝诺的高额酬金达100米那。柏拉图描写了苏格拉底在皮托多罗的家里会见巴门尼德和芝诺。皮托多罗是阿尔克达米(Archidamian)战争中一位著名的雅典指挥官,而卡利亚斯是将军,是在公元前431年发生战争时在波提透亚被杀死的,那时苏格拉底本人也在雅典的军队中。

这看来完全可靠,即苏格拉底在早期的生活中学到了这个时代的丰富的科学知识,和充分地掌握了它的人文主义文化。这是柏拉图的标准表述。并且它的真实性的最好证据是,它被色诺芬的真正值得注意的承认所证实。为了他的申辩的目的,他渴望证明苏格拉底持有他自己关于科学的功利主义的观点。苏格拉底认为一个人应该对几何学有足够的了解,以便去“丈量某人得到的或转让的一块土地”,而不必为“复杂的图表”伤脑筋,以及应当对天文学有足够的了解,以便能“为了旅行、航行或者守夜,向人们报告晚上的、月的或年的时间”,而不必为“行星与漫游的星体,它们跟地球的距离,以及它们的运行轨道与起因”动脑筋。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中,色诺芬都立即补充,“然而他并非对这个主题不熟悉”,“然而他并非未受过这些方面的教导”(因此,人们所说的他的态度就不是无知的蔑视)<sup>①</sup>。

关于这一点,柏拉图在《菲多》中用苏格拉底之口说出的自传式的谈话中,告诉我们更多的情况<sup>②</sup>。他告诉我们,苏格拉底开始作为一位“深入探究自然”的热心人,渴望发现“事物的生成和消逝的原因”。他研究各种各样的流行的宇宙学的理论,东方的以及西方的,这表明他最初跟随两位同时代的在雅典的东方型理论的老师,阿尔克劳和阿波罗尼亚的第欧根尼,而且特别被有关地球形状

---

<sup>①</sup> 色诺芬《回忆录》IV . vii, 1—6。从色诺芬这些让步(这和他的主要论点直接相抵触)中很难说不是指苏格拉底知道关于这些主题所有已被知道的东西。尽管如色诺芬所说,他主张有许多其它的事物的知识是更加不可缺少的。

<sup>②</sup> 《菲多》9ba—100a。这一段与《巴门尼德》开头的几页一起是我们关于这方面的重要的证据,在那里柏拉图构想出他的主人公早期的思想史。鉴于这段经历粗略地说来比柏拉图自己出生还早 20 年,或者更早些,因此这个描写当然是想象的,重新构思的。但是,从柏拉图的家族的很多成员中,他能够得到必要的信息。

的不同意见所打动。他知道西西里人恩培多克勒的生物学的学说和克罗顿(Crotona)的意大利人阿尔克迈昂(Alcmaeon)有关大脑是精神生活的器官的理论,以及与芝诺提出的一个问题(即与“单位”这个概念)相联系的数学上的困难引起的许多麻烦。首先在相互竞争的理论家们的原则之间的直截了当的矛盾使他绝望,但是他读了阿那克萨戈拉书中的一段话后似乎得到了一个启示。阿那克萨戈拉说心灵(mind)是所有自然规律和秩序的原因,正如心灵是人的活动的有秩序性和一致性的原因一样。这就使苏格拉底联想到,整个宇宙像一种得到恰当的指导的人生一样,是首尾一贯、有理性的计划的体现。如果心灵是世界结构的原因,那么地球和在宇宙中的其余一切东西必定恰好有在这个方案中的这个形状、位置、地点,这是它们各自应当有的最好的方案。他决心研究阿那克萨戈拉,希望找到一位教师,他能够表明宇宙的每一个细节应该被安置得怎样是最好的,因此它必须被安排在一个受心灵支配的世界中,以此来结束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当看到阿那克萨戈拉把心灵引进他的系统仅仅是去证明运动中心的最初原动力(据此他假定的星系得以产生出来),而并没有丝毫利用被心灵支配的宇宙必须是理智计划的体现这个思想的时候,他的希望很快地破灭了。正是这个早期的失望致使苏格拉底(就像他幽默地所说的那样)得出结论说,他“没有搞自然科学的头脑”,并且设计出了一个研究的路线以及他自己的方法。

这个新方法的性质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苏格拉底哲学时考虑。目前,重要的是看到,在柏拉图讲的故事中预先假定的情景在历史上恰恰存在于苏格拉底青年时代的雅典,并且柏拉图谨慎地把注意力指向事实,办法是提供苏格拉底在其中犹豫徘徊的冲突的学



说的大量细节。柏拉图显然不是描写他自己早期的历史,因为理智的状况在他自己的时代已是彻底地改变了,并且他描述的这个理论已经成为过时的了<sup>①</sup>。并且我们不能很好地假定,他想一般地描述“一位哲学家的心灵的成长”;(关于被地球形状的问题所困惑的过程不是本质的)。他显然想叙述他所相信的事实,即有关在他的主人公苏格拉底的生活中的一次理智的危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有足够的机会从苏格拉底本人和他人那里听到有关的事实,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相信他的叙述实质上是准确的。当然,因为除了这个事件属于苏格拉底早期的生活以外,他没有为我们提供按照编年顺序的陈述,所以他用一页或二页篇幅描述的理智革命,也许要花费相当的时间才得以完成,这是完全可能的。

柏拉图的陈述应当相当确定地被认为与德奥弗拉斯塔斯<sup>②</sup>(亚里士多德的朋友和后继者,论希腊哲学的历史的最早的著作家)所作的明确的断言有关系。德奥弗拉斯塔斯说,苏格拉底实际上是阿尔克劳学派中的一位成员。阿尔克劳这个雅典人在阿那克萨戈拉被迫离开雅典时,继承了他的事业。这个说法从德奥弗拉斯塔斯传到哲学史上的那批亚历山大里亚的著作家(他们把他的著作当作他们的源泉),并且很难说不是真的。德奥弗拉斯塔斯本人至少在柏拉图在世时一定在雅典,而且像有的报导所说的,他也许是柏拉图学园的一名实际的成员,而且是对这样一段历史的一位谨慎的著作家。此外,他的陈述还被亚里士多德的另一个朋友、音乐理论的著作家、塔任同(Tarentum)的阿里士托克塞努(Aristoxenus)所证实。

---

① 更不必说根据柏拉图自己所讲的他的早期的抱负,看来是作国务活动家那样的人,而不是作学者那样的人。(《书信》vii 324b—c)。

② 德奥弗拉斯塔斯《关于物理学的问题》残篇 4。

阿里士托克塞努斯言<sup>①</sup>，阿尔克劳和苏格拉底之间的联系在后者还是一个 17 岁的少年时就开始了，并且继续了许多年。他把这个陈述跟大量流言蜚语联在一起，其目的是为了使其留在记忆中的苏格拉底丧失信誉，但是他的流言蜚语的不足道不能成为不相信他断言的有关交往的事实的理由。而且，我们也知道第 5 世纪悲剧诗人克俄斯的伊昂(Ion)记录了这个事实，即当苏格拉底还是一位年轻人的时候，阿尔克劳和苏格拉底一起访问了萨摩斯(Samos)岛<sup>②</sup>。由于伊昂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记载了在公元前 441—前 440 年他本人跟伯里克利和悲剧诗人索福克勒在克俄斯的会见，可以作这样的猜测，即有关阿尔克劳和苏格拉底的故事属于这同一个背景，伊昂在跟伯里克利会见的那段时间会见了他们两人。这是处在萨摩斯人反抗雅典人，和雅典封锁该岛的期间。阿尔克劳和苏格拉底(那时是一位 28 岁或 29 岁的人)必须被假定为正在雅典人进行封锁的军队中服役，而柏拉图为什么在他有机会提到苏格拉底参加的战役时并未提到这个事件呢？理由仅仅是那是发生在他自己的时代很久以前的事<sup>③</sup>。柏拉图并没有告诉我们苏格拉底和阿尔克劳的这种联系，但是它恰恰明显地提供了他的关于向苏格拉底介绍阿尔克劳的老师的那部著作<sup>④</sup>的故事的正确轮廓<sup>⑤</sup>。

---

① 残篇 25(希腊史残篇,ii.280)。

② 第欧根尼·拉尔修,ii.23。

③ 由此得出结论：在反对著名的萨摩斯的哲学家梅里梭(Melissus)指挥的军队时苏格拉底正在(雅典军队中)服役。

④ 指阿那克萨戈拉的论及自然和心灵的著作。——译者

⑤ 这本书可能是在作者晚年时写的，即他最后从雅典迁出以后所写。因此它的内容对于苏格拉底也许是新奇的，尽管他(指苏格拉底。——译者)跟阿尔克劳及其学派有交往。

除了柏拉图关于苏格拉底跟巴门尼德与芝诺会见的说法,和他对于阿那克萨戈拉著作的失望,以及刚刚引证的有关他与阿尔克劳学派的联系的陈述之外,直到公元前 431 年爆发阿尔克达米亚战争,我们没有关于他的生活情况的直接的资料。可是,我们可以有相当把握地作出某些推论。无论如何,认为他有时与阿尔克劳和他的朋友继续有联系是很自然的;我们不需要假定,他专心致志于他的研究的新方法是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之内完成的。也许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当阿尔克劳死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他死于何时)苏格拉底实际上是他的继承人。当我们想起柏拉图的《申辩》中的苏格拉底强烈地否认他有任何“学生”,或者曾经承认过是任何人的“教师”的时候,我们真地感到吃惊,但是这跟柏拉图的否定是严格地一致的。苏格拉底在《申辩》中的否认所涉及的是,他曾经从事于有酬金的“人们的教育者”,或者接受“弟子”的职业<sup>①</sup>。这是与他在柏拉图出生以前的某个时间曾经是一个“朋友”团体的不受报酬的头领(他曾经主持他们的研究工作)这件事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必须记住,对于这样的集体中的学生和指导人之间的关系,正规的词不是 mathetes[学生],而是 hetairos[朋友];区别就在于前一个词中蕴含有职业特性的意思,而后者则没有。)事实上有大量的证据指明,苏格拉底在他较早的时期中,曾经真的非常像是有组织的“学派”的一个头领这样的人物。

这显然是在《云》中的阿里斯托芬的讽刺艺术的先决条件。苏格拉底在那出剧中是作为一个学生团体的头领而被嘲弄的(这个

---

<sup>①</sup> 《申辩》19d,“也许有人告诉过你们,我从事教育人的工作并为此收取酬金,这是不真实的,”这是柏拉图的否认的典型。

讽刺剧自然地称他们为“弟子”)。他们一起住在他的家里,并且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有一个科学学校必需具有的那些物品(如像地图和仪器等)可供使用。这个“概念工厂”(阿里斯托芬对苏格拉底的家的称呼)的居民被描绘为兼有两种性格。他们是一群具有独特的“唯灵论”观点的衣衫褴褛的和显出饥饿样子的禁欲主义者。这说明为什么把他们叫做“最聪明的精灵”(wisest spirits)<sup>①</sup>来取笑他们。这个词在公元前第5世纪的阿提卡人中是“鬼魂”的意思。他们也是天文学、地理学和地质学的爱好者<sup>②</sup>,并且信奉一种宇宙学理论,这种宇宙学我们立刻认出就是阿波罗的(Apollonia)第欧根尼的宇宙学,按照这种学说任何东西都是由“气”构成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都被描写成向云祈祷的缘故,以及为什么苏格拉底从某种机械中悬挂着进行思考以避免构成他的心灵的气与地球的表面的湿气相接触<sup>③</sup>。除非在歪曲的背后有真正的事实基础,否则难于看清这种讽刺之处何在。如果假定以下这两个事实,即苏格拉底持有近似于奥尔弗斯有关不朽的灵魂的信仰,以及在他生活中的一个时期他是一群具有我们叫作东方型观点的宇宙学学生中的主要人物,那么,阿里斯托芬的讽刺剧就有了必需的东西;除非我们在事实上承认这个基础,否则它就是无聊的<sup>④</sup>。

---

① 阿里斯托芬,《云》94行。

② 同上,184及以下各行。

③ 阿里斯托芬,同上,225及以下各行。

④ 所以,使奥利弗·洛奇(Oliver Lodge)爵士成为一个类似的滑稽剧中的主角,是机智的和中肯的;而把那样的角色给予切斯特顿(Chesterton)先生则是不机智的了。关于按照这种看法对于《云》的详细研究,可以参阅我的《苏格拉底面面观》(牛津,派克出版社1911年,129页及以下各页)一书中的一篇文章《非朗蒂斯特里昂》(Phrontisterion,原意为“思想工厂”,即指所谓的“苏格拉底的学校”。——译者)

色诺芬的《回忆录》有一节特别有价值<sup>①</sup>，它必定是涉及苏格拉底成年的早期，从这一节我们可以发现某些在阿里斯托芬讽刺剧背后的实在的东西。色诺芬说，智者安提封(Antiphon)渴望离间苏格拉底的“朋友”，显然是要把他们吸引到他自己这边来。(我们不知道安提封的准确的生卒年代，但他肯定是阿尔克达米亚战争时期的一位人物)。因此，他曾经公开批评苏格拉底不倾听这些同伴的意见。首先，他评论苏格拉底的禁欲主义的生活、他的可怜的服装、不穿鞋子的脚、菲薄的饮食，和所有被柏拉图和色诺芬以及阿里斯托芬和他的喜剧家同伴们使之突出的特征。他进一步批评他拒绝从他的同伴那里收取为他们效劳的酬金。他争论说，不收费用的服务完全可以被假定为没有什么价值。对于第二点的回答，苏格拉底首先是在出售知识的“才子”和出售“妩媚”的变童之间作出比较，然后更精确地解释他本人和他的那些朋友之间的关系性质，目的在于表明它不是那种为此能够正当地收费的关系。他说，“一位好朋友给我的愉快如同一匹好马，或是狗，或是好斗的公鸡给别人的愉快，或者甚至更多；如果我知道任何好的东西，那么我就把它教给朋友，并且把他们介绍给其他人，我想他们会从这些人那儿得到善行方面的教益。我和我的朋友一起打开古代智慧的人的宝库，即他们身后遗留下来的那些写成的书卷；如果我们在那里发现好的东西，那么我们就把它摘选出来，而且认为，如果我们变成朋友，我们必定获得巨大的利益。”<sup>②</sup> 这里描绘的苏格拉底完全不像是柏拉图和色诺芬个人的回忆中的那个我们如此熟悉

---

① 色诺芬：《回忆录》I. vi。

② 引文出处同上，第14节。

的、对所有人负有使命的人。完全可以肯定,他是“古代智慧的人”的一位学生,这些古代智慧的人必定是早期哲学家和科学家。苏格拉底有一个追随他的学生集团围绕着他,这与在他晚年时富有家庭的有闲暇的年轻人围绕着他完全不同。如同柏拉图所说,(后一种是)为了听他揭露有名气的人的无知来取乐<sup>①</sup>。并且他与这个集团的关系是作为他们研究的指导人,这种关系能够被安提封似是而非地错认为他是一位职业“教师”。色诺芬在这里清楚地为我们保存了有价值的说明,这是从比他本人更早的时期的某个苏格拉底式的人那里引申得来的,并且这足以证明在戏剧《云》中的“思想工厂”是为了喜剧的效果对于某种真实的东西所作的一种歪曲。

重要的是要知道,苏格拉底作为一位具有杰出的理智力量的人物的声誉,必定在他的前半生就被确认了,尤其是他跟著名的“智者”的关系必须追溯到这个时期。这一点在不止一个地方被柏拉图清楚地预先设定。在柏拉图的最富有戏剧性的对话中描述的苏格拉底和普罗泰戈拉(智者中最著名的人物)之间的偶然相遇,明显地是被设想为发生于日益迫近的伟大战争爆发之前。在《普罗泰戈拉》中,阿尔克比亚德(他在波提迭亚骑兵部队作过战<sup>②</sup>)还刚刚进入成年;杰出的“智慧之士”(他们中的一些人是来自战争中的“敌对城邦”的城市)以和平和友好的名义全部聚集在卡利亚斯的家里。而在对话中,苏格拉底已经不言而喻地被当作他们大家都与之很熟悉的一个人了。他甚至暗示<sup>③</sup>(其实在柏拉图著作的

---

① 柏拉图:《申辩》23c。

② 柏拉图:《会饮》220d—e。

③ 《普罗泰戈拉》241a。参看《卡尔米德》163d;《美诺》96d;《克拉底鲁》384b。如果它们不是指一个真正的事实,那么这个暗示就是毫无意义的。

其他地方,他也不止一次地这样提到)参加过一个花费较少的普罗第科(Prodicus)的讲课。特别是普罗泰戈拉在几年以前就已认识了他,并且称赞说,他是他遇见的当代最有才能的人,并对他的将来寄予最大的信任<sup>①</sup>。正如柏拉图所描写的那样,苏格拉底跟这些人的交往(不过这一点有时被忽略了)属于他的生活的早期部分,在他履行他的“使命”以前,并且这种关系远非是不友好的。甚至在《申辩》中从来没有把“智者”作为他的天职要加以揭露的阶层之一而提到过。他们钦佩他的才智(不过是一种屈尊俯就的方式),而他们对他们的态度是一种典型的混合物,即尊重真正的造诣和有礼貌地以他们不意识到他们的局限而自鸣得意来逗乐。

正如同伯奈特指出的,我们还有更多的间接证据表明,苏格拉底本人在他40岁以前在远离雅典的知识界中为他自己赢得了卓越地位。我们从柏拉图的《菲多》中<sup>②</sup>知道在他临终时在场的人的名字,并且其中的一两个人的出场都是在意料之中的。这些名字中的几个人都被色诺芬证实为苏格拉底的朋友。尤其是从特比斯来的两位年轻人西米亚斯与克贝(一度是毕达哥拉斯派菲洛劳斯的学生),和从麦加拉来的两位埃利亚派人士欧克里德与特普西昂(Terpsion)也都在场。西米亚斯和克贝是被色诺芬提到名字的<sup>③</sup>,他们属于那些真正值得提到名字的人们之列。他们为了专心致志于他们的灵魂的善而是苏格拉底的常客。居勒尼(Cyrene)的有造诣的“世界主义者”阿里斯提卜(Aristippus)(尽管实际上不

---

① 《普罗泰戈拉》361e。这恰恰是因为苏格拉底已经与普罗泰戈拉很熟悉,以致在这个对话中的他的年轻朋友到他那里来,是为了让他把他们介绍给这个伟大人物。

② 59b—c。

③ 《回忆录》I. ii48。

在场)与苏格拉底的交情之深在柏拉图看来,必须对他的不在场作出某种解释。厌恶阿里斯提卜的色诺芬也把他写成是苏格拉底圈子里的一名成员,并且受到苏格拉底对他的懒惰与贪图酒色的生活的辛辣的指责<sup>①</sup>。毕达哥拉斯派对苏格拉底的特殊兴趣表现在以下的事实,即柏拉图关于他的死的谈话是通过埃利斯的菲多对毕达哥拉斯派的弗留的埃科克拉底和一群未提到名字的志趣相同的人说的,他们表现为热烈的仰慕者,渴望知道这位伟人的最后时刻的全部情况。当时,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人的故乡的城邦,即特比斯、埃利斯、弗留,都是“敌人”的城邦,尽管公元前421年名义上签定了“和平协定”,伯罗奔尼撒战争却继续下去,几乎从苏格拉底的40岁一直持续到他66岁。似乎可以推出,他与这些非阿提卡的哲学家中的老人的联系必定是在他40岁以前就已经发生了,而散居在希腊地区各处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团体必定在这些日子里已经把他推崇为一个受尊敬的教师了。否则难以理解为什么从特比斯来的毕达哥拉斯派的年轻的学生们曾经渴望大战一结束就能够成群地去拜访他。同样性质的“国际声誉”是通过出自埃斯克勒的、保存到我们现在的的一个说明所预先假定的,那就是,尤其是居勒尼的阿里斯提卜首先被“苏格拉底的名声”吸引到了雅典<sup>②</sup>。所有这些事实清楚地包含的是,和某些现代的描写相反,苏格拉底从他的生活的早期起,在远离雅典的知识界中就是众所周知的一位杰出的人物。这跟柏拉图的关于苏格拉

---

① 《回忆录》II .i。这一章表明的对于阿里斯提卜的憎恶可能是安蒂斯泰尼影响色诺芬的一个真实例子。苏格拉底谈到道德故事《赫拉克勒斯的选择》(据色诺芬说,那是苏格拉底从普罗第科的谈话中拿来的),是作为对阿里斯提卜的一个指责。

② 第欧根尼·拉尔修:ii.65。



底作为一个年轻人给像巴门尼德和普罗泰戈拉那样一些卓越的“外国人”所留下的印象的说法是严格地一致的,但是和19世纪把他塑造成一位古怪的天才“无产者”这样离奇的理论是完全不协调的。

关于在早期生活中他的地位的同样看法,也是柏拉图在《申辩》中详细讲述的著名故事所预先假定的。这个故事宣称德尔斐的神谕说:“没有一个活着的人比苏格拉底更聪明”<sup>①</sup>。尽管有少数现代德国著作家持怀疑态度,但是对于这个神谕的陈述是一个历史事实这一点,并不能够有合理的怀疑。柏拉图不可能把苏格拉底描述为在他的法官们面前详细讲述这个故事(许多法官必定都读过《申辩》),除非他真正地谈到过它;并且除非此事已经真实地发生过,否则,讲这样一个故事以及如同苏格拉底所做的那样去提供它的真实性的证人,那就会是极其愚蠢的了。要理解为什么德尔斐的女祭司说出这个神谕,也没有任何困难,尽管某些历史学家他们自己对这件事困惑不解。正如在柏拉图著作中苏格拉底告诉我们的,这个神谕是给他的朋友凯勒封(Chaerephon)的。他曾经提出最主要的问题,“有没有一个活着的人比苏格拉底更聪明?”当然,正如在这种情况下所发生的,凯勒封被给予了他直接要求的答案。真正富有教益的是这个问题可能是有人问过,因为提出这个问题就意味着,苏格拉底可能已经享有这样的声望,以致一位仰慕者能够提出这个问题而不会使他自己处于可笑境地;人们只能询问一个在其周围的人们中已经以“才智”闻名的人的情况。柏拉图说得很清楚,他本人相信凯勒封向神谕提出问题是在爆发伯罗

---

<sup>①</sup> 《申辩》21a 及以下各页。

奔尼撒战争之前,也就是说,在苏格拉底 40 岁以前。在《申辩》中塑造的苏格拉底,述说他在生活的晚期在青年人中所享有的名望,是由于他们从他实践他的使命,即揭露他们的长者的无知而得到快乐的结果;又述说这个使命,是由神谕所说出而加之于他的一种责任。在柏拉图的对话《卡尔米德》中,这种在青年人和正在成长的少年中广泛享有的名望是预先假定的。在那篇对话中,苏格拉底在战争开始时正好从波提迭亚战役(公元前 431—前 430 年)前线回来。他立即去探问雅典“目前哲学的状况”,和询问“青年人”方面对它的兴趣的迹象<sup>①</sup>。因而,在柏拉图看来,发出这个神谕的日期可能更早。

如果柏拉图的陈述能是真实的,那么重要的是详细研究这个神谕的事件了。它似乎给苏格拉底的生活带来了一场精神的危机。根据柏拉图给我们提供的关于他早期生活的说明,我们自然会认为他主要是特殊的知识界中的一位杰出人物,精通他的时代的先进科学,虽然对知识的实际状况深感失望,并且对于哲学研究的前提条件和方法,肯定持有他自己有独创性的明确见解。然而,尽管他受到他的时代的所有知识界人士的尊敬,并且有一批忠实的朋友把他作为所有“智慧之士”中的第一流的人物来敬仰,但是对于这个对所有人负有使命去让他们承认他们的无知(不知道一个人最应当知道的东西,和不知道“照顾他们自己灵魂”的极端的重要性)的人来说,这些都毫无关系。根据柏拉图,这正是明显地把晚期的苏格拉底和学究式的苏格拉底(在阿里斯托芬戏剧中是一种可以理解的讽刺手法)区别开来的地方。

---

<sup>①</sup> 《卡尔米德》153d.

根据在《申辩》中对这件事情提供的说法,这个使命是阿波罗(Apollo)发出的神谕的直接后果。苏格拉底解释说,首先是神关于他的意见使他大吃一惊,因为他充分意识到自己并不具有特殊的智慧。因此,他着手工作,想通过发现某一个人比他自己更聪明的办法,证明阿波罗是一个说谎者。他首先在城市里的杰出的从事社会活动的人们(“政治家”)中寻找这样一个人,其次,在诗人中间寻找,最后在商人和手艺人中间寻找,但是在所有这些场合中都没有达到目的。在最前面的两类人中,他发现完全没有真正的知识;政治家或诗人都不能够就他们的治国之道或者他们艺术的原则作出任何可以理解的说明。手艺人就他们真正懂得他们自己的手艺这一点而论,是胜过其他人的,但不幸的是,他们自以为也同样透彻地了解其他的和更重要的事情。最后,苏格拉底终于理解了预言的真正意思。它的意思是,人类普遍地对一件事情无知,而这是一件最绝对必要知道的事情。那就是怎样指导他们正确地生活,怎样去“照顾”他们自己的灵魂并且“使它们尽可能地完善”;还有,他们对这种无知普遍地是视而不见的。苏格拉底是一个例外;即使他也不拥有这种最高深的知识,但是,他知道它的重要性,并且他知道自己对它是无知的;至少他在“盲人的”王国中是“独具慧眼的”,而且是有生民以来最有智慧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他认为神赋予他以责任去坚持探索最高的知识,并试图劝导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会听从于他,和他一起去探索的同乡人或异乡人)的原因。根据《申辩》,这就是苏格拉底从“智慧之士”变为“道德哲学奠基者”的道路。

当然,很明显,在它的表面上,有一种幽默的成分,在这个叙述中用了神谕故事的方法。但是如果毕竟还有任何意义的话,那么,它必定是企图记录下在它的主要的先决条件中的历史事实,即苏

格拉底在中年经历了一段危机的时期,作为这个危机时期的结果他以一个对“使命”具有清醒意识的人物出现了,而且对神谕的反应在引起危机方面起了作用。柏拉图说他试图使一位有希望的年轻人(柏拉图自己的舅父卡尔米德)“皈依”,那正是在波提迭亚战役之后。在《会饮》中描写了他在那次战役中经历了24小时的“全神贯注”或“出神”,这可能不是无意义的。如果我们知道更多的事实,那么我们可以发现,他被“召唤”成为一位预言家就是在那个幻觉的时候到来的。而伯奈特在提出这点,并说明了以下一点时,会更好,更高兴地受到鼓舞,即为什么在柏拉图著作中我们发现他是如此经常地使用军事任务的语言来描写神是那样地放在他身上的天职的意识。至少这似乎是清楚的,即根据柏拉图所说,作为一个人所具有的对人类的一种特殊责任的信念,在他那里形成的时间确定为大约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的时候,而不是更早。如果我们认为他在凯勒封对阿波罗提出他的重要问题以前,就是他必定已经是的那样一个人,那么我们会发现,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的最初几页中的描写,在《菲多》中对他的早期生活的说明,色诺芬从一个不知来源的回忆中引出的有关苏格拉底和安提封之间的关系,以及令人感兴趣的《云》的讽刺,它们彼此之间是十分协调的<sup>①</sup>。

---

<sup>①</sup> 这正是我不能完全同意C.里特尔在他的《苏格拉底》一书中提供的令人尊重的说明的地方。他完全认识到,我们必须接受柏拉图的有关苏格拉底精通所有他的时代的“先进科学”的叙述,但是他提出这种知识是在早期生活中审慎地获得的,是作为对于那个“使命”的深思熟虑的准备的一部分,在我看来这和柏拉图的叙述不一致,因为柏拉图认为“使命”的意识仅仅在苏格拉底的中年时期才得到的。无论如何,我们一定不要犯这种错误,即设想“神圣的信号”或者“超自然的信号”与这件事有任何关系。柏拉图在《申辩》中宣称要描述这个使命的起源的那一部分,全没有把“信号”与此相联系;当他说到这个“信号”时,也是作为某种追溯到苏格拉底的童年时代的事情来处理的。

我们能够从柏拉图和在大战之前的那些日子里形成的苏格拉底“集团”的其他人那里,收集到某些情况。首先,在他自己最亲密的朋友中有他的富裕而忠实的朋友和同乡克里托,这是一位与他年纪相仿的人。还有易激动的仰慕者凯勒封,这个人由于他的灰黄色的肤色、黑黝黝的脸色和半饥饿的样子而被喜剧诗人加以嘲笑,又被阿里斯托芬作为苏格拉底的同伙来描写,说这个人在苏格拉底的降神会中扮演“神灵”<sup>①</sup>。后来被描绘成“苏格拉底派”的几个较年老的人也许可以被看作是他的一般朋友,如像居勤尼的阿里斯提卜和好争论的、说话刻薄的与禁欲主义的安提斯泰尼;也可能还有我们已经说到的麦加拉的埃利亚派人士欧克利德和特普西昂。当然,柏拉图、色诺芬和埃斯克勒在那时都还没有出生。在比较年轻的人们中(他们必定从大战刚刚爆发起,就跟这位哲学家保持着紧切的个人联系),我们必须首先注意到所有一切人中的最光辉的人物阿尔克比亚德,他是附在雅典的民主政体身上的恶魔,受到民主政体的轮番的诽谤和依靠。其次,柏拉图本人的两个亲属(他的舅父卡尔米德和他母亲的堂兄弟克里底亚),注定要使他们自己遭到的耻辱甚至比阿尔克比亚德更大<sup>②</sup>。根据《国家》的证

---

① 阿里斯托芬,《鸟》第 1553 及以下各行,在那里凯勒封的黑黝黝的脸色是被用绰号“蝙蝠”来加以嘲笑的。在《云》第 503 行,写苏格拉底答应年老的斯特勒普西亚德,说在他的“学校”中勤奋学习的报偿是“像凯勒封一样地成长”,这就激起愤慨的答复,“太缺德了!那样,我将成为一个活僵尸了”。

② 关于阿尔克比亚德对苏格拉底的依恋,柏拉图在《会饮》中作了描述,埃斯克勒也在他的《阿尔克比亚德》的保留下来的部分中作了描述。这件事一直可以追溯到阿尔克比亚德的童年时代,当他于波提透亚在骑兵队中作战的时候,应当已经是一个至少 20 岁的人了。《卡尔米德》描写了克里底亚刚好在波提透亚战役以后向苏格拉底详细地介绍了卡尔米德,卡尔米德那时不过是一个少年。而克里底亚与苏格拉底的联系则被预先假定为是已经存在的事实。

据,我们可以在名单上加上柏拉图自己的哥哥阿狄曼托(Adimantus)与格劳康(Glaucon),和富裕的叙拉古(Syracusan)制造商克法鲁斯一家。克法鲁斯是伯里克利的一个门徒,是著名的演说词作家吕西亚斯(Lysias)的父亲。柏拉图和埃斯克勒进一步描述这位哲学家与伯里克利的比较亲近的集团的成员有亲密的交往,特别是他那位出身下层的夫人、著名的阿斯帕西亚,以及当时最富裕的雅典人希波尼库(Hipponicus)的儿子、非常富裕的卡利亚斯<sup>①</sup>。由于埃斯克勒在失传的苏格拉底的对话《米尔蒂亚德》(Miltiades)中引入了米尔蒂亚德,他是斯特萨戈拉的儿子,是非莱代大家族的成员,这就显出了苏格拉底曾经进入了克蒙集团和伯里克利集团。我们还从柏拉图的《拉各斯》中进一步了解到,他跟梅勒西亚斯(Melesias)的儿子图居第德(Thucydides)家族和伟大的阿里斯蒂德的家族有着一种早已建立的友谊;同样,他也为富裕的、可敬的和不幸的尼克亚(Nicias)所熟知,尼克亚在伯里克利死后的年代中是雅典民主政体的更加稳健的与可信赖的那部分人的领袖,是更富于战斗性的政党(他们相继地造就了克勒昂和阿尔克比亚德这些偶像)的反对者。柏拉图几次暗示他跟另一个更早年代的杰出人物奥阿的达蒙(Damom of Oea)的一段早年的友谊。达蒙是一位卓越的音乐家,像阿那克萨戈拉一样,他也被认为“教育”过伯里克利,并且推动伯里克利实行某些民主的措施。

---

<sup>①</sup> 在柏拉图的《梅列克塞鲁》(Menexenus)中,苏格拉底声称跟阿斯帕西亚有密切的交往,并且,埃斯克勒写了一篇以这种友谊为主题的对话。卡利亚斯在柏拉图的对话中是招待普罗泰戈拉的主人,在色诺芬的《会饮》中也是一位领导人物,这一情节被描写为是在公元前421—前420年在皮莱乌斯他的家中发生的。他生于一个非常伟大的时代,他的政治生涯的最杰出的活动属于苏格拉底逝世以后的时期。

亚历山大里亚时代的著作家还涉及到有关苏格拉底和悲剧诗人欧里庇德之间私人友谊的轶事(欧里庇德很可能比他年长约12岁),并且引证一段同时代的喜剧作品来证实,在这段引文中欧里庇德由于从苏格拉底那里引出他的戏剧的灵感而受到挖苦<sup>①</sup>。当然,在缺乏任何更早和更准确的信息的情况下,除了为悲剧作家与哲学家所共同具有的探究的精神和对因袭的见解的怀疑以外,我们无法断定这些笑料是否有任何根据。一位著名的年轻的悲剧诗人阿加通(Agathon)作为苏格拉底的朋友和仰慕者出现在柏拉图的著作中;《会饮》被说成是描写在他家里为了庆祝公元前415年他的悲剧获得成功而举行的一次聚会。阿里斯托芬是这次聚会中的客人之一,而柏拉图的设想是,尽管有他的在八年前的讽刺剧,他和苏格拉底仍然有着伙伴般的极好情谊。因为,如同我们从《申辩》中看到的<sup>②</sup>,柏拉图认为对《云》的回忆有助于排除在法官的心

---

① 亚历山大里亚时期有关苏格拉底和欧里庇德的关系的流言蜚语,参看第欧根尼·拉尔修,ii. 18, 33。我们多么难以依靠某些这一类的表面上自信的断言,从这样一个事实即可表明:在那样的一个说法中(第欧根尼·拉尔修,ii, 44),欧里庇德被引用为在他的《帕拉梅德》(Palamades)中为苏格拉底之死而责备雅典人。因为,阿里斯托芬在[他的喜剧]《特斯莫弗里亚楚莎》(Thesmophoriazusa, 写于公元前411年)中,讽刺式地模仿了《帕拉梅德》,因此所谓的对苏格拉底之死的暗示是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许多年写成的。也许,整个故事的由来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在柏拉图的《申辩》(41b)中,苏格拉底把帕拉梅德被不公正地定罪的故事说成是与他自己的案子类似的事件。

② 《申辩》19c。M. 罗瑰在他的令人赞赏的版本《会饮》篇(法兰西大学丛书)的“导论”中,作了一次最有独创性的尝试,试图说明柏拉图在对话中论述阿里斯托芬的隐藏的目的在于向这个人报仇,他[柏拉图]正确地认为这个人应对苏格拉底的死负责。这个人使苏格拉底像大酒徒和大淫荡者那样受到公众嘲笑。从各方面说,在我看来,这是出于对一个简单用语的误解,阿里斯托芬的艺术被说成是:“全部与狄奥尼修和阿弗洛蒂德有关”(《会饮》, 177e)。狄奥尼修在这里是作为戏剧的保护人被提到的,而阿弗洛蒂德,我认为提到她是暗示她与司美丽、温雅、欢乐的三女神的联系,是对“娇美”的赞扬,而这正是阿里斯托芬的诗的真正特色。

里造成的给苏格拉底定罪的一种偏见,所以我认为柏拉图自己似乎不太可能在他老师逝世以后想像出这样一种关系。我们宁可同意他的描述是历史事实,并且得出明显的结论,即众所周知,《云》的讽刺在当时对于各方面的人来说,仅仅意味着是在开玩笑<sup>①</sup>。

从我们对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真相和它的居民的生活方式的了解,我们当然可以有信心地认为,任何一个在这样的社会中十分惹人注目的人物(苏格拉底显然就是这样一位人物),必定会会见其他著名的人物。例如,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苏格拉底认识索福克勒、赫罗多德、菲迪亚斯这些人,但是在完全缺乏确切信息的情况下去推测他跟这些著名的同时代人的关系那是徒劳的。

---

<sup>①</sup> 柏拉图在《申辩》中使苏格拉底说得很充分(18d),在那里他把喜剧诗人与其他那些“为了泄恨和歪曲地表现自我”而重复其风趣话的人清楚地区别开来。



### 第三章 苏格拉底的晚期生活： 对他的审判和处死

如果企图重现我们所知甚少的那段时期苏格拉底的生活获得了成功的话，那么，我们必定认为他在40岁时就是在精神和道德上激动的伟大时代的最出色的“知识分子”之一。他在一些团体中非常著名，这些团体特别对心灵方面的问题感兴趣。他对于无形的道德秩序和与周围人们不同的关于神和不朽灵魂的宗教信仰有着深切的关怀，而且对于哲学问题的本性以及应当用来研讨这些问题的方法有着高度独创性的看法，因而自然地，他被广大公众看成是一个有趣的、行为古怪的人，一个书呆子、悖论贩子、自由思想家和巫术师的混合物。在阿里斯托芬的戏剧《云》中，他就扮演了这个角色。现在，我们必须描写他新发现的作为一项使命的布道者而活动的道路。这一布道活动的对象是所有种类和所有条件下的人，它是在“世界大战”(World - War)<sup>①</sup>的年代里进行的。这场大战对于雅典人逐渐地变得越来越艰苦了，它变成了仅仅为了生存面进行的斗争。这就导致了这位预言者与广大普通的善意的公民之间日益增长的紧张关系，并且最后发展到给他判罪，指控他无视公民义务，不忠于雅典人生活的精神。当然，我们一定不要忘记

---

<sup>①</sup> 指伯罗奔尼撒战争。——译者

记,尽管这一长期的斗争最初是一场为保持一个强大帝国而进行的战争,尽管在“尼克亚和平”<sup>①</sup>时期(公元前421年,这个和平协定把严重的敌对状况中止了2年或者3年),不管怎么说,雅典看上去依然是希腊城邦中最强大的;但在这场对抗的后期那些年里,特别是伟大的雅典反对叙拉古的冒险以绝望的失败告终(公元前413年)之后,这个帝国城邦是在进行着她的“背城之战”<sup>②</sup>,并以其道德、政治和经济秩序的彻底崩溃而告终。那些起诉苏格拉底的、善意但眼光短浅的民主派,当时正生活在与安全的、强盛的,从而也是宽容的民主政体(图居第德笔下的伯里克利的“葬仪演说”中所描绘的那种民主政体)大相径庭的环境中。

苏格拉底生活的外部事件,在这场斗争的头10年,即“阿尔克达米亚战争”的年代,除了少量与他的卓越的军功有关的事实之外,几乎没有东西被记载下来。但是,他与人们所知的他的唯一的妻子克珊梯珀结婚,一定是在他生活的这个时期,因为我们从柏拉图那里知道,在他死的时候,他留下了一个还是少年的孩子,也就是说,不超过十七、八岁,还有2个小的孩子,其中最小的一个好像还是襁褓中的婴儿<sup>③</sup>。克珊梯珀和她的长子及两个年幼的儿子的名字提示他们的出身是良好的。亚历山大里亚的传记作者们把克

---

①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年)进行过程中,雅典和斯巴达双方一度均损失严重。公元前421年由雅典的执政官之一的尼克亚(Nicias)倡议,斯巴达也愿接受,双方缔结了所谓“五十年结盟”的和平条约,战争暂时中止,史称“尼克亚和平”,但战争于公元前414年又全面恢复。——译者

② 原文如此,即雅典被击败而不得不进行保卫其城市的“城下”之战了。——译者

③ 根据色诺芬的记载,大儿子的名字是兰普罗克勒(Lamprocles),另外2个叫索福尼斯库(Sophoniscus)和梅列克塞鲁(Menexenus)。

珊娣珀描写成一个脾气放肆、口出恶言的泼妇,但是在柏拉图或色诺芬那里都见不到这类的暗示。在《菲多》中(那是柏拉图提到她的唯一的地方),她仅仅作为一个充满柔情的妻子出现,就在苏格拉底被处死之前,苏格拉底和她有一次长时间的、最后的会见。色诺芬除了关于她的长子认为她负担太重了<sup>①</sup>(像孩子们通常说起一位好的母亲那样),以及安提斯泰尼明显地不喜欢她<sup>②</sup>,此外什么也没有记载。因而,大概苏格拉底只是在中年时才结婚的。亚历山大里亚派有一个故事,说他还有另外一个妻子米尔托(Myrtō),据说他是伟大的阿里斯蒂德(Aristides)的亲戚。但是,他们关于米尔托的故事是自相矛盾的。他们一会儿说她是阿里斯蒂德的女儿,一会儿又说是孙女,一会儿说她是苏格拉底的第一个妻子,一会儿又说是第二个妻子。有时他们甚至断定苏格拉底是同时娶这两个妻子的(显然,这是丑闻制造者阿里斯托克塞努[Aristoxenus]的发明),并且甚至讲出了这样的愚蠢的故事,说他娶第二个妻子是遵照一条想象中的雅典的法规,即为了弥补由于战争而丧失的人口,规定了可以娶两个妻子的法令<sup>③</sup>(从年代上来看,苏格拉底结过两次婚是可能的,但是柏拉图和色诺芬对此未置一辞使得他不像是这样的)。

就我们获得的信息而言,苏格拉底在军队中服役,除了也许是早年参加的伯里克利指挥的对萨摩斯的封锁之外,还参加了阿尔

---

① 《回忆录》II.ii.,在那里,苏格拉底由于他儿子的令人不愉快的态度而责备了他。

② 《会饮》ii.10.,这个不喜欢可以看作是后来的流言蜚语的来源。

③ 关于这则毫无价值的亚历山大里亚的流言,参见第欧根尼·拉尔修,ii.26;阿特莱乌斯(Athenaeus),xiii.556d。

克达米亚战争。柏拉图提到他在波提迭亚包围战(公元前 431—前 430 年)中以特别勇敢而出众,并且在灾难性的德利乌(Delium)战场上再一次表现出那种勇敢的精神(公元前 424 年),在那次战争中雅典军队被波奥提亚人(Boeotians)击溃<sup>①</sup>。柏拉图提到<sup>②</sup>的第三个战役,是在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城下,一般人认为那就是公元前 422 年的那次城外的行动。在那次行动中,雅典和斯巴达双方的指挥官克勒昂(Cleon)和布拉西达(Brasidas)都死去了。然而伯奈特教授却提出,柏拉图提到的这个战役也许就是与安菲波利斯城的建立相伴随的那一次战斗(它大约要早 15 年)。显然,从柏拉图的叙述中可以看出,苏格拉底在军事上的勇敢和沉着镇定的记录享有很高的声誉。在《申辩》中<sup>③</sup>,他被描绘为他以理所应当的骄傲的口气谈到他作为一个士兵的模范行为。在别处,柏拉图也把对他在波提迭亚和德利乌的行为的赞美之词放在最有资格的目击证明人的口中。在《会饮》中<sup>④</sup>,在赞扬了苏格拉底在严峻的战役中对各种困苦的忍耐力之后,还讲到了他的异常地“出神”的故事。阿尔克比亚德讲述了他在那次战斗中负了伤,是苏格拉底护卫了他,并且还说,指挥官颁发给他本人的英勇奖章(相当于我们〔英国〕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公正地说应当颁发给这位年长的人。他补充说,他是苏格拉底在德利乌战役之后灾难性的溃退中沉着镇定的见证人,而且他的自制力远远超过在那次撤退中

---

① 波奥提亚是希腊本岛中部一个城邦和地区,德利乌是该地区中的一个地方,是著名的“德利乌战役”的所在地。——译者

② 《申辩》,28e。

③ 同上。

④ 219c 及以下各页。

的伙伴拉各斯(Laches)将军。在《拉各斯》中<sup>①</sup>,拉各斯本人被用来讲述这个故事,而且评论说,如果雅典军队中的其他人的行为也像苏格拉底那样,那么那个失败是会转为胜利的<sup>②</sup>。柏拉图明显地提醒我们要理解到:苏格拉底是被职业的军人们高度地评价为一位好的士兵的,而这一点无疑会帮助我们说明一些年轻人后来给予他的尊敬。这些年轻人渴望一种军事生涯,像色诺芬和他所憎恶的人、贴萨利亚的雇佣兵队长美诺(Meno)(柏拉图的一篇对话就是用他的名字来作篇名的)就是如此。

在从德利乌撤退和重新开始斗争的最后的年代(那时雅典正进行她的最后的努力以避免被彻底打败)之间,我们没有苏格拉底的任何特殊活动的记录。但是,我们必须记住,正是在尼克亚和平及随着斯巴达占领德克勒亚(Decelea,雅典领土上的一个哨所)而战争于公元前413年总的重新爆发之间的那些年,一定是确立他的地位的最关键的时刻。正是在这些年中,阿尔克比亚德成了好战的雅典帝国主义者的宠儿,而且他以征服叙拉古的孤注一掷的梦想鼓舞了这些好战分子,结果直接导致了雅典本身的毁灭。柏拉图的《会饮》篇中描写的在阿加通家中的宴会的日期,被定在公元前415年之初,恰好在以阿尔克比亚德为主要指挥官的、伟大的雅典小舰队出航前几个月;并且柏拉图描绘的这位指挥官“一边饮酒一边目空一切地滔滔不绝地说着”的图景,无疑地意味着回忆当

---

① 181b。

② 第欧根尼·拉尔修,ii.26。据说苏格拉底在德利乌救过色诺芬的命,但是因为色诺芬在那时肯定还是个婴儿,这必定不过是在波提迭亚援救阿尔克比亚德的一个不准确的说法。

时雅典人民沉溺于其中的那种普遍的轻浮自信的状态<sup>①</sup>。在几个月之内,整个形势都改变了。在雅典被一个巨大的“宗教丑闻”所震动之前,这个伟大的舰队是难于被搞垮的。阿尔克比亚德和他的许多朋友被指控为多次参与对埃留森秘法(Eleusinian Mysteries,它是国家的宗教礼拜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渎神的讽刺嘲弄。阿尔克比亚德立即被召回受审,他在归途中逃跑,并且在他缺席时作了死刑的判罪。与他一起被判罪的有他的叔叔阿克西奥库(Axiochus),还有苏格拉底集团的一个成员,以及一大批其他的杰出人物,显然包含几位柏拉图所描写的在阿加通家的宴会上出场的出色人物<sup>②</sup>。阿尔克比亚德跑到斯巴达去了,并且立即就成了曾经崇拜过他的民主派的最可怕的敌人。当斯巴达人恢复敌对行动时,由于他的出谋划策,他们采取了一个步骤从而改变了整个战争的性质,那就是在阿提卡的领土上建立起永久性的加强的军事哨所。阿尔克比亚德此时已是一个公开的叛国者和一个被判成死罪的人了,并因亵渎神圣在宗教上被革出教门受到诅咒。苏格拉底从此以后在许多可敬的公民的心中,必定处于诽谤攻击之下,被看作应对被认为是他的“学生”的错误行为负责。真的,在公元前411年反民主派的政变(所谓的“四百人寡头统治集团”)失败之

---

① 当然,我们无法确定这次“宴会”是否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尽管我想它很可能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无论如何,柏拉图在描写当时的情感状况时所采用的语调是谨慎的。

② 对于这整个丑闻的最充分的描述——当然是一个片面的、偏袒的描述——是演说家安多克德在他的演说《论秘法》中作出的。他本人也是犯罪一方的当事人,他曾变成了一位告密者。被控告的人中有3个人与我们从《会饮》中熟悉的名字是同样的,即菲德鲁斯(Phaedrus),埃瑞克西马库(Eryximachus),还有后者的父亲阿库门努(Acumenus),前两人都是对话中的发言者,这很难说仅仅是一个巧合。

后,阿尔克比亚德重新开始为他的同胞工作而不是反对他们,而且确实一度在凯旋式中被召回到雅典(公元前 407 年)。但是公众的热忱的潮头很快就过去了,他再一次被流放和得到了坏的名声。这时,苏格拉底在其生平中第一次在公众事务的舞台上作为一个演员而突然浮现出来。

这是在公元前 406 年的秋天。雅典人在那个夏天,在最危急的时刻,在阿尔吉努群岛(islets Arginus)附近(在列斯波岛和亚洲大陆之间)以一场伟大海战的胜利挽救了他们免遭最后的失败。但是这次胜利付出了 25 艘船和 4000 人的生命的代价。据说牺牲的这些人中多数是可以抢救的,但是由于指挥官们的应当受到惩处的疏忽而丧生。于是决定用一种在雅典叫做“eisangelia”的程序<sup>①</sup>、<sup>②</sup>来审判这些曾经掌握着他们的生命的将军们,并且这个起诉进一步要求所有这八名犯罪将军的命运整个地由一次单独的投票来决定。因为这是直接违反正常的宪法程序的,五百人会议的元老委员会(即所谓 Prytanes,它的任务是准备公民大会的议事日程并主持它的会议)为了他们的荣誉而强烈抗议,并且宣布他们不能把这样的非法提案交付投票表决。尽管苏格拉底的“神迹”(sign)拒绝同意他卷入政治来危害他的“使命”,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在这个城市的极度困难的时刻为它服务。他同意他自己被提名为元老,并且在这个情况下当选为 prytanes 委员会的成员。经过长期和激烈的讨论之后,prytanes 的其他成员的抗拒被起诉者要把他们的名字也列入起诉书中去的威胁征服了;而苏格拉底仍然

---

① 这就是说,这个案子不由一个宣誓的陪审团而由公民大会的投票来判断。这样它就类似于“剥夺公民权利的法案。”

② “eisangelia”这个字的古希腊文原意是“粘合在一起”。——译者

岿然不动,但是他的坚定的抗议被压倒了。这些将军们被交付审判并且作为一个整体都被定了罪,他们之中实际在当局手中的6个人立即被处决了。但是苏格拉底有权利来讲这个故事,正如他在他自己受审判时所作的那样,以证明他纯洁的正直和对于法律事业的无畏的献身精神<sup>①</sup>。

在公元前404—前403年那些不愉快的月份里(也就是在雅典向吕山德<sup>②</sup>投降之后),苏格拉底有机会表明他既不愿受寡头政治的奸党的威迫,也不愿受愚民所加给的威迫。雅典无条件投降了,而残暴的斯巴达人(由于战争中的运气,或者也有可能是由于她[雅典]自己的指挥官的背叛,使斯巴达人控制了局面)并不打算让民主政体继续存在下去。在吕山德的压力之下,一个30人的委员会被指定了,受命为这个城市未来的政府起草法规。不幸的是,他们没有执行指定给他们的任务,而是把他们自己组成为一个暴力的寡头政治的革命政府,强迫较激进的民主派人士离开这个城市,把他们安置在皮莱乌斯港,并且以大量的任意处决和没收财

---

① 柏拉图对这件事的叙述见于《申辩》,32b—c;色诺芬在《希腊志》(Hellenica) I. vii 中详细地讲述了这次审判的经过。柏拉图大概是(色诺芬同样也大概是)这个事件过程的目击者。这两个讲述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完全说清楚究竟 Prytanes 的其他成员被威胁撤回他们的反对这个场面是发生在公民大会上呢还是发生在元老会议上。色诺芬在《回忆录》(I. i. 18)中提到这个事件时说,苏格拉底实际上是这个 Prytanes 委员会的主席。在他自己较早的、讲述得非常详细的《希腊志》中对此什么也没有说(在柏拉图那里也没有说过)。这可能是他记忆上的疏忽,正如他在同一句话中在提出被定罪的将军的数目是9个时肯定是记忆上的疏忽一样,因为仅仅8个人被定罪,仅仅6个人实际上被处死。在《高尔吉亚》中提到一个场合,当时苏格拉底是那样一个委员会的主席并且在进行一次投票时出了某种技术上的差错(《高尔吉亚》474a),那似乎是指某一次早得多的事件。一个人确实能够不止一次地成为雅典元老院的成员。对于这个轰动一时的案子的详情,参看格罗特《希腊史》C. IXIV。

② 吕山德(死于公元前395年)是斯巴达军队的指挥官。——译者



产的办法来污辱他们,直到强迫他们被驱逐为止。在公元前 403 年,一个温和的民主政体重新建立起来了。苏格拉底的交往密切的朋友中的两个人在这场不光彩的事务中是很突出的。这就是苏格拉底的不幸。一个是柏拉图母亲的表兄弟克里底亚,他是“三十暴君”中最狂暴的那个派别的首领;另一个是卡尔米德,他是柏拉图母亲的兄弟,是三十人委员会主要成员之一。还有,像在阿尔克比亚德的案子中那样,从现象上看,苏格拉底是在“培养叛国者”<sup>①</sup>。他一反常态,对当局尊敬有加,同情在伯里克利死后成长起来的那种民主制,并且,和他的老朋友凯勒丰不同,当进步的民主派撤退到皮莱乌斯港时,他感到没有必要离开雅典。然而,这个城市的短暂的主人们深知,他肯定会以他自己习惯的、对公众事务说出自己意见的锐利的方式,来批评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抓住他对于他们的第一批非正规的处决的刻薄评论<sup>②</sup> 的时机,把他传讯到他们的面前,并且禁止他与年轻人交谈,借口是他触犯了他们的一条法令,即禁止教导说话的艺术。苏格拉底用某种富有特色的幽默的说明来反驳,说明不可能服从那样一个禁令,结果克里底亚对他进行了一番恐吓之后就把他放了<sup>③</sup>。接着一个更为严重的威胁的活动是企图把苏格拉底本人牵涉进一件行政当局的谋杀活

---

① 唯一公正的是记住:这些人也许是受他们的处境所提供的诱惑而“丧失了他们的理智”。克里底亚以前是作为一位诗人和有广泛的文化素养的人而知名的。他的政治倾向肯定是民主制的。如果信赖色诺芬的话(尽管从个人的认识来谈这件事情,他是太年轻了),正是苏格拉底本人首先鼓励卡尔米德去克服他天生的羞涩而投身于政治的(《回忆录》Ⅲ. vii. 1.)。

② 他说,他以前从来不知道一个放牧的人会自夸他减少其牲畜的数目的本事(色诺芬:《回忆录》I, ii. 32)。

③ 整个故事见于色诺芬《回忆录》I, ii. 32—38。

动中去<sup>①</sup>。他和其他4个人得到特别的命令去逮捕萨拉米的莱昂(Leon of Salamis)。该人是一位富翁,寡头政府想没收他的财产。其他人执行了这个任务,莱昂按时被谋杀了。但是苏格拉底径直回家了,尽管他估计为了这个不服从,而且是为了结束这个恐怖政府的所谓反对革命,他会付出他的生命<sup>②</sup>。

正是苏格拉底与“叛国者们”的联系所引起的不信任,导致了重建的民主制的领袖们在公元前400—前399年把他带到了审判台前。阿尔克比亚德与克里底亚两人都死了,但是民主派并不感到安全。因为被想像为曾鼓动他们叛国通敌的那个人仍然在公众生活中有影响。安特米昂(Anthemion)的儿子安尼托(Anytus),这个诉讼的唆使者,似乎没有什么卑鄙的动机。他也不是一个政治的或宗教的狂热分子。在政治上,他是一个温和的民主派,并且在“三十人”政府垮台后是主张对抗派别之间实现和解的一个主要的促进者。他拒绝寻求对于在篡夺的情况下遭受的巨大的个人损失的补偿,以此来证明他对这个原则的忠诚。他也不是宗教狂热分子,因为在他支持以“不敬神”之罪控告苏格拉底的那一年,他也在帮助替当时以同样罪名受审判的演说家安多克德辩护。他也不希望流血。他要求判苏格拉底死刑的目的,仅仅是想使他考虑自己的安全而退让到同意放逐,并让这个公案以不到案(default)<sup>③</sup>而了结。有人曾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个起诉一直拖延到

---

① 柏拉图说,这是“三十暴君”的一个通常的手段。他们妄图挟持尽可能多的人参与他们的犯罪活动,以便在找他们算账的那一天用以保护他们自己。

② 柏拉图:《申辩》32c—d。

③ 这正是《申辩》29c所引用的安尼托的话的意思,即或者苏格拉底应当不出现在法庭上,或者死的处罚必须加以坚持。

民主制重建之后的第四年。对此的解释是公元前 404—前 403 年的革命和反革命给法庭的日常工作带来了混乱；阿提卡法律的整体需要加以修订和整理，而任命来承担这项工作的委员会直到公元前 401—前 400 年才完成了它的任务。这就是为什么对苏格拉底的诉讼在公元前 400 年之前不能着手进行的原因<sup>①</sup>；事实上，安尼托一旦在它真正可以进行时就进行了他的活动。

像安尼托那样著名的温和的政治家，当然不能作为这种案子的实际起诉人出现；这个任务指派给了一个不太知名、相当年轻的人，此人叫做梅勒托 (Meletus) (这个起诉者可能不是阿里斯托芬在《蛙》中所提到的那个也叫这个名字的诗人，但他可能是那个诗人的儿子)。指控安多克德“不敬神”的人也叫梅勒托，由于这个名字是不常见的，很可能是同一个人。那被看作是梅勒托反对安多克德的演说词保留在归之于吕西亚斯的集子里，而那是一个放肆的宗教狂热分子的讲话。如果他就是控告苏格拉底的那个人 (这是非常可能的)，这将会立即解释为什么“不敬神”会用来作为正式的罪名。这将保证安尼托的工具会自愿地做他的工作。这在安尼托的行为中是一个很坏的特征，即为了实现他相信是有益的目的，他会使用一个他鄙视的人来作工具。他自己在这个诉讼案中的职责只限于发表一个支持这个起诉的正式演说。相似的角色由第三个发言者吕康 (Lycon) 扮演。对于这个人，除了苏格拉底在柏拉图的《申辩》中说他是一个职业“演说家”外，我们一无所知。

由于对苏格拉底控告的辩护在技术上是属于反对城邦的宗教的，这个案子就属于在雅典叫做“国王”(King)的官员来审理的职

---

① 对这一点的充分的解释，见伯奈特对柏拉图的《欧惕弗罗》4c, 4 的注释。

责范围。这个所谓“国王”是九位行政官员中的第二位。这九位行政官员集体地称做“执政官们”(archons)。宗教就特别的属于“国王”的职权范围。他的任务是,首先看控告是在恰当的合法的形式之中,把被告对于控告的答复记录下来,取得两方证人的证词<sup>①</sup>,以及为将此案提交给一个群众性的陪审团而作一些其他的必要的预备性安排。在实际进行审判时,国王还得主持这个诉讼,但是重要的是记住,他没有一个英国法官的职责。他既不能评论证据,也不能排除两方中任何一方提出的无关的任何材料。陪审团成员本身既是“法律的法官”又是“事实的法官”,而且也是对什么是有关的证据这个问题作出裁决的法官。因为他们是一个由许多人组成的团体(我们将会看到,苏格拉底是被一个500人的团体审判的),是这桩诉讼开始时用抽签的办法产生出来处理这个案子的,并且采用秘密投票方式表决。面对这样一个法庭受审判,实际上是一个人面对一个“公众的会议”。我们在读柏拉图叙述的辩护时,应当记住这一点。

当然,我们不知道梅勒托原先提出的控告苏格拉底的罪名是什么,因为官方的记载只保留由国王提交给法庭判刑的最后的说法。在柏拉图的对话《欧惕弗罗》中,谈话的日期是在诉讼的预备性阶段,苏格拉底说梅勒托控告他是“新神的制造者”<sup>②</sup>。但是这一点在实际审判时提出控告的种种理由中什么也没有说。与此有

---

① 在法庭上,对证人既不检查也不盘问;证据由预备性阶段发誓作证的文字记录所构成,不能再加进新的材料。然而每一方都被允许向对方提问题,而且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答复。

② 《欧惕弗罗》3b,推测起来,或者是“国王”倾向于接受这种形式的控告,或者是安尼托诱导梅勒托把它变成较含混的“新的宗教仪式”的指控。

关的最精确的说法大概是在第欧根尼·拉尔修的书提供的<sup>①</sup>。它看来是在公元2世纪时仍然保存着的实际文献的抄本。“梅勒托的儿子梅勒托,(住于庇托斯区),控告苏福罗尼斯库的儿子苏格拉底(住在阿罗珀克区)。他发誓确证以下事实。苏格拉底的罪过是:(1)不崇拜本城邦所崇拜的神,而是介绍新的和不熟悉的宗教实践;(2)更有甚者,他腐蚀青年。本起诉人要求给以死刑处罚。”<sup>②</sup>

我们必须小心,不要误解起诉书中两个子句中的任何一个。肯定地,第一个指控并不意味着苏格拉底主张我们所说的“异端邪说”,也并非是不相信约定的神话中的故事,像他在柏拉图的对话中经常承认的那样他并不相信它们。雅典城邦的宗教整个地是一个崇拜的问题,或者说 *cultus*[礼拜、祭礼];它没有神学的教条,也没有圣书。因此不相信荷马和诗人们的神话,肯定不是对宗教的触犯;当时流行的观点是:诗人们发明他们的故事是为了他们的公众的娱乐<sup>③</sup>。关于“新宗教的实践”的指控,也显然与苏格拉底的

---

① 第欧根尼·拉尔修:ii.40。它的根据据说是出自阿尔勒的法布里诺(*Favorinus of Arles*),哈德良统治时期的一位知名学者,他似乎看到过原始的文献。柏拉图和色诺芬在叙述起诉书时,他们的说法与此是一致的,但是柏拉图把“腐蚀青年”的罪名放在第一位,也许这是因为苏格拉底在辩护时更严肃地对待这一点的缘故。

② 这是在阿提卡的程序中的一种通常的情况,起诉者提出一种处罚,而被告人,如果判明有罪,则提出一种较轻的处罚。法庭必须在它们当中选定一个,而不允许采取它自己的中间路线。这也许认为是,在这种情况下,罪犯自己的提议会恰好是合理的一种处罚。

③ 欧里庇德让他的赫尔克勒斯在悲剧舞台上宣称全部神话是一个“行吟诗人们的不愉快的寓言”(H. F. 1346)。卫勒尔博士的理论,即认为这位诗人是冒着殉难的危险来作那样的宣称的,是完全非历史的。伊索克拉底(xi. 38—40)明确地指出,与这些故事有关的诗人(荷马、斯特西科鲁(*Stesichorus*)、赫西俄德、奥尔弗斯)的恶运都是由于上天对他们的亵渎神明的言行的正确判决。那个最先提出在神学中制造错误意见是对城邦的冒犯的人,恰恰是柏拉图自己(见《法律》第十卷中的看法)。

“不可思议的神迹”毫不相干。在一般的雅典人看来,那大概只是关于“着魔”的那种人们常见的事实的一个例子,而且从柏拉图的《申辩》来看<sup>①</sup>也是很清楚的,一直到苏格拉底本人提出这一点的时候为止,在审问中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事实上,正像柏拉图所描写的那样,没有一个人,甚至是起诉人本人,知道指控的这个部分的真正意思是什么。然而,如果我们在字里行间仔细琢磨,我们可以合理地在柏拉图的《申辩》中发现什么是梅勒托心中所想的東西,以及为什么不能使他自己说得更明白易懂一些的原因。

在柏拉图那里,苏格拉底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来对付这个指控。他没有说任何东西来反驳“引入新的宗教实践”的指控,而是力图引诱梅勒托落入他设下的圈套:解释“不崇拜城邦的神”这个措词的意思是纯粹无神论的诋毁。于是,他就可以成功地指出这份控诉书的两部分之间的不相容性<sup>②</sup>。容易看出,这不过是幽默的一种合法的使用,让被告人哑口无言,既不能够解释,也不敢解释他自己的真正意思。他的意思是什么,在柏拉图的《申辩》中的前面一节中<sup>③</sup>已经指明了。在那里,苏格拉底强调由于缺乏任何更特

---

<sup>①</sup> 在《申辩》31c中,苏格拉底自己有机会来讲关于“神迹”的故事,他指出,它“也许就是在他的控诉中加以漫画化了的東西”。但是,恰恰是必须由苏格拉底来讲这个故事这个事实,当然证明了梅勒托未曾讲过它。这正是为什么说他的“漫画化”不是在他的演说中作出的,而是在他的控诉状中作出的理由。正如伯奈特在前边提到的地方所说的,苏格拉底幽默地装作他不过刚刚发现这个指控的神秘语言是什么意思。柏拉图笔下的狂热分子欧惕弗罗(《欧惕弗罗》3b)提出“神迹”也许是梅勒托把苏格拉底叫做“新神的制造者”之所指,而色诺芬(他无疑读过这些对话)重复了这个提示(《回忆录》,1.1.3),但是仅仅指出在关于这个“神迹”的事实中没有任何东西支持所谓“不敬神”的指控。

<sup>②</sup> 《申辩》26b—27c。

<sup>③</sup> 《申辩》18a—19d。

别的事情来断言反对他,这个起诉就退而成为对作为一个阶级的“智慧之士”及研究科学的人的责难。这种人就像 1/4 个世纪前阿里斯托芬的戏剧《云》中的那一类人。问题在于伊奥尼亚的研究科学的人习惯于在一种完全非宗教的方式下使用“神”这个字来表示“气”或任何其它的他们主张的多种事物由之构成的永恒实体。这就是为什么阿里斯托芬曾让苏格拉底在他的学校里说“诸神”并不是“流通的铸币”,并且将他描写成教导说宙斯被旋涡运动废黜了,并对着一组“他自己臆造的神”混沌、呼吸、以太和云发誓的原因<sup>①</sup>。实际上,苏格拉底的意思是这个“无神论”的指控不过是基于使法庭怀有偏见的企图罢了。其手法是向它提示古老的伊奥尼亚科学的一般声誉。(也许,梅勒托可能依靠对公元前 415 年关于“亵渎秘法”的流言的回忆,阿尔克比亚德和苏格拉底的其他朋友曾被卷入这个流言之中;尽管在《申辩》中并没有说过任何有助于表明这一点的话。他也许甚至依靠有些陪审员会知道那件事的可能性,甚至在最近不久,苏格拉底曾和从刚刚停止其为“敌对城邦”的那些城市来的年轻的毕达哥拉斯派仰慕者还有过交往。)为什么起诉人不能把他们自己解释得更坦率些,现在变得清楚了。根据大赦的规定(它使得公元前 404—前 403 年的混乱得以结束),不得传讯任何公民要他回答在这个日期之前所犯的罪行,不得控告早于这个日期法庭可以接受的触犯刑律的行为。作为大赦的一个主要倡导者,安尼托的任务应当是看到它的条件不得被明显地加以违反。

第二个指控(“腐蚀青年”)的意义是比较清楚的。的确,在实

---

<sup>①</sup> 参看阿里斯托芬:《云》247,252,264,367,380,627 等行。

际审判时,起诉人和他的支持者们似乎让他们的意思含混不清。至少,在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声称,他极其迷惑不解他被指责为对他的年轻的朋友们做了特别有害于他们的事。他说,它既不可能是教给他们那种关于自然科学的“废话”(这是在阿里斯托芬的戏剧中让他说的东西),也不可能是练习作职业智者的行业。人所共知,他并不是一个职业的“教育者”,也没有一个“学生”,并且同样人所共知的是被阿里斯托芬漫画化的科学思辨并不是他谈话的主题。如果他们的起诉人是公正的话,他们应当承认所说的对那些乐于听他对同胞们的仔细考察的青年的害处,真正的意思不过是暴露他们的那些年长的人的自满的无知罢了。在这些字义行间细琢磨,可以发现真正使安尼托生气的是苏格拉底批评像他那样的政治家的无能,企图降低他们的威信并且使得在较年轻一代的激进者中间在思想上对民主制和宪法产生批评的态度——这确实是事实<sup>①</sup>。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论,某个比这更糟糕的事情必定是指控的真正要害,但是起诉人有理由不把它用明白的言词表达出来。

什么是他们的主要用意,我们还可以在色诺芬的《回忆录》中看到,那是一篇回忆苏格拉底以反对一位“控告者”所写的攻击之词的辩护词。这位控告者显然就是智者波吕克拉底,一个不知名的作家,他在这次审判过了几年之后,把安尼托和梅勒托的起诉写成文学体裁。色诺芬也提到,在一两处小的地方,“控告人”歪曲了苏格拉底的性格。他控告苏格拉底教青年人尊重老一代人,并

---

<sup>①</sup> 《申辩》19d—20c,23c—e,24c—26b。



从诗人的作品中引出不道德的意识<sup>①</sup>。但是色诺芬最急于加以驳斥的特别“指控”，是某种更为明确得多的事情。“控告人”指责苏格拉底教育了克里底亚和阿尔克比亚德，而色诺芬用了很长的篇幅争辩说，这两人与苏格拉底交往了很长时间来学习他的无与伦比的技能，但他们把它滥用于他们自己的目的<sup>②</sup>。在这个审判中，任何对这两个大“叛国者”据说有影响的事情都被公元前404—前403年的大赦豁免了，而安尼托无疑是小心地使这个指控搞得含糊些。这就是当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极力否定他曾有过一个真正的“学生”时，我们为什么不能立即看出与此有关的要害的原因。<sup>③</sup>波吕克拉底在他的小册子中脱口说出了法律程序的形式只允许梅勒托暗示的东西。我们从伊索克拉底那里看到，他用了许多言词来指控苏格拉底是阿尔克比亚德的老师。伊索克拉底以否

---

① 《回忆录》I . ii (随处可见)。所论及的指控是：教导青年不尊重他们的父母，批评像用抽签任命官职那样的民主制的宪法，教育阿尔克比亚德和克里底亚，从诗人的诗行中得出坏的意思。因为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老是以讽刺的态度对待诗人及其作品，并且因为在李巴利乌(Libanius)写的《苏格拉底的申辩》中有大量同样的指控(李巴利乌是公元4世纪一个有名的修辞学家，《苏格拉底的申辩》看来显然是根据波吕克拉底的小册子写成的，所以，关于诗人的问题很可能在审判中被强调是这个案子的一部分，并且苏格拉底很有可能真的说过一些据说对他不利的、关于诗人们可疑的道德的话。

② 《回忆录》I . ii . 12：“控诉人说两个曾经与苏格拉底熟悉的人作出了比任何一个人更为伤害这个城邦的事；克里底亚是寡头政府的最贪婪和暴戾的人物，而阿尔克比亚德是对民主制的最没有原则的和无法无天的人物。”色诺芬对此作了长篇的答复。出处同上，13—16，24—28。

③ 《申辩》33a：“对于任何一个被不正确地说成是我的门徒的人，或任何其他的人，我从未作过任何不公正的让步。我从来也没有当过任何人的老师，”等等。“那些被说成是我的门徒的人”所指的人，并不是柏拉图和他那时的青年。他们从未做过任何不利于这个城邦的、任何人会认为苏格拉底应对之负责任的事。我们从柏拉图本人那里知道(《书信》vii . 325b)，只是由于对苏格拉底的判罪，才使得柏拉图放弃了作为重建的民主制的拥护者而进入政界的计划。

认有这个事实来作回答,恰恰像柏拉图让苏格拉底本人所作的一样<sup>①</sup>。他必定就克里底亚也说了同样的话,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50年后演说家埃斯克勒能够提醒雅典人说,你们之所以把苏格拉底处死,是因为他曾经是克里底亚的老师<sup>②</sup>。对于这个指控的动机是不可理解的,除非理解到安尼托确实认为苏格拉底及其教导要对给予雅典的伤害负责。他教导了那个给了她致命一击的敌人,教导了另一个在她覆亡之后成了恐怖政府的首领的人。毫无疑问,安尼托的不信任由一种对所有著名的民主制的政治家的毫不留情的批评所激起(在柏拉图的对话中苏格拉底本人经常作出这种批评)。他曾经有过被苏格拉底严格检查而蒙受羞辱的亲身体会几乎是肯定的。但是他的敌意的真正秘密则隐藏得更深。事实上,苏格拉底并没有教导过这两个作了最严重的事情来摧毁他们的城邦的人;但是,他曾经是这两个人朋友,而且人们不可避免地会设想他另外还做了某种事情,这是他的不幸。<sup>③</sup>

使大家普遍感到吃惊的是,苏格拉底并没有自愿流亡,而是安静地在雅典等候审判,而这审判在公元前399年的春天或初夏时就来到了。无疑地,从他的严格的宪法主义者的观点看来,城邦有权对一个公民的品行进行审查,而面对这个调查则是一个公民的简单的责任。他的辩护词由柏拉图保存下来了。他出庭了。这篇

---

① 伊索克拉底, xi. 5: “你[波吕克拉底]让阿尔克比亚德给他作学生, 尽管没有人曾听说过他曾受教于他。”

② 埃斯克勒, i. 173: “你们之所以把智者苏格拉底处死, 是因为他被看作曾经教导过克里底亚。”

③ 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在最近的战争时期对于一位已故的哲人式的政治家倾泻的恶骂(主要的理由据说是他似乎说过一句关于他的“精神之家”的话), 我们将会更好地理解这个形势。

演说是那样的富有特点,以致我们可以相信柏拉图的文本是以最大的精确性来复制的<sup>①</sup>。苏格拉底并不企图求死;相反他清楚地说出,他期望光荣地被宣告无罪,仅仅只要那个宣告无罪不包含对真理的危害<sup>②</sup>。对于他与阿尔克比亚德和克里底亚的关系,他是小心的,如像对大赦精神的忠诚所要求于他的,不说任何超出一个简单事实的东西,那就是他没有作过任何一个人的“老师”。他解释说,广为流传的对他的误解是由于回想起阿里斯托芬和其他喜剧诗人们对他的讽刺。至于说指责他关于“新的宗教的实践”和“忽视崇拜神”,他只指出梅勒托本人或者不愿意、或者不能够解释它的意思是什么。关于“腐蚀青年”的断言,他较为严肃地加以对待,尽管仍然是完全轻松的。他提出驳斥并要求柏拉图的较年长的亲属和其他的年轻朋友们来反驳它。如果他的目标仅仅是(事实上并不是)无论如何保证得到宣告无罪,那么他应当谈到他的某些卓越的军事功勋,以及他在萨拉米的莱昂的问题上与克里底亚的勇敢的对抗,这样事情也许就会了结了。但是这样一种辩护将会是对他的“使命”的一种叛逆行为。因而,他没有作任何努力来避免那总是与多疑的雅典人的民主制相联系的、对于超群的“聪明”的声誉的公愤。他把宣布他是最聪明的人的神谕作为他演说

---

① 对于这一点,德国的某些学者一度提出过疑问,其实,那不过是由于他们假定一个被控告者的第一个目标必定总是不惜任何代价“逃脱处分”。这对于大多数人会是真的,但不是对所有人都是真的,而且对像苏格拉底这样的人尤其不是真的。

② 这是柏拉图的说法(《申辩》19a)。色诺芬在他后写的《申辩》中,也像有些德国人那样对柏拉图笔下的演说词感到困惑。他承认这篇演说词是真正再现了苏格拉底的“崇高的声音”,但它不是一个仅仅渴望宣布无罪的人的明智的谈话,因而进一步提出荒唐可笑的见解:苏格拉底故意地激怒法庭给他定罪,以便“走掉”,而不遭受老年人的瞎眼和其它疾病的痛苦!(色诺芬:《申辩》1—8)

的中心,而且用一种不加掩饰的方式来描述他的方法,即引导他着手这样一项工作,它使得所有人(从主要的政治家到一般人)确信他们对于一种决定性的知识,即如何使一个人自己的灵魂尽可能是善的知识,是不光彩地无知的。他说,停止这项使命那将是对神的背叛,而法庭可以相信除了死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他执行这个任务。甚至在演说讲到他的军功和莱昂事件时也仅仅是说明在演讲人那里要抛弃明显的责任是多么的不可能,而那个对抗克里底亚的故事是与审判阿尔吉努的将军们时同等勇敢地对抗民主制本身的事件联结在一起的。因此,并不奇怪,尽管法庭判他有罪,但只是以微弱的多数通过这一判决。当我们考虑到演说的声调和陪审团实际上是一个公众会议这一事实时,就这个范围而言,这个结果要归之于他们的思想上的自由而不是其它<sup>①</sup>。

现在,苏格拉底必须为他自己提出一个处分的意见以代替那个死刑的提议。每一个人必定都设想他会提议流放,而且显然,如果他那样作了的话,法庭会感到满意。但是,在这里他再一次地以真诚的态度对待他自己的原则。他说,他认为他的使命是神送给雅典的礼物,而他的价值应当被认识到而授予他以特殊的权利,像给予奥林匹亚赛会的胜利者、卓越的将军和少数其他人的一样,应当终身在普瑞塔尼乌姆<sup>②</sup>的公共餐桌上有一个席位。持有这样的

---

<sup>①</sup> 我们从柏拉图那里知道(《申辩》36a),主张判罪的多数是60人,在第欧根尼·拉尔修,ii.41中则说苏格拉底以281票被判罪,比主张宣告无罪的票要多些。这里有某些混淆。似乎最可能的是(参看伯奈特在此处的注释),陪审员的总数是500人;而280票主张判罪,220票主张宣告无罪。

<sup>②</sup> 普瑞塔尼乌姆(Prytaneum)在雅典是“主席团”的意思,由用抽签产生的来自10个部落的50名代表组成轮流担任公务的“主席团”(任期35—36天,约为一年的1/10),即处理城邦的各项日常政务,并在其任期中召开的“五百人会议”或(转下页)

看法,他不能自觉地提议使他自己承受流放,或其他任何真正的罪过。然而只有罚款不表示罪过,如果一个人有钱来支付的话,而苏格拉底问心无愧地提出了交纳那样的罚款。因此,他提出交纳一笔他能立即交出的一个米那(Mina)的罚款<sup>①</sup>,并且立刻补充说,克里托、柏拉图和其他朋友曾劝他将罚款金额提高到30米那,他们愿意为此作保。很自然,那些陪审员被这个不妥协的讲演激怒了,他们中大多数人<sup>②</sup>投票赞成判他死刑,少数人赞成判他有罪。

根据柏拉图和色诺芬两人,在这个阶段苏格拉底向法官中的那些少数自始至终作了有利于他的宣告的人作了简短的最后的致辞。色诺芬使他除了重复宣称他是无罪的之外,没有说出更多的东西,但是柏拉图的文本则增添了某些更富有特征的东西。他说,对他作出的判决是无害的。充其量,死不过是一场不会被打断的休息,因而并不是坏事。但是还有一个不同的信念(它已表明那是他自己的信念),即对于一个好人来说,死是进入较好生活的一个人口。在那种情况下,苏格拉底可以期望来到正直的和十分聪明

---

(接上页)“全体公民大会”上由他们中的一人担任主席。担任这个职务的人在“主席团”的公共餐厅用餐。他也在那里招待外国使节。城邦中的那些受到高度尊敬的公民和战死疆场的人的遗孤也特许在这个公共餐桌上有一个席位以示褒奖。——译者

① 当然,为了判断这个罚款数目的恰当性,我们必须考察那时白银的高度的交易价值。显然,一个米那通常被看成一个战俘的合理的赎金。30米那被当时的演说家经常提到作为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一个女孩子的可观的嫁妆。我们发现,在一代人之后,柏拉图打算必须给她的侄女以这样数目的嫁妆(《书信》viii., 361e)。色诺芬(《申辩》23)的说法则不同,他否认苏格拉底作出,或者允许他的朋友们作出任何这样的提议。这是故意与柏拉图相冲突,并且不值得信赖。这次审判时柏拉图在法庭里;色诺芬则不在场而远在亚洲,他显然不知道,提出交纳一笔罚款并不是承认有罪。

② 根据第欧根尼·拉尔修(ii. 42),赞成判他死刑的票数比赞成判他有罪的票数多80票。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投票表决会是360票对140票(而不是像伯奈特在《申辩》38c处由于疏忽而说的300票对200票)。

的已死去的法官们面前而得到的快乐。这些法官肯定会把一个被错误信息蒙蔽和具有偏见的法庭的决定颠倒过来,并且他还会遇见昔日的著名人物,包括某些像他自己那样被他们的同时代人公正地定罪的人,并且在那里他的严格考察他的伙伴的天职就不会有被另外的一个死刑的判决打断的危险<sup>①</sup>,如果这是法庭交给他的命运,那么他们就无意中给予了他最大的好处。

在雅典通常的程序是,一个人一经判罪,立即就移交给“十一人委员会”(“Eleven”,它负责执行法律),并且他的处决将在24小时内执行。但是,苏格拉底的案子是个例外。当时有一种风俗:每年派出“圣船”到德洛岛的阿波罗神坛,以纪念史前特修斯(The-seus)废除克罗索的米诺斯强征的“7个童男和7个童女”的进贡。这个城市在这只船派出之前以宗教气氛加以净化,而且宗教仪式的净化规则禁止在这只船返回之前执行任何处决。公元前399年的宗教仪式的净化刚好在苏格拉底受审的前一天开始,因而必须决定对他怎么办。(这件事在作出判决之前是无法处理的,因为,当然没有人会期待苏格拉底如果承认有罪的话,除了流放之外,还会提出任何其它的东西。)富有的克里托作了最大努力来劝导法庭

---

<sup>①</sup> 在柏拉图笔下(《申辩》41b),巴拉麦德是作为不公正地被定罪的典型例子提出来的。复制苏格拉底的这一番话(在这番话中苏格拉底承认了自己与一般雅典人中间对于“未来世界的生活”的信仰有如此不同的看法),与色诺芬的申辩的目的是冲突的。但是更加有意义的是,他没有忘记提到巴拉麦德(色诺芬:《申辩》26)作为与他本人类似的事件。并没有第一手的证据表明苏格拉底是那样说的,因为色诺芬当时远在他乡,但这表明他读过柏拉图的《申辩》,并把它当作真实的谈话。他自己关于最后的讲演的文本,确实是柏拉图再加上隐藏着关于灵魂不朽问题的言词。同样,在《居鲁士的教育》(Cyropaedia, viii, 7, 17以下)的末尾,他也没有考虑辩护的目的,他把一段关于灵魂不朽的演讲放在正在死去的居鲁士的口中,它充满了柏拉图《斐多》中的回忆说。可以合理地推论,他和柏拉图一样从他们的共同的老师那里继承了信仰。

允许苏格拉底仍然保持自由直到“圣船”回来,并作出保证决无逃跑的意图<sup>①</sup>,但是这个提议遭到拒绝。因此,苏格拉底被投入了“十一人委员会”的监狱,还带着某种锁链,尽管不禁止他每天有朋友的陪伴。由于那只船因遇到逆风而逗留了一个月<sup>②</sup>,整个这段时期是在每天的谈话中度过的,而且看得出这位哲学家的某些外国朋友,如埃利斯的菲多和年轻的特比斯人西米亚斯和克贝在这整个时期一直住在雅典。苏格拉底也以生平第一次写作诗句来自娱。他写了一首阿波罗的赞歌,并且把伊索寓言改写为韵文<sup>③</sup>。他说,他终生都为梦想所追逐,即他被驱使去“练习音乐”。他以此来说明他写诗的原因。在过去,他设想这个指令的意义就是他应当为他的“使命”工作,因为“哲学是最真的音乐”。因为这个梦在他被监禁的期间重复出现,当其那项使命不再能实施时,虔诚吩咐他按照它的指示的字面上的意思去做。

苏格拉底的朋友们作出了最后的努力来救他,办法是收买看守他的人,在逃跑的时候给予默许。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了,而且为了消除可能感到的任何勉强,即担心他的同胞牵连在一起可能对他们有不愉快的后果的事件,他的特比斯的崇拜者(阿提卡当局对他们没有约束)准备提供所有必需的资金<sup>④</sup>。苏格拉底,真地按照他的性格,拒绝了利用这个机会。关于他拒绝的理由,在柏拉图

---

① 柏拉图:《菲多》115d。在雅典,监禁不是加给公民的处罚,除非对于国库的欠债者,通常是把他们关起来直到偿还他们的债务为止。

② 这个耽搁有相当长时间,这是柏拉图说的(《菲多》58c);更明确地认为是“一个月”的那种说法则来自色诺芬(《回忆录》IV, iii, 2)。

③ 柏拉图:《菲多》60d 及以下。所说的这两种作品的起首的诗行由第欧根尼·拉尔修(ii. 42)提供出来了。

④ 《克里托》45b。

的《克里托》中作了解释。那就是逃跑会使他终生承认的原则显得愚蠢可笑。那个判决他死刑的法庭的裁决,事实上是错的,并且是由起诉人的不可信的错误描述而取得的。但是,它是一个合法地组成的法庭的合法的裁决,并且城邦因而有权强制执行。反对苏格拉底的错误,不是雅典犯的错误,而是安尼托和梅勒托犯的错误;如果苏格拉底越狱,这将是一个反对城邦和它的法律本身的罪行,而且是一个与公民资格的精神相左的背叛行为。苏格拉底具有一个现代的“拒服兵役者”的对良心的忠诚,并且与对“公众的良心”的尊重相结合。(很不幸,这种“公众的良心”在那种地方是很罕见的)

他在世界上最后一天的故事,柏拉图在《菲多》中谈到了。柏拉图尽管本人不在场,却有从那些在场的人那里获得信息的最充分的手段,并且是写来给他们读的。它也许是欧洲散文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苏格拉底早在两天前的“一个梦中”就已被告知他动身的准确日子。他的朋友们发现他与他的妻子和她的小孩在一起。显然为了必要的休息,他立即打发他妻子和小孩回家去了(克珊梯珀和那个婴儿似乎是在监狱里度过那个夜晚的)。他像平常一样,举止欢快而又坚定——“愉快”对他是天生的,正如对托马斯·摩尔一样——并且说了许多关于他确信的东西:死对一个好人来说是一场戏的开幕,他的整个生命就是这场戏的排演——一场灵魂从身体在“拘留所”或“牲畜栅栏”的限制中解放出来的戏。灵魂迄今为止被神限制在那里。为了神自己的善的目的,灵魂进入一个更好的世界的更大的自由之中。在那个世界里,真理和实在将面对面地加以认识,而无需“通过眼睛的格子窗”来“窥探”。在“哲学”(为了自己的缘故而追求真理)中度过一生,它本身就是为这种



极乐的扩展所作的一个长久的准备,而且它也是对神的真正的服务,神要求我们简单地“使灵魂”——在我们之中用来思想和认识的东西——“尽可能地善”。他说,因为他一生都在致力于这种对神的服务,他可以满怀信心地展望等待着他的未来。当他发现从特比斯来的年轻朋友克贝和西米亚斯因灵魂不过是身体的可以消失的机能这种“科学的”怀疑而大为苦恼时,他贡献出他的最后一个上午,根据他自己认为正当的理由,来与他们一起推论,讨论“灵魂与身体的真正区别”,以及相信它既不与身体一起出生,也不与身体一起死去,而是分享身体所认识的真和善的永恒性的理由。通过整个讨论,他表明他自己同样地不为即将到来的死亡的压抑和对于令人安慰的信念的过分期望所干扰,而对所有可能促使反对这种信念的东西不予充分关注。

这场讨论结束了。它以想象的、在幽冥世界中对好人和坏人的最后审判的图景结束了。苏格拉底离开大家去准备他自己的躯体的葬礼——那是不能由其他人对他的尸体作的必要的仪式——并且和“他家庭中的妇女和孩子们”作最后的私下会见。它一定是一次长时间的会见。因为当他回到他的朋友中来时,春天或者夏天的黑夜已经快要降临了。在日落时,“十一人委员会”的官员——就像我们所说的,“典狱官”——举行了正式的告别式,流着眼泪告别了他所认识的人中的“最勇敢、最文雅、最好的”人。然后,实际执行死刑的人出现了。他拿着一剂毒药<sup>①</sup>,用它在雅典把这

---

<sup>①</sup> 柏拉图没有提到所使用的这种毒药的名称,但是我们从其他的处决的记载中知道,通常用的是钩吻叶芹(hemlock)。对苏格拉底之死的描写表明这个药以发冷来起作用,从双脚向上扩展,伴随着痉挛,当作用到心脏时,人就死亡。从医学上看,在这个场合使用的药物很可能就是钩吻叶芹。参看伯奈特《菲多》附录 I。

位被定罪的人处决。苏格拉底镇静地接过了那个盛毒药碗，并且想“奠酒”来作为他喝之前的感恩祷告，但是由于警告了他这个药剂所准备的量不允许有所浪费而作罢了。他对一次“愉快的离去”作了简短的祷告，然后将那杯毒药一饮而尽，而没有任何反感的迹象。这时，朋友队伍中的镇静被打破了：他们中有几个人公开哭泣着；而且有一个人（阿波罗多洛）是那样地歇斯底里，以致只好由苏格拉底本人来使他重新注意礼仪。按照监狱官员的指导，苏格拉底在那间房子里走动了一会儿，直到他的双脚开始感到沉重为止；然后他躺倒在他的草荐上并盖上了头。用手测定表明：麻木逐渐地往上向着心脏部位扩展。在一阵沉默之后，这位老人把盖在头上的东西掀开一会儿并且请求说：“克里托，我们欠阿斯库勒底乌斯(Asclepius)<sup>①</sup>一只公鸡，不要忘记还这个愿。”这些就是他最后的话。难道他是朦胧地回想起了在他家里的某个也许与一种小儿病相联系的事体吗？或者，是他向医疗之神许了愿，因为他希望从已治愈的生命的狂热中醒过来？稍稍过一会儿，有了一阵痉挛；人们把盖在他身上的东西掀掉并且发现他的生命已经离去。“于是，克里托阖上了他的双眼和嘴，这样，我们的朋友就完结了。这个人我们认为他的时代的最好、最聪明、最正直的人。”

亚历山大里亚的学者讲了雅典人感到懊悔的故事，说他们如何处死了梅勒托并以一座雕像来对苏格拉底表示尊敬。但是这些故事长期以来被认为是难以置信的。苏格拉底被这个重建的民主制的某些卓越的政治家看作是可怕的人物。他们把他看作是阿尔

---

<sup>①</sup> 据说他是帖撒尼亚王子，是一位著名的医生；后来在神话中被说成是阿波罗之子、医药的守护神。——译者

克比亚德和克里底亚的教唆者。这些政治家希望把他撵出雅典。但是没有夺去他的生命的愿望,而且他决不可能是普遍敌意的标志。审理他的案子的法官中有将近45%的人都主张宣布他无罪,这是我们在前边已说过的。而且在他死后也没有普遍的嫌恶的感觉。公众对苏格拉底的情感也仍然是有分歧的,正如对待阿尔克比亚德本人一样,这是由伊索克拉底使用的语言表示出来的。他认识苏格拉底,尽管并非亲密的朋友。伊索克拉底告诉波吕克拉底说,当他在他的小册子里指责苏格拉底是阿尔克比亚德的导师时,他所说的并不是真的;但是,如果它曾经是真的的话,那么对于“那些惯于赞美苏格拉底的人”<sup>①</sup>来说,那将会是比已经给予的纪念苏格拉底的颂扬更加伟大的颂扬了。苏格拉底赢得哲学的殉道者的不朽的声誉,不是由于在感情用事的民主派方面的大众情感的任何惊人的爆发,而是由于天意,它给了他一位历史上的人物,一位年轻的朋友和追随者,他结合了作为一位哲学思想家的至高无上的伟大和作为一位语言大师的同等的伟大,因此直接或间接地成了从他自己的时代以来所有思维着的人们的导师<sup>②</sup>。

---

① 伊索克拉底, xi. 5—6。伊索克拉底无疑读过柏拉图的《申辩》,但是他的语言蕴含着这样的意思:他依靠他的读者中的那些怀念苏格拉底的一批人。至于对阿尔克比亚德的意见的分歧,可以比较伊索克拉底 xvi(这代表一方),以及吕西亚斯, xiv(这代表另一方)。

② 这里所说的“年轻的朋友和追随者”、“哲学思想家”、“语言大师”,指的是柏拉图。——译者

## 第四章 苏格拉底的思想

苏格拉底在欧洲思想史上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我们会立即驳回在这个问题上有时有人主张的两种看法，因为它们不能解释需要加以考察的事实。苏格拉底不是一个像“老好人”那样行动的陈腐道德的说教者，这种道德认为为了功利主义的理由，不合适的方式是要“吃亏”的。这是一种不恰当地强调色诺芬在《回忆录》中的某些部分而提出的对他的看法。那样一个人是不会作为对公众的危险人物而被处死的；他不会赢得柏拉图的倾心仰慕，也不会受到他的时代的所有卓越人物的普遍的钦佩，或者遭到阿里斯托芬实际上给予他的讽刺。你会说，安尼托误解了这个人，柏拉图把他“理想化”了，阿里斯托芬则歪曲了他的形象。但是，必须有某种东西来促使这种误解、理想化和歪曲。他们的主人公必定在某个方面是一个不寻常的人物，事实上是一个独特的角色，一个“有独创性的人”，而我们必须找出他的独特性何在。苏格拉底也不能够像柏拉图的浮光掠影的读者有时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个怀疑论者，敏捷于以独创性的问题来困扰其他人的信念，而没有他自己的强烈的信念。仅仅是聪明的怀疑主义，它的后果将是瞬息即逝的，正如它暂时地令人头晕目眩一样；苏格拉底则创造了欧洲从他起就生活在其中的理智的和道德的传统。怎样能够是这样的呢？这就是必须要加以解释的。

说到底,这个答案似乎是非常简单的,并且它也许最好是以伯奈特陈述它时使用的原来的方式来表达<sup>①</sup>。就我们所能看到的,正是苏格拉底创造了灵魂(soul)的概念,它从此之后统治着欧洲的思维。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对于一个文明的欧洲人来说,他有一个灵魂是一个标准的假定。灵魂是他正常的醒着时的智力和道德性格的所在地。并且因为这个灵魂既等于他本人,也无论如何是有关他的最重要的事物,所以,他生活中的最高事务就是对它作出最大的努力和为它做出最好的事情。当然,有少数人拒绝这个生命的理论,并且他们之中有些人甚至否认灵魂的存在,但他们是一个很小的少数;至今,对于广大的欧洲人来说,灵魂的存在和重要性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学说,它似乎是自明的。的确,作了最大努力来使这个学说为我们所如此熟悉的直接影响是基督教的直接影响——但是当基督教来到希腊—罗马世界时,它发现它所需要的灵魂的一般概念已经由哲学为它准备好了。现在,引人注目的事情是,我们发现作为正常的智力和性格的所在地的灵魂的这一概念流行于苏格拉底刚刚去世之后的那一代人的文学作品中;它是伊索克拉底、柏拉图和色诺芬的共同基础,因而不可能是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的发明。但是,它整个说来,或者几乎全部,都是较早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所没有的。那么,它必定是源出于苏格拉底的某个同时代的人。但是我们知道它不能归之于除了苏格拉底本人以外的当时其他任何思想家。正是苏格拉底在柏拉图和色诺芬两人的著作中一贯地作了这方面的教导。

---

<sup>①</sup> 特别参看伯奈特的论文《苏格拉底的灵魂概念》(英国科学院院刊, viii. 235—260)以及他发表在哈斯廷斯的《宗教和伦理百科全书》xi 中的条目:《苏格拉底》。

当然,自从荷马以来,在希腊的文学作品中,我们经常听到一种叫做“精神”(psyche)的东西。但是重要的是,在较早的文学作品中也许没有任何一段文字中的“精神”(psyche)<sup>①</sup>具有那许多世纪以来“灵魂”<sup>②</sup>对于我们所具有的意义,即自觉的人格,根据它所得到的“照顾”和训练,它可以是聪明的或愚笨的,有德行的或邪恶的。在较早的文学作品中,“精神”(psyche)的常规的意义是按照使用这个字时是从荷马或者是从奥尔弗斯教那里引申出来的这两种情况当中的一种而定,并不与我们一直被告诫要称之为“灵魂”(soul)的东西等同。

在荷马那里,psyche 的意思在字面上完全是“鬼魂”的意思。它是某种在人活着时呈现在一个人那里的东西,而在死时就离开它。事实上,它就是“鬼魂”,是一个正在死去的人所“抛弃”的东西。但是,它并不是“自己”,对于荷马来说,“英雄自己”是与他的“鬼魂”不同的东西,是他的身体。尽管一个人在他的 psyche 离开了他时不能活着,但是它并不被看作与我们现在称呼它[为“心理”]那样与人们的“精神生活”有任何关系;按荷马的说法,“精神生活”是由 kear[心]或 phrenes[横膈膜]来进行的,而它们都是身体的器官。并且,离开了身体的 psyche,无论什么意识都没有,它只不过是人的影子或在池塘中的倒影。离开了身体的 psyche 所能做的全部事情是不时在活着的人的梦中被看到。这样,归根结底它不过是“呼吸”罢了,当一个人活着时吸入它,而当他“断气”时

---

<sup>①</sup> 在古希腊文中都是“psyche”这个字,但荷马等早期诗人赋予它的含义是“生命”、“精神”,死后可以与躯体分离的“鬼魂”。苏格拉底强调的是作为自觉人格和决定人的贤、愚、德行等“精神生活”的东西。详细分析见以下的文字。故此处中译文用了两个不同的字以示两个不同概念的区别。——译者

就最后地把它呼出来。伊奥尼亚的科学在考察 psyche 时就是从这些概念开始的,并且把 psyche 的非个体化推进得更远。它的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我的 psyche 仅仅是我吸入的那一部分周围的“气”(air)。“气”本身是“神”,所以它有意识,而且那就是为什么恰好在我能继续用“这个神”的新鲜的部分补充我的系统的这么长一段时间中我是有意识的原因。当我作“最后一次呼吸”时,在我里面的神圣的气仅仅是重新返回去而与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通的“气”混合在一起罢了,所以,并没有我的“人格”(personality)的真正的和永久的个别的承担者。(在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中,的确我们能够看到“灵魂”(soul)——他设想它不是“气”而是“火”——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他的思想中有一个永久的矛盾,那就是它立即开始拥有某种永久的个体性,以便通过生、死和再生的兴衰变迁,然而它又仅仅是一个暂时地分离的宇宙“火”的部分。)

另一方面,在奥尔弗斯教中,像在早期毕达哥拉斯派的类似的宗教中一样,psyche 是一个更加重要的东西。它具有一个永久的个体性,并因而是不朽的,而且在事实上是一个暂时“下凡”和被流放的神。信徒们的伟大关注是实践生命的规则,部分地是道德,部分地是仪式,它们会导致 psyche 最终从“降生的车轮”中解救出来,导致恢复它在众神中的地位。但这并不是灵魂(soul),如果我们用灵魂这个字表示“那在我们之内的东西,”——用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的话来说——“由于它的缘故,我们被宣称为聪明的或愚蠢的,好的或坏的。”奥尔弗斯教徒们假定,正是在我们说的“正常的”、清醒的自我处于暂时搁置状态时——在睡梦中、幻觉中、出神中的时候——它的活动就表现出来了。正如品达所说,“[这个精神]当人们活动着时,它入睡,但是在人们入睡时,它在许多的梦

中预示着即将来临的祸福。”<sup>①</sup> 这样，我的智力和我的性格并不属于在我之中的 psyche，而且它的不朽性（奥尔弗斯教主张它是重要的）恰当地说来也不是我的不朽性。特别是在较早的文学作品中，当说到作为在日常的清醒生活中的任何活动源泉的 psyche 时，它通常与捉摸不定的欲望相联系，对于这些欲望，严肃的意识是不许可的<sup>②</sup>。在 5 世纪时的雅典，“psyche”这个字向普通人指出的，不过是“鬼魂”向我们指出的，这似乎是肯定的。这也就是为什么阿里斯托芬在《云》中说到苏格拉底及其伙伴犹如 σοφαὶ ψυχαί[sophai psychai, 智慧的鬼魂们]的原因，——他的意思是指出这些“思想家”的生活简直就是那么多“鬼魂”的生活。所以，φιλοψυχία[philopsychia, 爱鬼魂]涉及到一个人的 psyche，意思是胆怯地紧紧抓住“可爱的生命”，它使得一个人在原野中惊恐不已。

显然，对于“精神的”道德和宗教的发展所必需的是，奥尔弗斯教强调“关心精神(psyche)的利益”的极端重要性的这种主张应该与这个极端宝贵的精神(psyche)和正常的个人智力与性格的场所的等同联系在一起。这恰恰是柏拉图和色诺芬两人笔下的苏格拉底教导的学说中采取的步骤，并且用对奥尔弗斯传统的这个突破，以及同样地用给与生活行为以中心的地位（早先的思想家们曾把这个中心地位给与天文学和生物学）的办法，用西塞罗式的语句来说，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召回到了人间”。换句话说，他所做的

---

① 残篇 131, Bergk。

② 比如，在欧里庇德戏剧中的居克洛卜(Cyclops)说，他一定要痛痛快快地吃一次人肉，“让他的 psyche 潇洒一番。”（《居克洛卜》，340）。所以罗马人说，相同意义上的 genio indulgere[放纵自己]和 animi causa agere[由于高兴而表示]，“作用于一个人的狂想”。



是确定地创造出某种与自然科学和通神学(Theosophy),或者与这两者间任何混合物完全不同的哲学,并且一劳永逸地实现了这个结果。他所了解的灵魂(soul)具有奥尔弗斯教的精神(psyche)的全部重要性和永久的个体性。根据已经提出的理由,在我看来似乎是明白的,即我们必须相信柏拉图所描写的他的导师对灵魂的不朽性的坚定信念,而这在一个希腊人的口中就意味着它的本质上的神圣性。这是对于向所有人布道的使命的真正的判明,即不论什么时候,那专注的“照顾灵魂”的责任,和“使它尽可能地善”,对于一个人的命运或一个人的身体来说,都具有无论什么样的代价。但是把灵魂(我们首要的责任是“照顾”它)与正常的自我等同,当然,意味着这个“照顾”将不在于实践宗教仪式的戒律和净化,而在于理性思维和理性行为的修养。一个人的责任将是对他相信的东西和所作的事情能够“说出道理”,有一个理性的判明。正是由于断定了和做了我们不能给予理性的判明的事情,我们就表现出了我们对“照顾”我们的灵魂的责任的不关心。这就是为什么当苏格拉底着手履行他的使命时,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使未开化的人相信自己“无知”,表明他们对他们所做的或所相信的没有理智上的判明。

我们必须注意,苏格拉底的这个灵魂学说既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那种心理学,也不是心理—物理学(Psycho-Physics)。它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灵魂是什么的问题(除了说“它在我们里面,不论它是什么,由于它我们才被指出是聪明的或愚笨的,好的或坏的”),并且它不能被任何感官所看到或理解。它不是灵魂的“能力”的学说,也不是它的“实体”的学说。这个思想是:在人之中的这个神圣的成分的“工作”或“功能”正是去认识、去理解事物的本

来面目,因而,特别是去认识善和恶,并且指导和驾驭一个人的活动,以致它们会引向一种避免邪恶、成就善行的生活。这样,苏格拉底关心的既不是思辨的或经验的心理学<sup>①</sup>,而是认识论和伦理学的共同原则。“使灵魂尽可能地善”,一方面将是得到存在物的知识,如实地去认识它,另一方面是把一个人的道德行为安置在关于“道德价值”和真知识之上。在这两个领域中,一个需要加以克服的东西,就是把不能判明为真的“意见”(doxa)、“幻想”,假定,从知识的地位上抛开。因为科学是被幻想和事实的混淆毁掉的,所以实践生活也是被对于善的错误估价弄糟的。现在,我们必须看到这个真理的知识的概念怎样是灵魂的、因而是人的一件最高的任务,它穷根究底地研究科学和道德行为这两者的理论。我们可以相信(即使没有柏拉图明显的指示来引导我们),苏格拉底对科学问题有兴趣,特别是在他生活的早期,而他的思想中的伦理学方面差不多完全占据了他献身于人类的使命的后期生活。但是,鉴于学者们对于苏格拉底的伦理学的典型特征的更为普遍的相同看法,我们把这两件事按颠倒的顺序来讨论。

1. 伦理学。——当亚里士多德有机会谈到苏格拉底的与众不同的道德教导时,他把3条基本原则归之于他,而初看起来,它们全部都是悖论似的:(a) 德行,道德上的优点,与知识是同一的,并且因此之故,所有通常区别开来的德行都是一回事;(b) 恶行,道德上的坏行为,因此在所有情况下都是无知,理智的错误;(c)

---

<sup>①</sup> 依我看,似乎难于怀疑苏格拉底实际上谈过(正像柏拉图让他做的那样)“灵魂的各部分”、判断、较高的情感(情绪)、欲望。但是这是通俗的心理学,而不是科学的心理学,而且满有理由相信它是前苏格拉底的,并且如波赛冬尼乌斯(Posidonius)所说,它来自毕达哥拉斯派。它既不是苏格拉底的独创,也不是苏格拉底所特有的。

因此,干坏事总是不自愿的,真正说来并没有像亚里士多德本人叫做“道德上的弱点”(acrasia),即“知道善而作恶”的那种灵魂状态。亚里士多德非常清楚地从他阅读柏拉图的一篇特别伟大的对话《普罗泰戈拉》直接地引出这些结论。在那篇对话中所有这些原则都能找到。这些原则很好地描述了柏拉图的早期对话中苏格拉底所说的道德的实质。这些原则全都以更为平凡的形式再现于色诺芬的《回忆录》中。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种观点使它们不再是悖论而开始表现为是显然的,那么,我们就有了打开它们的钥匙。

我们可以最方便地从表现为最严重的悖论开始,即断言所有的干坏事都是不自愿的。“道德上的弱点”,即人们做他们自己承认是错的事情,而且他们是在没有强制的情况下那样做的这个事实,是我们经验中最熟悉的事实之一。而且,我们并不设想苏格拉底的意思是要否认这一点。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刚才使用的大众词汇,对这个事实作了不恰当的分析。一个人很经常地作恶,而不管事实上它是恶的;从来没有一个人作恶只是因为他看到它是恶的,尽管一个人行善也许只是因为他看到它是善的。一个人在选择做一件恶事之前必须暂时使自己迷惑而把恶当作善。正如《高尔吉亚》中所说的,在我们所有人中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基本愿望:对善和快乐(happiness)的愿望。至于其它一切东西,一个人可能宁愿要外观而不要实在,宁愿要外在的表现,例如权力、财富,而不要事物本身,但是没有一个人会想要善或快乐的表现而不想要实在本身:这是影子也许不能估价得高于实体的一种情况。因而,说恶行是不自愿的,意思是它并没有给恶人带来他下决心真正要得到的东西(不管他知道它还是不知道它),像其他任何一个人的意愿一样。典型的希腊的“邪恶的怪物”(Monster of Wickedness),

“暴君”，把自己置身于全部法律之上，可以在他的一生对所有的人的人身和财产“为所欲为”，但是刚好因为他总是“为所欲为”，他并未得到他真正希望得到的东西。他希望幸福，而得到的却是极端的不幸，一个得了绝症的灵魂。做一个被判处死刑的罪犯那将会更好些，因为死恰恰会是治疗罪犯的灵魂疾病所必需的锋利的“外科手术”。这样，一个人如果真正地知道一个有把握的和确定的真理，就像他不怀疑他自己的存在一样，即知道所谓的身体的“善”和“地位”，与灵魂的善比较起来就什么也不是，并且知道灵魂的善是什么，那么，就没有任何东西会引诱他作恶。恶行总是基于对善的错误估计。一个人干了罪恶的勾当，因为他错误地期望由它而获得善，得到财富、权力或享受，而没有估计到这样一个事实：灵魂的犯罪不可比拟地重于这些设想的收获。这样，苏格拉底在某一点上同意快乐论(Hedonism)的观点，即干坏事是由于打错了算盘；但是这个错误计算不是关于“快乐的多少”，而是关于善的价值。<sup>①</sup>

现在，我们看到：说所有美德都是一回事(即都是知识)是什么意思了。在苏格拉底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一样，关于人类的流行的观点是，道德上的美德是多样性的，每一种都完全不同于其它的，并且你能有在最高程度上的某一种而没有另一种的丝毫踪迹，——例如，能够是勇士中的勇士，然而他的荒淫放荡又如同其勇敢一样，或者一个最有自制力的人然而又是最贪婪和最不公道的人。现在，苏格拉底承认这是真的，如果你用德行来指在柏拉图

---

<sup>①</sup> 这是在柏拉图的《普罗泰戈拉》中论证的真正的~~问题~~。在那里苏格拉底首先似乎是谈论快乐论。他想向“许多人”证明，即使根据他们自己的理论，善和快乐也是同一件事物。但一个有德行的人的勇敢与知识等同并非悖论，因为他们会同意这样一种看法：逃避危险的懦夫是在“快乐和痛苦的天平”上作了错误的计算。

笔下他称之为“粗鄙的德行”的那个东西的话。这“粗鄙的德行”是一种人们给予一个被接受的行为法典的外在的尊重,这些人没有对于灵魂的最高重要性、以及真正的快乐与灵魂的“健康”的同一性的个人信念,而仅仅合乎礼仪地指导他们自己的活动,因为他们的社会习惯希望他们那样做,而且他们如果不那样做的话,就会招来不愉快。但是,这个“粗鄙的”德行仅仅是真正的德行的虚幻的伪造物。真正的德行是一种关于强烈信念,即对于真正的道德“价值”的个人认识的事情。于是在生活的各种场合的不同的体现的背后,有一个单独的原则。这样,以知识的确实洞见掌握了这个原则的人,就不能在一些情况下应用它,而在其它的情况下不应用它。关于什么东西对于灵魂是好的的真正知识,将会在生活的所有情况下以正确的态度来展现它自己,这样,在“哲学家”的生活中,那个在一种类型的道德上的优点与另一个道德优点之间的明显分界线将会消失。他的整个行为将是一个优点的表现,即对于真正的“善的尺度”的坚定的和自信的肯定。这就解释了那个奇怪的事实,即在柏拉图的不止一篇的对话中都以一个独特的明显否定的结果而告终,我们都被引导去思考某些通常被看作是美德的东西(在《卡尔米德》中的节制,在《拉各斯》中的勇敢)的真正性质是什么。思考似乎把我们引向这样一个结论:所讨论的这个性质真的就是善的知识,然后,观察使我们停下来思考,这不仅是对于表面上讨论着的那个特殊美德的定义。形式上,这被处理成证明我们对于向我们提出的问题的回答,仍然是无知的,就像我们在开始时一样。事实上,我们必须明白,如果试图给一种美德下定义,那么结果得到的不仅是那种美德的定义,而且也是另一种美德的定义,其原因是:原则上,所有的美德都是同一的。

当然,苏格拉底把它与美德等同起来的那种知识,不是任何一种或每一种能够称之为知识的东西;它肯定是今天叫做“道德价值”的知识,即认识什么是我的善的知识。于是,这就导致了真正的困难:那样的知识是怎么来的呢?一方面,如果美德就是知识,有它或没有它就不只是先天的秉赋的问题;人们不是进入一个生来就善的世界,也不是进入一个生来就已经拥有任何种类的知识的世界;他们必须获得他们的知识。然而,那种普遍流行的看法,即认为我们会在好的双亲和好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下,自动地获得“善”,就像我们学会使用我们的母语一样,却不是真的。众所周知,伯里克利与其他显要人物,被雅典民众公认为是“最优秀的人物”,却完全不能够把他们自己的优点传给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儿子一般地都是些完全低劣的人。另一方面,那些卓越的“智者”自称能够用一门传授的课程来“教导善”,就像他们能够教导某种技术的技能一样。如果善就是知识,仅仅是知识面不是任何别的东西,那么,它肯定应该是能够以某种方式加以教导的东西;具有这种知识的人必定能够指导另一个人获得它。然而智者声称用讲授课程就能传授它完全是虚假的。柏拉图所描写的苏格拉底反复强调的那个反对智者及其仰慕者的论点很简单。智者能够教导的最多不过是某种职业专长,怎样做某些一般人不能做的事。但是美德或者善并不是具有有限领域的专长,它的领域是整个人类的行为。并且一种专长是某种既可以用于行善也可以用于作恶的东西,正像医学知识既可用于治病,也同样地可用于杀人一样<sup>①</sup>。智者最多能够传授专业知识;他所不能传授的是“善的知识”,这种知

---

<sup>①</sup> 众所周知,在我们的犯罪记录上,聪明的下毒者,通常都是一个搞医药的人。

识会保证它的使用将是善而不是恶。

那么,一个人怎么学习一种对他最有好处的知识——善的知识呢?不太清楚苏格拉底最终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是,我们也许能够发现他会作出的答案的一般特性。根据柏拉图的说法<sup>①</sup>,他曾经深受奥尔弗斯学说的影响,认为有一些手段可以使灵魂恢复其对于她已经忘记的神圣来源的记忆,而且从这一个暗示出发,他发展出了这样一个信念:获得知识一般说来实际上就是一个“回忆”或“回想”(anamnesis)的过程而已。在这个过程中特殊的感性事实促进或者提出对一个普遍原理的断定,而这个普遍原理是超越于事实本身之上的。用画一个图形和提出一系列贴切的问题的办法,那位数学家就引导一个学生认识到一个普遍命题。他不需要传授任何信息;如果画出一个正确的图形,而学生的心思由正确的问题而着手对它工作,从它本身、通过它自己的活动就会产生正确的结论,犹如从它不知不觉地已经拥有它的真理的仓库中得到的一样。这样“学习到”的真理是由个人的“发现”而得到的,对于这个发现来说,“学习者”只不过被他的教师刺激,然而它

---

<sup>①</sup> 特别参看《美诺》81a—85e,在那里这个理论由苏格拉底给一个不懂科学的小奴隶上了一“课”几何学而作出详尽的例证,还有《菲多》72e及以下各行,在那里有一个相同的获得几何知识的论述。在这两处,这个学说都与灵魂的不朽性相联系,但是讲得很清楚,作为一个什么是真理的发现的理论,它是独立于这种宗教信条的。(事实上,在亚里士多德的《后分析篇》[ii]的结尾处,它再次作为亚里士多德本人对于通过“归纳”提出第一原理的那种方法的说明出现,没有任何宗教的联想。在《菲多》中(出处同前),“学习就是回忆”的学说是由西米亚斯明确表述的,他对苏格拉底说,这是“你经常重复讲的学说。”除非我们愿意把《菲多》看成是一个巨大的和不可宽恕的故弄玄虚,那么在我看来,这似乎是证明这个理论真地是属于苏格拉底的。至于柏拉图自己的与此相联系的信念的简明陈述,参看《书信》vii. 341c,以及伯奈特对这段话的注释(《希腊哲学》第一部第221—222页)。

还是被认识到了,就像包含在“学习者”早已熟知的东西之中似的。同样,一个迫使我们对自己生活中的行为“加以考察”的苏格拉底的尖锐的质问,促使被问者的心灵去“认识”我们用以估价我们自己和我们的邻居的行为的那个道德标准的含意。这是柏拉图发展出他自己的“哲学”理论的出发点。柏拉图认为哲学是诸心灵从事于共同追求真理时的摩擦而创造出来的。

希腊人的心灵在私人的原则和公共行为的原则之间,在道德和“政治”之间确实不作区分;苏格拉底始终确信“善”与对于城邦及其政治家的道德的正确的“价值”评价是同一的。在他看来,一个城邦及其公务人员的价值,完全依赖于国家生活被安放在真的善的尺度之上的程度。毫无疑问,他带着对宪法的实践上的忠诚,必然会赞许民主的原则,多数人统治的原则,而这个多数人却没有善的知识,并且甚至从未梦想过那样的知识对于指导他们的事务来说是一个必要的合格证明。在柏拉图的《高尔吉亚》和《国家》中用苏格拉底之口说出来的对5世纪时雅典的民主制的判断,比起柏拉图在《政治家》和《法律》中按他自己对民主制政府的考察所必须说的任何东西猛烈得多。而依我看,也许这些评判的严厉性是来自苏格拉底而不是来自柏拉图<sup>①</sup>。根据《国家》,民主制的那个

---

① 当把早期对话的语言当作表达柏拉图的个人意见时,那么对后期对话中的比较赞许的判断则被解释为时间对于一个被苏格拉底的命运撕碎的心灵的醇化的影响的缘故。它也许是那样的。但是总还有心理上的可能性,即这个更尖刻的评判是苏格拉底本人的那些意见。雅典民主制的趋势在大战中变得越狭隘越艰难,他因自己是在战前伟大的“五十年”中成长起来的而产生的幻灭之感就会越痛苦,他也许曾经希望和期待过完全不同的东西。在一篇非常晚的对话《蒂迈欧》中,柏拉图让苏格拉底承认在政治上有某种教条主义的东西,那是由于他缺乏政治生活的个人经验之故(《蒂迈欧》19d)。我们从色诺芬那里知道(《回忆录》I.ii.9),讽刺挖苦用抽签的办法来补充行政官员的民主制的实践,是控告苏格拉底这桩案子的一条理由。对于这个指控他作了答辩。



真正的原则(如果它能被叫做原则的话),就是拒绝要求把任何智力的或性格的优越性作为领导职务的一个合格条件;在那个民主制的社区中,正如尼采所说,有“一群羊而没有牧羊人”,而这就是为什么它的通常的命运是落入有能力而又无所顾忌的“独裁者”(或者像希腊人对他的称呼:“僭主”[tyrant])手里的原因。同样严厉的是《高尔吉亚》所宣布的对雅典民主制的所有著名领袖的谴责,从特米斯托克勒到伯里克利,在某种程度上,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公正的”阿里斯蒂德(Aristides)。我们从两种考虑出发可以看出他们全部没有善的知识,而这种知识是生活中的一件必需的东西。他们之中没有人——甚至阿里斯蒂德也在内——能把他们拥有的任何的善传给他自己的儿子,并且他们之中也没有人——也许除了阿里斯蒂德——用他对公众“灵魂”的照顾而使它变得好些。特米斯托克勒、伯里克利,以及其他入使雅典强大和富有,但是他们对人民的道德没有做什么事情;他们“用船只和船坞,而不是用正直来填满城邦”;给了它世界性的繁荣,而不是真正的道德观念。因而,在《高尔吉亚》中告诉我们说,尽管他们是国家的能干的“贴身的仆人”,然而他们不能宣称是(作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应当是)它的“医生”。很清楚,苏格拉底习惯性地使用柏拉图归之于他的这类论证,说雅典的公众人物没有能力把“善”传给他们的儿子,以此证明他们表面的“善”并不是那个真正的东西。在《美诺》中,安尼托被引进来特地警告他说,这种对民族英雄的贬低是一场危险的游戏——这是柏拉图的信念的一个明白的提示,它在引起攻击方面会招来不少麻烦,这个攻击以对他的起诉而告终。

从苏格拉底的观点看来,合理的社会组织应当是这样的:在这个社会中,每一个人(如政治家、士兵或生产者)的社会地位和功能

应当由他的才能、知识和品质使他适合于担当该工作的性质来决定。这恰恰就是柏拉图的《国家》前几章中在考察一个理想的城邦时提纲挈领地提出来的理想。就此而言,那个计划可以真地说成是苏格拉底的灵感的直接产物。至于它的任何细节在多大程度上是苏格拉底的独创,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尽管它的最富有创造性的特点之一很有启发性地令人感到似乎是这样。这就是提议让妇女和男人同等程度地担任公职,在军事方面、内政方面以及为使这一点合格的教育方面也是如此。苏格拉底实际上抱有这样的理想似乎也表现在下述事实上,即埃斯克勒也在他的对话《阿斯巴西亚》中详细讲述了阿斯巴西亚本人以及其他人的政治才能,以及从一位真实的或传奇的波斯公主罗多吉尼(Rhodogyne)身上表现出来的军事能力。色诺芬也偶然地让苏格拉底之口说出这样一个论题:经过必要的训练,一个女人能够像一个男人一样胜任同样的工作<sup>①</sup>。

2. 认识论和科学方法。——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指出,“有两件事情必须公正地归之于苏格拉底,这两件事情是:归纳论证和普遍的定义。”<sup>②</sup> 这并没有让我们前进很远;亚里士多德显

---

① 参见克劳斯(Krauss)和狄特玛尔(Dittmar)编的《阿斯巴西亚》的残篇。色诺芬提出的苏格拉底的信念(“一个女人在自然秉赋方面并不比男人差,尽管在判断或者体力方面不是他的对手”)的证据,在《会饮》ii.9处可以找到。至于色诺芬提供的把对知识的要求看作是统治权的合格条件的证据,参看《回忆录》III.ix.10,并与整个III.VI.相参照,在该处苏格拉底劝格劳康不要过早地进入公共生活,办法是暴露他在军事方面和财政统计方面的无知。色诺芬仅仅谈到对事实的那种无知,而没有谈到更严重的对“道德价值”的无知,这使我感触到了这个人\*的特点。

\* 指色诺芬。——译者

② 《形而上学》M., 1078b27。有些当前的德国学者提出一个论点,否认苏格拉底真正对“定义”有兴趣。在以下那种意义上这是真的:即他所关心的不是为理论标记而作的理论标记,而是行为的实践规则。证明亚里士多德表达他本人看法的方式是正确的理由是:他想到的是那些著作(如《卡尔米德》、《拉各斯》、《普罗泰戈拉》、《美诺》、《国家》第IV卷)的形式结构。

然不太想向我们全面地描述苏格拉底的特点,而是想详细说明从苏格拉底那里引申出来的他自己的哲学的某些组成部分,而且,他似乎是把他的陈述只安置在他阅读柏拉图的对话的基础之上,那些对话充分地表明了这个观点。色诺芬的辩护的兴趣在于他的老师的道德教导的有效性,这使得他不太愿意谈论任何其它的问题。我们是否有机会能够发现,作为一个思想家,苏格拉底除了讨论严格意义上的伦理学问题之外还讨论一些其它的问题,这取决于柏拉图的《菲多》中<sup>①</sup>借苏格拉底之口所说的自传性谈话的历史真实性。那么依我看,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们必须把这个谈话在实质上看作柏拉图当作历史事实的东西。另一种看法是假定,关于苏格拉底在他临死前的最后一天所说的那番谈论他自己的话的报道(谈话时有许多亲密朋友在场,而且当这个报道发表时他们都还活着,而且他们肯定会看到这一报道)是一个虚构(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所有这些读者都会立即察觉这一虚构)。没有人真正地勇敢到足以彻底坚持这样一种理论。例如,每个人都承认苏格拉底阅读了阿那克萨戈拉的书以及他对它感到失望的故事是事实,尽管除了《菲多》的陈述之外,我们没有证据说明它是事实。但是在《菲多》中的陈述仅仅是一个连贯的谈话的开端,因而在一贯性方面我们义不容辞地或者承认谈话的其余部分是实质上精确的,或者也用同样的怀疑论的态度来对待开端的陈述,如同对待所有在它之后的谈话一样。对于我自己来说,那是一个更为合理的思路,是没有什么怀疑的。当然,没有一个明智的人会否认柏拉图像每一个

---

<sup>①</sup> 《菲多》96a—100c。这一整段应当加以仔细地研究,并参照伯奈特编定的这篇对话的版本(牛津,1911年)的注释。

伟大的艺术家一样,把他自己的心灵搀和到他的对象中了。但是,断言他在一幅假冒的苏格拉底肖像中自觉地把他自己的特征呈现给我们,那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sup>①</sup>。

根据《菲多》,接着,苏格拉底发现阿那克萨戈拉像他的先辈们一样用同样任意的方式武断地对待自然。这直接地引导他提出了一种寻求真理的新方法。如果我们不能用直接检查事物本身的方法来发现关于事物的真理,我们可以用检验我们作出的关于它们的陈述或理论的办法来试图达到它。这种程序的明显的间接性,就是苏格拉底幽默地进而把它贬低为“一个业余爱好者的权宜之计”的理由。当然,实际上他认为,它向我们提供我们获得任何真正知识的唯一的机会。他描述的那种程序,正像我们在色诺芬那里<sup>②</sup>以及在柏拉图那里所看到的,恰恰就是他叫作辩证法的那种东西。这个名词的恰当的意思是“会话”(“conversation”)的方法。解释这个名词的用法的思想就是:真理必须通过对话或争论来获得,这种对话或争论可以是在两个探索者之间进行,也可以在单个探索者的心里进行,此时他的“心灵”是自问自答。不能用直接检查“事实”的方法来发现的真理,可以在对它们的两种对立的解释的批判性的交锋中弄明白。当获得真理时,它是作为一场争论的结论而获得的。

阿里斯托芬在戏剧《云》中机智而又刻薄地加以漫画化的正是

---

<sup>①</sup> 一个伟大的肖像画家总是把自己的人格放进他的肖像画之中。如果他是一个较次的艺术家,那么,那幅肖像将会是不同的。但是他不会把他自己的鼻子或眉毛给予被他画像的人。

<sup>②</sup> 在《回忆录》中相当长的一章(IV. vi)是用来表明苏格拉底使那些与他交往的人“更辩证些”的方法的。据色诺芬说,他用催促他们精确地思考并以易懂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思想的办法,来做到这一点。

这种敌对的“论证”或“理论”对抗的方法。普罗泰戈拉在一种非常不同的意义下也曾说过：“对每种事物都有两个论证，”每个事例都有两个方面，他所教导的有效的辩护的艺术，目的在于使“较弱的事例”——那种不熟练地加以表现的并且会在听众中得到较差效果的事例——变为“较强的事例”。阿里斯托芬对这个无害的格言加进了这样的意义：辩护的目的是使道德上较坏的情况显得是较好的。然后他把这种程序转移到苏格拉底身上，结果是，敌对的“论证”被作为美德和恶行带到了舞台，当然恶行把美德从这个战场上赶跑了。这是纯粹的漫画化，但是它预先假定了以下事实作为基础，即在柏拉图的幼年时期，苏格拉底对某种“论证”的对抗特别有兴趣，已经是有名的了。

《非多》对于这种程序作了相当充分的描述。这种方法就是，苏格拉底从某一个命题开始，这个命题以任何一个理由使他觉得它可能是真的。他把这叫做他的最初假设(hypothesis)，然后他接着问他自己：“如果承认了这个，那么必定有什么会随之而来的呢？”也就是推出它的后果。这个最初假设的真理现在是没有问题的，无论从它推论出什么也会被看作是真的，而无论什么与它相冲突的推论，都被看作是真的。这样，这个方法的假定仅仅是：真理是一个一致的系統，而且任何与一个真原则相冲突的东西都不可能是真的。当然，我们必须注意，苏格拉底称之为他的假设的那个设定的原则，并不是在一个“纯粹想像”的意义上被采用为假设的。苏格拉底拿它作为一个论证的出发点，因为他假定它是真的，或者因为它是他自己和讨论中的对方的共同基础；另一方面，断言它是自明的和最终的真理是没有问题的。对它则可以表示怀疑，在那种情况下，就需要用从某个更根本和更少争议的假设出发把它作

为后果推导出来的办法,来加以辩护。这个方法的重要规则是:从假设得出什么后果的问题与假设本身是否是真的问题必须区分开。只要我们仍然关心的是前一个问题,即关于后果的问题时,假设本身必须是不成问题的。

到此为止,在《菲多》中归之于苏格拉底的这个方法,在原则上显然已经证明它自身是直到我们的时代为止的一条通向科学真理的道路。在伊奥尼亚自然哲学家的直接程序(它未曾有进展)与我们作出的关于在“陈述”中研究事物的方法之间的对比,恰恰也就是德·摩根(De Morgan)在培根的不正确的方法(他假定事实是由之抽出理论的东西)和牛顿的正确方法(他把事实看作是用于检验理论的东西)之间作出的对比<sup>①</sup>。一个显著的区别就是苏格拉底没有特别涉及用理论的推论与观察的事实之间的对照的办法来验证理论。然而在柏拉图及其学园对苏格拉底思想的详细阐述中,可以找到验证的适当位置。他们把说明所有有关的、观察到的事实的理论叫做假设,它“拯救现象”。(“现象”就是那些观察到的事实,去“拯救”它们就是用一贯的方式去说明它们全体。)当然,无论是苏格拉底还是柏拉图都未能沉思由明确地为这个目的而设计的实验来作验证这个现代的延伸的问题。

就这个范围而言,有某个独立的证据表明《菲多》关于苏格拉底的方法的陈述是历史事实。色诺芬觉察到,当他的命题中的一个被怀疑时,他的习惯做法是“把整个讨论带回到假设(那也就是开端的立场)那里去,它是他自己和他的争论对手的共同基础,”<sup>②</sup>

---

① 阿·德·摩根:《悖论集成》(第2版)i,88。

② 《回忆录》IV.vi.13。

当然,尽管这也许不过意味着色诺芬读过《菲多》,并且认为没有理由不相信它的陈述。更加使我感到意味深长的是,柏拉图本人明显地让普罗泰戈拉,在未作任何进一步解释的情况下,谈到把某个命题作为假设的方法,就我们关心的是在对话中找出它的后果而言,这个假设是无可怀疑的。这似乎是具有明显的苏格拉底风格的东西,而这个对话却被杜撰为是在柏拉图出生之前进行的<sup>①</sup>。还有,我们能够看到苏格拉底大约是从什么方面引出了这个方法的建议的。从一个假设严格地推导出后果这是著名的埃利亚的芝诺的特殊方法,尽管那些假设是他的对手的,而他用这种办法来处理它们,其目的是通过表明它们导致一些不可能成立的后果的办法来使对手威信扫地,就像他在柏拉图的《巴门尼德》中亲自对年轻的苏格拉底所解释的。<sup>②</sup>

就许多(如果不是最多的话)仔细的证据探求者而言,也许会愿意追随我们。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会倾向于进一步承认,《菲多》的谈话接下去所说的关于苏格拉底本人作为他思考的基础而采用那种特别的假设的性质,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据有些人说,这不过是著名的“理念论”罢了,并且还不加证明地共同假定,或者没有证明而只用亚里士多德著作中的一些含混的表述来假定,这个理论是柏拉图在苏格拉底死后首先发现的。就我自己而言,我同意伯奈特的看法,认为以下这种观点是难以相信的:任何一个思想家在向世人介绍他自己非常有独创性的发现时,都会把它说成是某种早已为许多活着的同时代人所熟悉的东西,这些同时代人肯定

---

① 《普罗泰戈拉》351e。这里没有用“假设”这个名称,但是普罗泰戈拉建议苏格拉底讨论善就是快乐这个论题,“以你通常的方式”以得出它的后果。

② 《巴门尼德》128c—e。

会阅读他的著作并查出任何错误的描述。因此,我主张,我们应当承认《菲多》的陈述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并且必须用一种不会与柏拉图发生冲突的方式解释亚里士多德的证据(如果我们毕竟承认它不仅是他自己的私人猜测的话)。当然,我们必须记住,柏拉图在那个描绘对象的活动中的已经把他自己的人格与它的对象混合起来了,但是我们必须把这样做看作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并不是什么有意地歪曲事实真相。

一直使苏格拉底感到困惑的是“生成和消亡的原因”问题。为什么一个事物得以出现在世界上或者从世界上消失掉?为什么一个事物会表现出一种它以前未曾有过的性质,或者丧失掉一种它曾经具有的性质?物理学家对这个问题有他们的答案;他们发现这些变化的原因在于物理的力量,他们任意地指定各种各样物理的力量。对于阿那克萨戈拉关于心灵是世界秩序的源泉的命题的含意的思考,向苏格拉底指出了这些物理的力量(无论它们是什么)顶多不过是一个事件的伴随的原因或者不可分离的条件罢了;在任何情况下,真正的原因是,事物最好应当像它们所是的那样,而且在一个心灵安排的世界里,每一事物都会被配置成像它最好应当是的那种状态。这样,苏格拉底就把宇宙秩序的“目的论”或“终极”的概念引入了哲学,这种观点把宇宙秩序当作实现一个绝对价值的目的。这种观点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普罗提诺充分地加工炮制并且作为希腊哲学的主要遗产传给了后来的时代。

当然,抛弃试图用简单地观察“事实”的办法来发现真理这种朴素的老方法,意味着苏格拉底不能梦想用直接观察的办法来发现世界秩序的特殊细节是什么,为什么它们最好应当像它们所是的那样。但是他相信在任何事物中都有一个可知的秩序,而且那



是一个聪明的秩序。这就使得他在探讨为什么事物产生和消逝、取得一种性质或丧失一种性质的问题时,有了一种独特的观点。他在《菲多》中说到这种态度时认为,这种态度对于他的听众来说完全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他们曾经从他那里一再重复地听到的东西。如果一个东西变成它以前不是那样的东西,例如,如果它变得美丽了,这总是因为一个相同的原因,即“美”(Beauty)已经“变得呈现在”这个事物里了;如果它不再是美丽的了,那就是“美”已经从它那里“撤走”了。或者换句话说,一个事物是美丽的,它之所以美只是因为,并且只要它“分有”美;一个图形是三角形的,只要并且因为,它“分有”那个三角形,如此等等。“美”,或者像希腊语所表达的,“那个美丽的东西”“那个三角形”等等,就是这个学说中叫做“形式”(Form)或“范型”(Patterns, eidē, ideai)<sup>①</sup>的东西,而一个事物是它所是,有它所有的性质,是因为它“分有”了它所“分有”的那个形式。关于这些形式必须注意下面的要点:(1)“分有一个形式的事物”全都是会消失的;它们开始存在又停止存在,但形式、美、那个三角形等等既不开始存在也不停止存在;它正是怀特黑德博士(Dr. Whitehead)叫做“永恒的对象”的那种东西;(2)由我们的感官感知的事物仅仅不完善地“分有”或者“相似于”形式。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一根绝对笔直的棍子,或一个绝对精确的、完善的三角形的补丁,而且我们也许从来也没有碰到过一个完全公正的行为;我们只看到过接近于直的棍子和接近于三角形的补丁,只遇到过接近于正义的行为。但是几何学家告诉我们,“直线”或“三角

---

<sup>①</sup> 但是,像它们长期以来被称呼的那样,把它们叫做 Ideas[观念、理念],会使人产生误解。那会使我们联想到它们是某个人的思想、“某个人头脑中的观念”,那恰恰不是这个理论的意思。

形”是完全直的或三角形的；道德学家谈到的作为责任的公正是完全公正的；(3)“分有形式”的事物会是无限地多的；而形式本身严格地说来只有一个。甚至在几何学中(我们在几何学中谈到许多三角形，它们都被假定是完全三角形的)，几何学家有兴趣证明的不是这个三角形或那个三角形的性质，而是三角形本身的性质<sup>①</sup>。我们在科学中所讨论的对象总是形式，而不是这个或那个“分有”这个形式的事物。我知道一条科学真理，那就是：一个三角形的两条边的和一定大于第三条边；我不知道在我面前的这个补丁的两边一定大于其第三边，因为我不知道这个看得见的补丁真地是三角形的。

当然如果我们能够的话，我们愿意知道这些形式的更多的东西。什么东西有形式(从而我们能够具有什么东西的科学知识)?再有，形式构成任何种类的一个系统吗?我们从亚里士多德的讨论性的暗示中可以看到在稍晚的柏拉图学园中对这些问题有过回答，但并不总是一致的回答；而亚里士多德发现，所有这些回答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但是，我们没有权利反过来把属于柏拉图老年时期的那些发展塞进《菲多》之中，而且我们甚至会怀疑在《国家》中，柏拉图是否会不是无意识地在他的论证发展时，把他的苏格拉底的画像“着色”得浓于他所知道的。从《菲多》本身提供的例子看，似乎苏格拉底主要地思考的，一方面是数学家能在几何和算术中给予我们完善的和绝对的定义的那些对象，另一方面是道德学家的理想的标准和准则(3 这个数目、三角形本身、正义本身，诸

---

<sup>①</sup> 我们从语言中以一种有趣的方式看到了这一点，例如，解析几何中的“圆的这个方程式”(the equation to the circle)，或算术中的“6 这个数目”(the number six)。

如此类)。而这个印象由柏拉图晚期写的一篇对话《巴门尼德》为我们证实了。在《巴门尼德》中，苏格拉底向伟大的埃利亚派哲学家巴门尼德和芝诺述说他的理论并为它作辩护以反驳他们的批评（尽管这个辩护不是非常令人满意的）。他被写成在那里说道<sup>①</sup>，他完全相信有那样一些东西的形式，如相似和不相似、一、多、正义、善，但是非常怀疑是否有人、火、水的形式，并且尤其怀疑关于头发、污泥、秽物等是否有形式。事实上，他是相信他的数学和道德方面的论点，但是对它在任何其它地方是否适用，则非常没有把握。我们可以推论这个理论的形成的第一推动力来自对数学和道德真理的思考。这是我们应当期待的东西，如果这个学说是由苏格拉底创立，并且如果苏格拉底是柏拉图描绘的那个人的话。他所使用的那个术语，似乎首先是从毕达哥拉斯派的数学而来的。有明白的证据表明 eidos 这个字是老毕达哥拉斯派表示“形状”（figure）的名称，这个字的意义保存在欧几里德（Euclid）和其他的公元前3世纪几何学家的老一套的语词中，尽管他们表示“形状”的共同的字是一个不同的字（Schema）<sup>②</sup>。而且，柏拉图经常描写苏格拉底对于道德标准的需要的深切感受，用这个标准可以解决关于正确和错误的争论，正如关于面积和容量的争论由引用几何学来解决，关于重量的分歧凭借天平来解决一样。

我们看到这个理论是第一次企图公正地对待知识中的先天因素，科学真理中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纯数学和纯伦理学命题中的最

---

① 《巴门尼德》129--130。

② “范型”的相同的意义，在我们的语言中，表示关于讲话的格式和三段论的格。

引人注目的明显的东西,并且把这些学科当作所有科学应当是的那种东西的模型。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后来的哲学家们把形式(Forms)与“一般”(universals)、“概念”、“类的概念”(class - notions)等同起来。但是,谈到他们这样做时包含着一个较简单思想的一个真正非历史的变换(Transposition)。这就是使苏格拉底像亚里士多德或康德那样来讨论问题,而这样作是不能不冒着误解的危险的,尽管他的学说是他们的学说的最终源泉。如果我们想避免所有那样的误解的话,最好是简单地说形式就是——无论它会是什么——我们指称的一个对象,亦即无论什么时候我们用一个有意义的“普遍名词”来作一个严格地和绝对地真的命题的主语时,那样一个命题对它作出一个真断定的那个对象。那样的对象,不是由身体的知觉来揭示的感性的事物,按照苏格拉底的想法,它们是现有事物中最真实的事物,并且是唯一的完全真实的事物。正如我们已看到的,灵魂有一个单一的基本的活动,即如实地认识真实的事物,并且只有在认识形式的过程中,这个活动才能成功地得以实现。在心灵还未能面对面地认识形式的地方,我们只是有意见(opinion)或信念(belief),当然,一个信念在许多场合下也许完全能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但是我们却没有知识;“必然的联系”的成份丧失了。

作为真正的知识的合适对象的形式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或系统吗?无疑,它们应当是那样的。因为根据《菲多》,作为对“变为存在和停止存在”的解释的这整个形式学说,受到更加终极的信念的鼓舞,那种信念就是:在一个心灵弥漫的世界中,所有事物都被安排得如它们应当是的那种最好的状态。因而“善”——它本身也是一个形式——是整个秩序的原因。这是与《国家》中的一段著

名的话<sup>①</sup> 完全一致。在那里,苏格拉底说到善,或善的形式,认为它在形式领域中占有最高和中心的地位(这个领域是被理智所理解的)。太阳在可见的世界中也占有这样的地位。正如太阳在可见的世界中既是我们所看到的事物的生命的源泉,又是我们借以看见它们的那种光的源泉一样,善在向思想显示的世界中,既是我们所理解到的形式的实在性的源泉,又是我们借以理解它们的那种知识的源泉。并且,像太阳一样,尽管它是光和生长的源泉,但两者都不是和太阳一样的东西;善也是如此,它既不是“存在”,也不是“知识”,而是这两者的超验的源泉。但是苏格拉底被描写成承认,正如能够注视太阳是肉体视觉的最高的绝技,认识善也是心灵的最高的和最困难的成就。在这段话中,他本人承认他自己不能用任何语言来谈论它,而只能用比喻和隐喻来解说。人们通常认为,柏拉图在这段话中是在谈他自己个人的思辨,他借用了导师苏格拉底的声音,而这种思辨则是苏格拉底从未想到过的。鉴于“自传性的”《菲多》中关于形式的假设和对于善是普遍的原因的确信之间的紧密联系,我感到难以赞同这个意见。我宁愿断言,这个漂亮段落的语言和想像是柏拉图在其“黄金盛年”时的东西,而这个思想则是第一次读到阿拉克萨戈拉的那本书而产生的沉思所正好需要的思想。

显然,形式学说在我认为应归之于苏格拉底的那个形态中,既造成了困难,又消除了困难。特别是它留下了一个完全未加以解释的问题,即形式和感性事实之间的关系。感性事实他称之为形式的“表现”或形式之被“分有”。难道我们叫做感性事物的东西仅

---

① 《国家》506d—509b。

仅是形式或者“一般”的一个暂时的相似物吗？如果它还是其他的东西，那么它还是什么呢？没有人比柏拉图本人在他的对话《巴门尼德》中更加透彻地指出了这些困难，并且这至少好像是清楚的；柏拉图自己的教导的最后形式（我们必须不完全地从亚里士多德的一些令人迷惑的暗示中把它重建起来），是企图找出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亚里士多德本人是如此地被这个结局所困惑，以至他把整个形式学说本身当作一个错误企图来对待，即认为它企图把个别感性事物的“一般性质”从这些事物本身中分离出来，随后把这些“抽象”当作超感性的第二类事物，由它产生出我们看得见和摸得着的事物。他说，这就好像一个人，如果他要数若干东西，那就必须想像他得从加倍开始。他相信他自己已经一劳永逸地摆脱了这个不真实的和不能解决的问题。他用来摆脱这一问题的套话是：“形式”仅仅存在于个别感性事物之中，而且恰恰是它的“本质属性”。但是，不管亚里士多德怎么说，这个问题，作为最近试图提供一种科学的哲学的尝试中的一个真正的难题，对于我们来说仍然存在。我们仍然发现我们在询问什么是“科学的对象”的“地位”（status）。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所讨论的事物到底是什么？或者还有，什么是道德的“理想”？“科学的对象”与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之间是什么关系？还有，“价值”与“事实”是怎样发生关系的？自然的和道德的哲学还远没有最终地回答这些问题，甚至进一步说，也没有能摆脱必然要询问这些问题的那种处境。苏格拉底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他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这些问题的人，而且清楚地知道他在做什么。

苏格拉底的朋友中的几个人在他死后作为各哲学学派的首领而活动着，其中的一个，安提斯泰尼，是一个多产的著作家。人们

通常把这些人及其追随者叫作“小苏格拉底派”(Minor Socratics)。在我看来,这个称谓究竟有多大的合理性,是大可怀疑的。它反映了亚历山大里亚的传记的矫揉造作的图式化。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的麦加拉派对手们、他们的同时代人狄奥根尼(Diogenes)以及其他行为古怪的人(大家送给他们的绰号是犬儒学派[cynics])、公元前3世纪居勒尼的快乐主义道德学家们,分别通过欧克里德、安提斯泰尼和阿里斯提卜而归属于苏格拉底。但是在亚历山大的继承者的时代之前,没有任何居勒尼学派存在的证据;麦加拉派(他们以亚里士多德的好斗的对手的面目出现)明显地持有与我们所有的权威归之于欧克里德的那种严格的一元论不可调合的观点;尽管狄奥根尼及其摹仿者自称对安提斯泰尼怀有崇高的敬意,但是他们是否认为自己在任何方面都把他当作一个“创始人”而与之发生关系,这一点则是不清楚的。而且,欧克里德、阿里斯提卜、安提斯泰尼与其说是苏格拉底的“弟子”,不如说是仰慕他的朋友。欧克里德的学说是直接从埃利亚派传下来的;据记载,阿里斯提卜根本没有什么学说;安提斯泰尼的那些悖论的观点(人们想起他主要是因为这些观点)、他对于矛盾的可能性的否认等等,并非来自苏格拉底,而是来自“智者派”。其实苏格拉底最重要的“继承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柏拉图。

## 书目说明

给像本书那样的著作提供一个有关苏格拉底及其意义这个主题的含有大量文献——好的和坏的——的完整的一览表，这是不可能的。我只好提一下很少的几部最近时期的著作算了，在我看来，一个英语读者会发现它们是有用的和富有启发性的。

J. 伯奈特：《希腊哲学，第一部分，从泰勒士到柏拉图》（牛津，1914年）。

J. 伯奈特：《苏格拉底的灵魂学说》，载于《英国科学院院刊》，1915—1916年，第235页等。

J. 伯奈特：哈斯廷斯的《宗教和伦理学百科全书》第xi卷中的词条：《苏格拉底》。

J. 伯奈特：柏拉图的《菲多》（牛津，1911年）。

J. 伯奈特：柏拉图的《欧惕弗洛》、《申辩》和《克里托》（牛津，1924年）。

A. E. 泰勒：《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传记》，载于《英国科学院院刊》1917—1918年，第93页等。

L. 罗斑：柏拉图的《菲多》和《会饮》，收于《法兰西大学文集》。

C. 里特尔：《苏格拉底》（图宾根，1931年）。

I. 布隆斯：《希腊的文学肖像画》（1896年）。

J. 亚当：柏拉图的《申辩》（1905年）、《克里托》（1891年）、《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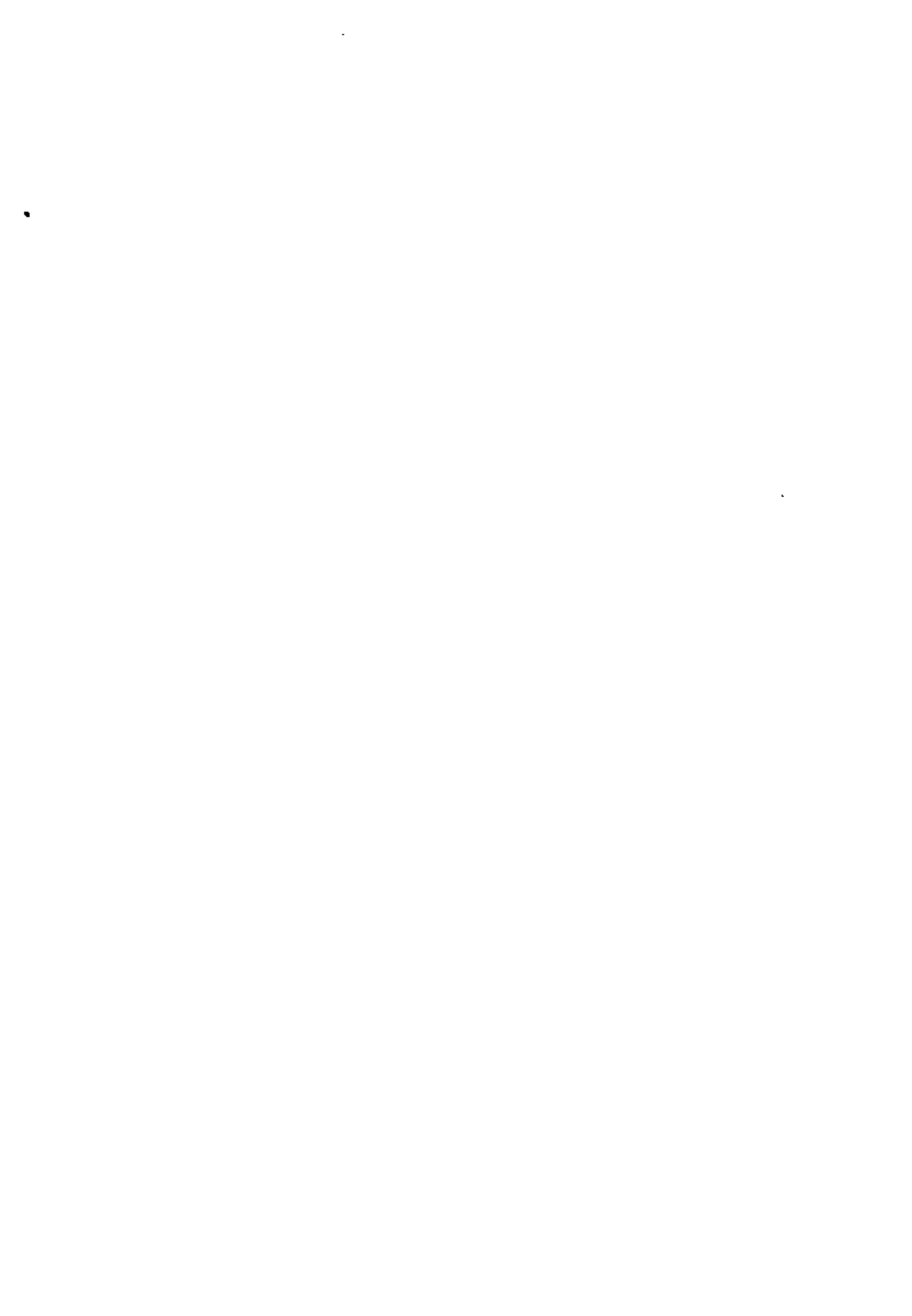


揚弗洛》(1890年)和《普罗泰戈拉》(1893年)诸篇的版本。  
剑桥大学出版社。

关于苏格拉底生平的历史背景,我建议读者主要阅读 E. 梅耶尔(E. Meyer)的《古代史》(*Geschichte des Altertums*)第 iv 卷和第 v 卷的德文原文,但格罗特(Grote)的较老的叙述仍然很有价值。

我极少提到 19 世纪的文献,因为我认为,虽然它很有价值,但它的大多数都奉行一条不信任柏拉图的叙述的错误路线。但我还是特别愿意从它的学术价值和这个巨大著作群中的佼佼者的角度,推荐格罗特的《柏拉图以及苏格拉底的其他伙伴》这部著作。苏格拉底生平的亚历山大里亚时期的文本,对于英语读者来说是极容易得到的,那就是 R. D. 希克斯(Hicks)翻译的第欧根尼·拉尔修的文本(《路白古典丛书》,海涅曼,1925年),它在《路白古典丛书》第 1 卷的第 148—177 页。还有两部稳健的和有教益的著作也值得一提,它们论述柏拉图描绘的苏格拉底关于“性爱”(erotic)方面的问题。它们是 R. 拉格尔博格(R. Lagerborg)的《柏拉图式的爱》(*Die Platonische Liebe*, 莱比锡,1926年)和 C. 里特尔的一篇较短的文章《柏拉图的爱》(*Platonische Liebe*, 图宾根,1931年)。我愿意特别推荐前一部篇幅较大的书。

在 C. 里特尔和 U. 冯·威拉莫维茨—莫伦多夫(U.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的大部头著作中,人们会发现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它们的名称都是《柏拉图》,但是苏格拉底当然只是它们偶尔谈到的主题。关于许多著述的价值的当今的种种理论,在 A. 迪埃(A. Diès)的《关于柏拉图的著述》(巴黎,1927年)一书的第 i 卷第 127 至 243 页中有一个很好的一览表。



# 希腊思想家

[奥] Th. 龚珀茨



### 第三章 苏格拉底 的生活与工作

1. 所有世纪都有其一定数量的头脑健全、清楚和冷静的人物；而且也不缺少热情人士。但是这两者的结合是稀少的，而且最为稀有的现象是一颗坚强有力的心用它的全部力量工作以保持在它上面的头脑的冷静，就像一个蒸气引擎可以使一个制冷机器运转一样。这样的结合在任何大的规模上 1000 年也只有一次。但是，当它真的出现时，就像要补偿它的稀有一样，它施加一种许多世纪也不会耗尽地持续存在的影响。这种现象的稀有是由于人类本性的根本特性。所有热情本身都趋向于心灵图像的含混而不是趋向于心灵图像的清晰。的确，一般说来情感的作用也是同样的。每一种情感都吸收滋养它的那些观念和形像，而排斥那些并不滋养它的观念和形像。以一种开放的、无偏见的心灵来感知和判断事实是不可能的，除非心灵里的不偏不倚性（亦即免于感情的干扰）已经首先铺平了道路。本杰明·富兰克林曾被称为“冷静清醒的热情人”。这个词可以在更高的尺度上应用于苏格拉底。那种支配他强有力人格的激情，那个他渴望为之殉难的原因，目的在于获得知识的明彻。他对于纯粹概念的渴求之热诚尤如过去任何神秘主义者渴望与上帝的心灵合一一样。他给予的推动唤起了道德

哲学的许多学派(或者毋宁说是宗派)的出现,其中无数有教养人士发现了代替崩溃中的流行宗教的东西。对于这个奇妙的历史现象给予真正的评估是本文专注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苏格拉底是雕塑匠苏福罗尼斯库的儿子,于公元前 469 年或稍早一点时候生于雅典。在他的青年时期,他学习他父亲的手艺。一直到古代晚期,一组象征美惠女神的雕塑作为他的作品在雅典的卫城上展出。这组雕塑也许与当地发掘出来的按那个时期的风格制作的浮雕完全一样。然而不管怎样,苏格拉底还是很快地抛弃了艺术以便把他的余生完全奉献给思辨。他不管家务,这无疑使他与克珊梯珀结婚,妻子给他生了 3 个儿子,就是毫无幸福可言。据说,安那克萨哥拉的学生阿基劳斯说服他研究哲学。他们的交游本书已有介绍(参照第一卷第 377 和 402 页)。他与阿基劳斯一起在萨摩斯岛上生活了一段时间,有着亲密的友谊。这种说法的根据包含在悲剧作家开俄斯岛上的伊昂的《朝圣历程》一书中。伊昂是一位值得信任而无偏见的见证人,他的证词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有问题。此外,我们知道目的或意图的概念在苏格拉底的思想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概念支配安那克萨哥拉的体系更甚于支配其他任何自然哲学家的体系,而在安那克萨哥拉学派中正好是阿基劳斯在研究自然的同时增加了对人生某些问题的研究。这样他就成了这样一位教师,他将在一位(如西塞罗所说)注定要把哲学从天上带回人间(亦即用人来代替自然作为研究的主题)的那个人身上唤起思辨的冲动。某种像是恶性循环的东西肯定可以归咎于这样一些批判者,他们先是拒绝相信当时的证据(这些证据甚至泰奥弗拉斯托斯也没有加以责难),然后又视而不见阿基劳斯研究过伦理学的完全独立的证据,说什么没有伦理体

系的哲学家充当苏格拉底的老师是不可想象的。无疑，这位安那克萨哥拉的信徒所做的不过是给苏格拉底的灵魂中投入一颗火星；由此而被点燃的这个燃料库并非有任何导师的恩赐。他的智力的创造性既表现在思想的无穷尽的充实上（他是以此而特别杰出的），也表现在许多关于他的心不在焉或极端的专注的轶事中。我们几乎可以说，他有时会被一时占据他心灵的问题完全支配。

“一天早晨他正思考某个他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他不愿把它放下，而是不断地思考它，从黎明一直到中午——他站在那里，完全陷入了沉思；到中午时人们注意到了他，于是在惊奇的人群当中就开始传开了苏格拉底从那天黎明起就一直站着思考某个问题。最后，在那天傍晚（晚饭后），有些爱奥尼亚人出于好奇（我应当解释一下，这件事发生在夏天而不是在冬天），拿来了草席，睡在露天，以便能够盯着他，看他是否会整夜站着。他整夜站在那里直到第二天早晨，当光明重新回到大地时，他向太阳作了祷告，然后就走掉了。”<sup>①</sup>

这是柏拉图的对话《会饮》篇中苏格拉底在那次战役中的战友亚西比德所作的描述。我们想起了牛顿：有一天近中午时，人们发现他衣服穿了一半坐在床上，陷入了沉思；另外一次，他长时间地呆在地窖里，他本来是去地窖为客人取一瓶酒的，但到了那里一股思潮袭来缠住了他。

他在战斗中的英勇无畏，他对所有外界事物的漠不关心（亚里士多德称之为恢宏大度），他对于冷热以及饥渴的不寻常的忍耐力，他不伤害思维能力的超群的酒量，——所有这些都是他的特

---

<sup>①</sup> 参见：柏拉图《会饮》220。

点。它们或者是由《会饮》篇中亚西比德描述的,或者是在对话过程中显示出来的。像这样一种强有力的性格必定原本就有许多强烈的冲动,而且只能通过自我教育的过程达到灵魂的宁静,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能不相信有关那方面的古代传说。苏格拉底的得意门生埃利斯的菲多写有一篇题为左毕鲁斯(叙利亚预言者和观相术士)的对话,说到左毕鲁斯从苏格拉底的面部表情上看出有强烈淫欲的迹象。聚焦在一起的弟子们发出了大声的抗议,但是苏格拉底让他们安静下来,他说:“左毕鲁斯没有错。然而我已经制服了这些欲望。”关于苏格拉底的火爆脾气,尽管没有充分的证据,但本身并非是不可能的,那就是有一种说法,说他曾有时爆发狂怒。这种爆发不会是经常的,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更胜于强有力的意志建立起来的、作用于每一种感情的控制。的确,自我控制对于他选择的事业来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条件。因为他一生的伟大事业就是对话。在市场上钱币兑换商的桌旁或在连结运动场的大道上,他都是一个人们熟悉的人物。在那样的地方,他会根据具体情况与年轻人或成年人进行交谈,并且会抓住某件小事从容自然地把话题转入最深刻的问题的讨论。这些谈话,经过他的学生们的整理加工,成了文学上一个伟大分支的典范——苏格拉底对话——并且作为后来的几乎所有哲学学派的一笔遗产而流传下来。但是,如果这位伟大的对话艺术家不想让人们避面远之而是想受人欢迎的话,那么他就不应当让他的交谈者们强烈地感到他们在智力上处于劣势。以下事实使做到这一点变得非常容易,即他选择了一个探索的领域,它更像是一个未被发现的领域,而不是一个已被很好研究过的领域。在那个时代,对人类事务的严格科学研究还几乎完全是新事物。苏格拉底始终坚持说,他是一个



对于真理的卑微和谦逊的探索者,而不是穷尽一切知识的骄傲的拥有者,不是没有道理的。而且他煞费苦心地强化这个印象。“讽刺”是一个希腊名词,表示喜欢戏弄,特别是狡滑地表示谦逊(最好称它为自我贬低),这恰好与 *αλαξουεία*(自吹自擂)相反。它绝妙地与阿提卡的才智之士的文雅以及流行的社会交往方式完全和谐一致,其中所有粗糙和滑稽的东西可以说都被仔细地清除掉了,在很大程度上是苏格拉底特有的东西。他把这种自然倾向发展成了一种有力的交谈武器,而且前面已经提到,当时的环境有助于他选择一个实际上尚未触及的研究领域——所有这一切结合在一起便产生了著名的苏格拉底的讽刺,把它看作仅仅是一个假面具或者一个纯粹的自然特征,同样是不正确的。由于那些被苏格拉底拉进对话中来的人,常常是相当自尊和有虚荣心的人,由于讨论经常以他们大败而告终,证明他们完全缺少他们自信地认为他们拥有的清晰的观念和准确的知识,所以再多的“讽刺”或对他人的体贴都不能够阻止这些交谈为他们留下一种苦涩的滋味和不愉快的记忆。的确,苏格拉底的最重要的目标是使他自己和其他的人深切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影响人类生活的最重要的问题都是些尚未解开的谜,每一个人从孩提时代起就习惯于以不加思索的自信加以讨论的那些语词和观念,实际上都充满了矛盾和含混。而且,个人受到羞辱并不是这些对话参加者所带走的唯一不愉快的印象。一个人若对迄今为止人们的看法毫无疑问完全一致的事物提出疑问,那么不管他作何谦逊的表白,都有可能被看作是一个高傲自大的怪人和自称无所不知的人。论及那些基本问题(例如,“什么是公正?”“什么是虔敬?”“什么是政府的最好形式?”)的人还有可能遭到更糟糕的猜疑,被看作是一个破坏社会安定的人,一个危

險的鼓动者和革命者。任何人干预社会大厦的基础,就很难逃脱企图推翻它的指责。我们还必须记住,这样一些印象由于苏格拉底缺乏谋生的手段和没有固定的职业而被大大地强化了。我们将发现,令人吃惊的是他的人身和他的工作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没有受到攻击。他不仅数十年一直在从事一种没有先例的或可与之比拟的活动,这种活动尽管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但却没有遭到强烈的反对——他成功地在他的周围聚集了雅典的一些最有天赋的人和一些最杰出的青年,如像亚西比德、克里底亚,以及后者的亲戚柏拉图和哈尔米德。被喜剧作者称为“乞丐般的唠叨者”的这个人,甚至找到了通往以后成为城邦首脑的伯里克利为首的小圈子的人口。根据这些事实,我们可以断定,在雅典,人们非常看重智力和天才,在雅典的上流社会中,矫揉造作的形式主义和狭隘心胸的因袭性,没有什么立足之地。但是一般的雅典人,且不说那些对苏格拉底有个人恩怨的人,一定用非常不同的眼光看这位怪人。关于他,绝大多数人所知道的不过是他曾说些阴阳怪气的话,话中不饶恕任何崇高的或神圣的东西;他不畏惧任何权威,甚至也不畏惧拥有最高权力的平民(其他所有的人都讨好他们);人们看到他不论在早上还是在傍晚都到处闲逛,神态傲慢,目光坚毅,不修边幅,冬天和夏天都穿着同一件磨破了的大氅,“光着脚,好像对鞋匠怀恨在心一样。”受人尊敬的普通人只不过把他看作是一个懒散的闲逛者和一个渎神的诡辩者。这种看法得到了喜剧诗人们的认同,他们把这个著名的人物搬上舞台,他有着森林怪物西稜努的面孔和稀奇古怪的举止,舞台上还有“疯狂的阿波罗多罗斯”或者瘦削的“半饥饿的、黄杨木色的凯勒丰”,成了他们无休止嘲笑的对象。

2. 极少有机会来更正这个定论。苏格拉底在战斗中是一位勇敢者的声誉可能难传出他狭窄的战友圈子之外,因为他未曾担任过指挥官。他也未曾在城邦内部的争吵中起过任何作用,这种争吵直到那个世纪之末都一直困扰着雅典。“三十暴君”最初把他当作他们事业的一位追随者,可能是由于他与他们的首领克里底亚有个人关系。只有在这样的假设上,我们才能解释他们为何指派他带领4个人去逮捕这些寡头们的反对者——萨拉米的莱昂。然而,苏格拉底拒绝给予合作;尽管他曾非常直率地批评过民主制度真正的和假定的缺点,但他绝不愿意帮助恐怖的寡头统治。可是这件事太微不足道了,不足以使他赢得人民的喜爱,即使这件事曾更广为人们所知,情况也是一样。苏格拉底只有一次卷入了相当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中,但这并没有导致什么永久性的后果。

公元前406年8月,雅典人在列斯波岛和小亚细亚海岸之间叫做阿尔吉努的两个小岛附近,获得了一次辉煌的海上胜利。然而他们的胜利被一个令人非常痛苦的事件弄糟了。司令官们没有救出不少严重受伤的战船上的人员,也没有找回死者的尸体。我们无法断言将军们是否应当受到指责。不利于他们的一点是,他们对指控作出了相互矛盾的答复。最初,他们回答的大意是,一场风暴在战斗之后立即袭来,阻碍了救援工作的展开;然而后来他们又指控两位负责救援工作的军官玩忽职守。当这个问题第一次在人民大会上提出时,给与被告人的是一片沉默和不动感情的倾听,大会作出的决议是,将依据主管当局(即五百人会议)的初步裁决,来决定是否提出进一步的起诉。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导致了令人痛惜的后果。当时有一种叫阿帕图利亚节的

庆典<sup>①</sup>，这是爱奥尼亚人的部族庆典。在这种庆典上，雅典人习惯于按“兄弟会”划分聚集庆祝，在庆祝会上，将当年出生的孩子交给兄弟会的成员，进行注册登记；小学生们当众背诵诗篇来欢愉他们的父母，等等。最重要的活动是向统辖不同兄弟会的诸神庄严地献祭。从兄弟会这个词最严格的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家族的节日，与我们的圣诞节差不多。人们计算着他们心爱的人的数目，而死者在他们的行列中所造成的每一个空缺都使人倍感伤心。公众愈来愈愤怒，矛头指向那些将军们，他们的过错是或被认为是使得那么多公民丧失了生命，并且剥夺了另一些公民参加葬礼的机会，而葬礼在古代人的宗教感情中是至为崇高的。似乎是在嘲笑欢乐的庆典，死者的父兄们身着丧袍，剃光了头，到处走来走去，这样就煽起了大众的激情。在这种情况下，起诉又在五百人大会上重新进行。一项由卡里克塞努提出的决议获得通过，根据这项决议，将取消对这个案子的司法调查，而将由人民大会通过秘密表决来决定将军们是有罪还是无罪，并且是对被告全体作出判决。若作出有罪的判决，接下来就是对将军们行刑和没收他们的财产。召集来处理这个案子的大会是实际革命时期之外最猛烈的，这件事我们有相当数量的文献记载。卡里克塞努的提议究竟是否不合法并且在多大程度上不合法是个问题，对此雅典宪法的最好专家的看法仍有分歧。无论如何，它是与宪法的精神相左的，而且基于这个理由，欧瑞普托勒穆及其朋友们正式地对它提出反对。这种反对活动使得由指责性提议引起的诉讼暂停进行，直到对它的所谓非法

---

① Ἐπιγονήματα 是阿芙罗蒂特 (Aphrodite, 即爱神) 在阿果斯的名字。这个庆典每年在雅典和一些爱奥尼亚城邦中举行。——译者

性问题作出法律上的决定。如果这个断言得到证实,那末这个提议的提议人和他的同伙可能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即使在那个时候,激情的风浪是如此之高涨,被召集起来的人民也并未简单地践踏这些宪法的形式。大会在意见上是分歧的。有人高叫“人民的意愿受挫折,这太可耻了!”另外的人则高叫“如果人民不尊重自己制订的法律,那就太可耻了!”看起来一个决定性的动力是由一个人的出现造成的。这个人原在 25 艘被击坏的三层船中的一艘上服役,经历巨大的艰辛靠着一个食物桶才得以上岸逃命。他在大会上报告说,他的同志临死时的愿望是,向把勇敢的和获得胜利的公民们置于危难中而不顾的将军进行报复。欧瑞普托勒穆受到威胁,要他撤回他的反对意见,否则将把他也包括到被告之中,但是全部障碍并未由此而得到清除。大会的诉讼程序由一个五十人团管理,这 50 个人叫做主席团,由五百人会议中的 10 个部族中的一个部族的代表组成,它形成会议的一种常设委员会,在一年的 1/10 的时间里代表会议处理公务。按照常规的轮流次序,那个时候的主席团是安提阿克部族的代表,苏格拉底就属于这个部族。这个委员会的多数拒绝把卡里克塞努的提议交付投票表决,这又引起另一场义愤的风暴。这个新的障碍也用与前面相同的威胁加以克服了。唯独只有苏格拉底(正如他的学生柏拉图和色诺芬告诉我们的)毫不动摇地坚持他凭良心作出的信念。

现在诉讼采取了它的常规程序。恫吓至此有了结果,依据大众压倒多数的感情所要求的意见来决定起初的宪法问题。但是大会并未因所有这些蜕化为一场暴力行动。为将军们辩护的欧瑞普托勒穆并没有要求宣判无罪,而是仅仅要求根据习惯对每个被告的起诉应按合法形式分别进行,这种习俗虽然对大会可能没有约

束力,但却有一种已经确立的惯例的力量,并且得到“准则的命令”的支持。在另一方面,卡里克塞努坚持他原来的提议,双方的演说都在沉默中被听取。随后的举手表决赞成欧瑞普托勒穆的占多数,至少这是负责计票的官员所报告的。但是这个报告受到了挑战,也许并非是没有理由的。主席团的多数只是向优势力量的屈服。计数可能不是绝对无偏向地作出的。要求进行第二次举手表决,而这一次的结果不利于欧瑞普托勒穆。现在到了进行秘密投票的最后程序。决定被告人命运的投票筹码塞满了票钵,作出的裁决是“有罪”,这意味着当时在雅典的6位将军的死亡,以及两位不在雅典的将军财产的被没收。

像在雅典的通常情况那样,这个事件之后,出现一场暴力的反对。过了几年之后,对犯错误的人民领袖的起诉使得他们遭到放逐,到最后造成他们领袖卡里克塞努的自杀。在这个关头,那位叫做苏格拉底的怪人的毫无结果的抵抗被人们记住吗?在那个事件上他获得了较高的评价吗?他也许得到过这些,但可能性不大。无论如何,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政治事件有双重的兴趣。它显示了苏格拉底的性格的力量,同时为他生活的外部环境作了侧面的说明。如果苏格拉底学派没有记住这个事件,并认为它值得记载,我们决不会知道他们的老师曾经是五百人会议的成员,可见他事先未曾鄙弃参加抽签,得以担任这个职务。这是他曾经担任的唯一职位,对此我们有柏拉图的明确保证。但是,诱使他参加这种抽签的同样动机,一定也在其它场合引导他的活动。也许他不止一次地担任过旧时较不富裕阶级雅典人喜爱的职业,并以作为陪审员的低微收入来弥补他从朋友们那里获得的感情礼物的不足。在法庭上,他肯定会发现那些他喜爱研究的人类本性的材料。但是他

主要是从他始终不倦地从事的讨论中得到这些研究材料的,但无疑他首先重视从思考他自己问题的讨论中取得的帮助。现在是谈一谈这样进行的研究的形式、材料和结果的时候了。

3. 我们从他知识上的孙辈亚里士多德那里得知:“两件事情可以归属于苏格拉底,即归纳推理和一般概念的确定。”我们可以加上:归纳推理是概念形成的辅助手段。“归纳”这个字在这里使用的意义与它现在所含意义有点不同。我们现在理解它是指从许多特殊事例引出影响一整类事实的一般规则的智力运作。我们用归纳的方法来查明共存和相继的统一性,无论它们是终极的还仅仅是派生的规律。因此,是一种正确的归纳法教导了我们:所有人都是要死的;一种不正确的归纳法(因为仅仅接近于完整)肯定:在整类哺乳动物中,没有一种是卵生的,而是全都把它们的幼仔活着带进这个世界。苏格拉底的归纳法,像我们的一样,用比较个别事例的办法来进行。但是它的目的是要得到一种逻辑上真实的准则(不是对于自然而是对于思想观念而言)。它的主要目标是确定概念,也就是确立定义。所使用的程序是双重的。有时是检验一系列事例,力求确定什么要素对于它们全体是共同的,从而演绎出这个概念的一般结论。第二种归纳法从已经存在并流行的定义开始,对它们仔细加以检验,旨在发现它们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依靠包含在它们之中的不同事例所真正共同具有的要素;或者在另一方面,具有的共同特征是否以及在什么程度上不过是一种假像,如果是这样,什么修正,什么扩展或者什么限制会使这个定义成为共同特征的真正表达。亚里士多德在区分这两种归纳法时,把“归纳法”这个名字(这个希腊语词意为“引向”一个目标)保留给第一

种；对于第二种，他使用了“比喻”这个名字，也就是说，为了比较的目的使二者并列。柏拉图的对话，特别是那些早期的或苏格拉底时期的对话，充满了这两种方法的例子，对我们在阐明它们的任务中，有最大的帮助。然而，以下的例子从一位权威人士那里取来，此人缺乏精炼，绝不会怀疑到把他自己的思想和方法当作苏格拉底的思想和方法给予我们。色诺芬这样告诉我们，问题产生在学生圈子里：“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苏格拉底提议在沙土上并排地写上这两句话的开端字母，然后在它们下面写上属于各自范畴的各种不同活动的名字。在第二栏下，写下了这样一些活动，如说谎、欺骗、暴力等等。现在，注意力被吸引到那些似乎与这个排列相矛盾的事例上。在第一个例子中，出现的情况是，所有这些活动如果在战时和反对敌人时使用，就不再是不正义的。这样就达到第一个修正。所提到的种种行动方式，只有在对朋友使用时才列人不正义（在这个字的最广泛的意义上）项目之下。但是事情到此并没有终止。如果一位将军为了重新鼓起他军队的消沉士气，作出了虚假的宣告，说友军正在到来，那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又如一位父亲，他的生病的孩子拒绝服药，于是将药混在食物中，用这种欺骗手段使儿子恢复健康，那又怎么样呢？再有，假如我们有一位朋友患了抑郁症，如果我们拿走了他拥有的武器，而这武器他可能企图用来结束他的生命，那又如何呢？这样，在确定这个概念中，我们因而得到了一个新的要素。为了提到的活动可以正确地被看作是不正义的那一种，它们必须是有意伤害受它们威慑的人们的行动。真的，这种研究并没有得出一个正式的定义；然而，它是一种分类的尝试，旨在为获得这样一个定义铺平道路。它主要关心有疑问概念的范围而不是它的内涵。但是对于“非正义”所



属种种概念的更确切的确定为那个概念内容的更严格的界定铺平道路。不论最后设定的定义是什么样形式,它都不能不包括“使用欺骗或暴力伤害不是战争状态中敌人的其它人。”

这样,尽管苏格拉底主要关心的是概念的哲学,以致于遵循一条导致共相的研究路线,只是以最大的小心和审慎他才从特殊过渡到一般。他的方法的特征没有更好地加以证明。在他害怕过早的概括中,他完全是那些探究者中的一个,他们在现代被认为是归纳方法的特殊代表。我们不断被提醒,注意到培根派学者对不可接受的概括的警惕。至于他的归纳的题材,只能由从属于日常生活和日常思想的事件和概念来提供。色诺芬说:“苏格拉底总是为他的研究选择最明显和最被普遍接受的出发点,认为这是最安全的计划。”在这一点上,他与柏拉图最为密切一致。他的谈话中充满了鞋匠和铁匠、漂洗工和厨师等手艺人的气息,还经常提到牛、马和驴。他的对话因此有一定的家常风味,并经常遭到嘲讽的评论,然而他对此以微笑的泰然态度来承受,以那种对神的安详信赖来承受,对神的信赖对于他来说是相信真理不可避免会获胜的同义语。

他研究事物的特殊方式也不限于构造概念。的确,概念不过是判断的要素。如果苏格拉底力图以直接的和间接的手段促进判断的明晰性和可靠性,或者如果他使他的方法在理论研究领域之外保持有效,我们不必感到惊奇。他曾提议要治疗年轻人的不成熟的自信,并动摇他有能力处理城邦事务的信念吗?他会把治国才能的一般概念分析为它的组成部分,这样,通过一系列的提问和回答,引导想成为政治家的人不知不觉地得出结论,即他完全缺乏所需要的知识。在另一个场合,他把同一方法用在完全相反的目的

的。一个有健全理智和成熟判断力但是过分羞怯的年轻人,对于参加在公民大会上的辩论感到畏缩,就向他提出一系列问题使他看到:他没有理由在组成公民大会的任何一个不同阶级的人面前感到害羞,因而他也不必害怕面对整个公民大会。如果证明特殊知识是干公务不可缺少的资格的话,那么办法只能是再次提问。请问,谁会雇用一位医生,一位舵手,一位木匠等等?他们是由抽签挑选的,而不是选举一位有知识的人,考试他是否具备要求他执行的任务的能力。这些都是苏格拉底方法的相对细小的例子。但是在处理困难得多和复杂得多的主题上这些方法同样有效。这位大师在穿过一个错综复杂问题的迷宫时表现的坚韧性也是不屈不挠的。希望获得的解决办法,当它显然容易被抓住时,反而变得比以往更为遥远;它更像一头被猎取的狐狸,忽而转弯忽面折回,尽管它最终会被抓到,但追赶往往以承认失败而告终,而一场漫长的苦活必须重新开始。研究者最高的伦理美德——无穷尽的耐心,在这里与最伟大的智力上的优点之一——绝对不带偏见地相结合。用一句惯用语来表达苏格拉底的态度,即没有一个论点是这样的不言自明,这样的普遍合适,能告知我们充分理由,以致可以不要求我们根据最早原理重新加以考虑和再次检验它的正确性。没有一种主张是如此自相矛盾或如此令人吃惊,以致免除我们有给予它充分和公正听取的责任,免除我们有勤奋地仔细推敲有利于它的论点和以法律般的公正性来衡量它们的责任。没有研究(无论它怎样繁重)可以逃避,没有意见(无论它与我们的感情多么敌对)可以被愤怒的吼声压倒或者被讥笑和辱骂窒息。这位胸怀宽广、思想坚强的雅典思想家成功地结合了两种几乎不可调和的品质,即在讨论关于人最关心的事情时的炽热的情感和在处理这

些问题时的冷静、不动感情的坦率。他的判断并不为爱所腐蚀,不为恨所蒙蔽。的确,他从来只恨一件事,那就是“厌恶交谈”或者“憎恶论证”,它是无拘束和无偏见讨论的最大障碍。“没有相互诘问的生活。”也就是没有智力在追求真理中运用的对话,对于他来说,“是不值得活的”。

从苏格拉底的对话的形式和精神,我们进而讨论它们的教导。在这一点上,请读者务必允许我们说点离题的话。柏拉图、色诺芬和亚里士多德的名字已经不止一次地在前面提到过了。在以后各章中我们有机会讨论这些直接或间接是苏格拉底学生诸人的特性。但是在谈到他们对于他们老师教导的接受能力前,现在需要对他作一些初步考虑。我们不拥有苏格拉底本人的一件著作,只有4行韵文可能是个例外,而这4行韵文即使其著作的真实性没有问题,但它不能告诉我们什么。因此,我们关于他教导的知识只能依赖其他人的记述,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占优势的是依赖我们已经提到的3个人的记述。在苏格拉底的方法和精神方面,它们是那样地完全一致,以致迄今我们能够不必对它们的相对的可信性进行任何讨论。然而,现在这个问题迫切地要求我们加以注意。

4. 我们的很大部分的知识是从柏拉图的著作中得到的。这些著作全都以对话的形式写成,除了一篇以外,在全部对话中,苏格拉底都作为一个角色出现,并且通常扮演主要角色。因而他最卓越的学生给予老师的崇高的尊敬对我们当然有充分的教益。一位第一流的艺术家,一位无与伦比的语言肖像画师呈现给我们他可敬朋友的惊人清晰和栩栩如生的肖像。这幅素描的忠实性没有受到最小怀疑的阴影污染。它完善地与它本身以及与其它所有关

于苏格拉底性格的记载相一致。但是,必须承认,这是理想化了,正如肖像画的伟大艺术家们的所有其它作品一样。本质特征以大胆的线条与颜色大大突出,而从属的特点或者与一般外表相调和的缺点只轻轻地勾划或者不使显示。还必须记住,柏拉图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自认为在处理上做到毫无遗漏,而且他对苏格拉底生活的不同片段,和对他事业上或他的个人关系上(例如对阿基劳斯、色诺芬以及其他人的关系)保持沉默,在这些方面就不具有最小的引证价值。

情况与包含在柏拉图著作中的“教导”非常不同。作为第一流的有创见的思想家的著作,很难期望它仅仅是苏格拉底教导的复制品。正如我们马上将要看到,亚里士多德在这些问题上是我们的主要见证人。他明确地宣称,柏拉图的基本学说之一的所谓理念学说,苏格拉底并不熟悉。这个学说在柏拉图的不同著作中有多种多样和经常改变的解释,而且它经历了不止一次的变形,部分地是由于这个思想家自己的进步,部分地是受其他人影响的结果。然而这个学说不论是其原来形式或者是大多数修正形式,都是由柏拉图放在苏格拉底的口中。像白昼那么清楚的是,这位诗人—哲学家在这里以及别的地方,都允许他自己有充分的和不加限制的自由,这确实是人们所期望的。说柏拉图以他与苏格拉底共有的大量信念出发,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他相信他自己严格按照受尊敬老师精神阐明了和修改了老师的主要学说达到什么程度,在他的晚年他又是怎样与他自己的过去决裂,并同时割断他与苏格拉底的联系,他首先把苏格拉底降低到背景的地位,然后整个地从他的对话的结构中排除出去——所有这一切当我们论述柏拉图本人的发展时将会弄个明白。

很少的艺术家自由,却并无很多的历史忠实,这两点都能在色诺芬留给我们的记叙中发现。这位能干的官员也是一位有天赋的作家,他利用中年时期的闲暇写作了一系列描写苏格拉底的生活和教导的著作。其中最有价值的著作叫《回忆录》,它记载了苏格拉底的值得注意的言行。凡从色诺芬繁忙的笔下产生的许多其它著作中已经熟知他的主要特征的那些人,将研究这部著作以及其它3部附属作品,可以这样说,在这3部作品中已有写这部书的构思。这3部作品是《会饮》、《家政》以及容量略小的带有并无不利期望的《申辩》或为苏格拉底辩护。因为既没有思辨的独创性也没有对于艺术地改写的冲动,人们会认为有充分的分量损害这些记录的真实性的。然而,这样的预料注定会成为现实但只是不完全地成为现实,色诺芬缺乏某种天赋,这将会阻碍他的这项事业,但与此同时,他缺乏某些对于他事业成功的最重要的条件。

色诺芬叙述苏格拉底的谈话并非总是与事实相符,这一点可以从色诺芬本人的著作中得到证明。在他论家政这本著作的开始处,他肯定在苏格拉底与克里托布鲁斯谈话时他本人在场并听到了这场谈话。这段陈述必定是纯粹的杜撰。因为在对话的过程中,提到了一件事,色诺芬不可能听到苏格拉底说到这件事。我们提一下小居鲁士之死,他于公元前401年战死于库那克萨,那时候色诺芬在居鲁士的兵营中,他在许多年之后才回到希腊,在苏格拉底于公元前399年被处死很久之后。我们无需花大力气去证实由此而产生的怀疑。对波斯社会的详尽思考,是这位学生极为关心的而这位老师极不关心的主题。的确,苏格拉底从未访问过外国;事实上在他成年之后,除了去特尔斐朝圣和除了服兵役之外,他没有离开过雅典。再者,喜欢在农业的细节上消磨时间对于像色诺

芬那样的农夫来说是十分自然的,但是出于苏格拉底之口则是大为奇怪的了。他从未不必要地涉足于城门外,因为如柏拉图文章中引用他的话:“从田野和树木得不到什么教益。”因此,《家政》必须从严格的历史实录的名单上去掉。试图给予这部著作或者给予《会饮》以任何那样的例外地位,从而使得我们能够坚持《回忆录》的完整无损的历史性质,也是无实在意义的。我们发现《回忆录》上有这样一段话,谈到小亚细亚民族密西亚人和皮西迪亚人,描写他们居住国的特点以及他们进行战争的方式。这些主题在这里的处理方式与《远征记》中如出一辙。也就是说,在那部色诺芬记录“十位千夫长”的撤退的著作中(色诺芬本人参加了这次撤退),他偶然地有机会基于个人的观察记载了上述的部落。事情的真实状况又一次地像白昼一样清楚,那是色诺芬本人通过苏格拉底之口在向我们讲述。从上述事例上,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说,我们的作者使用苏格拉底的名字只是为了增加艺术效果,因而对话都是纯粹的虚构,或者甚至色诺芬根本不希望它们被看作别的任何东西?近年来有人持这个论点,但是,如我们认为,这个论点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力量。首先,假定色诺芬没有要求在他有关苏格拉底的著作中作出实际事实的记录,这显然与他为自己提出的任务(特别是《回忆录》的任务)的性质相矛盾。因为在那部著作中,他宣布他的目的在于驳斥审判中对苏格拉底的指控,可能特别针对后来由修辞家波利克拉特斯给这些指控写成的文学形式。他也没有单独地使用对话;书中苏格拉底的习惯以及他的生活中的特殊事件都是以叙事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还有,色诺芬宣称在某些重要部分他设计完成后由其它学生作叙述。如果他希望这部著作中报道的对话仅仅被看作是虚构的话,所有这些话就没

有意义了。“真理与谈话”(Wahrheit und Dichtung)这个短语,非常适合应用于这些谈话的实质。色诺芬竟会凭空编造一切东西而没有报导任何东西,他竟会竭尽全力抑制他并非十分强大的想象力,让储存在他记忆中的宝藏白白湮没,这是极其不可能的。而且我们有明白无误的迹象表明,出现在这些谈话中的所有的思想、短语的特色和习惯用语,绝不是色诺芬本人的相对贫乏和平凡的心灵中创造出来的。在几乎令人不能忍受的啰嗦语句的旁边,我们看到精练得极为简洁几乎难以理解的段落;在琐碎无聊令人发生反感的言语的旁边,我们看到以其深刻的创见和辛辣的悖论为标志的其他言语。对话往往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结论;这迫使我们作出假设,它们的报道者忽视了或者不懂得它们的真正范围和要害。

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肯定地在可信报导与不可信报导之间划出界线呢?这只是在近年来才着手探讨的问题,但是我们相信已经找到了基本上确切的回答。如果我们要避免让主观因素占压倒优势,特别是避免让支持或反对色诺芬陈述中个人特色的个人的偏爱或反感占压倒优势;如果我们要把苏格拉底的东西给予苏格拉底,把色诺芬的东西给予色诺芬——那么寻求某种客观标准就是绝对必要的了。这种寻求也不会是徒劳的。一方面,我们拥有色诺芬的许多其它的著作,从这些著作我们可以得到关于他的个人特征的清晰看法,甚至在很大程度上看到这些特征在他的生活环境中的逐步形成。另一方面,我们有一些苏格拉底教导材料的叙述可供使用,尽管这种材料不是很多,但却是完全可信的。运用这两种标准要求极端细心和最精细的识别力。给读者提供这方面研究的全面和详尽的报告会与目前的工作计划相冲突。它的第一

部分结果将包含在后面叙述色诺芬生平和著作的一章里,我们提到的第二个标准由亚里士多德的简短的、但完全可信的陈述来提供。在他那里,我们有一个既有最充分的专家知识又有最尖锐判断头脑的见证人;他对伟大的历史事实,对苏格拉底的工作,似乎有足够准确的了解,与此同时他完全足够不为那个有魔力名人的吸引力所左右,是反对任何英雄崇拜倾向的可以相信的人。最后,他的解释既不是辩护的声音,也不存在艺术家配置明暗色度的特色,而是平易地和严肃地实事求是的,不是说这是一个毋需预先警惕即可采取的信息来源。使用“参考”这个词并非总能使我们有把握地说,亚里士多德是不是记住历史上的苏格拉底或者柏拉图对话中的苏格拉底。更有甚者,他没有连贯地叙述苏格拉底的教导;他仅仅一般地由于参加辩论的缘故偶而提到苏格拉底教导的孤立的片段。提到的也许是侧重它的弱点以供批评。然而,特别是如果我们小心注意刚才说到的错误来源,依然有可能从那些参考资料中得到无限价值的收获。当然,一定不要忘记:它们是不完全的。亚里士多德生活在苏格拉底学派之中;他本人属于这些学派中最重要的一个学派,在苏格拉底教导中,普遍地认为是他的教导的那些部分和最少受到批评的那些部分,恰恰就是他最少有机会来谈论的部分。但是,关于苏格拉底的学说的核心和精髓和作为它特殊发展的所有细微差别基础的基本纲要,我们没有必要要求有明确的文献证据。伟大事业的性质已经由它自己的惊人效果向我们揭示了。由天国流出灌溉全世界的溪流带着证明它们光荣源头与出处的雄辩证据。



## 第四章 苏格拉底的教导

1. “没有人自愿犯错误”这几个字体现苏格拉底主义的核心。这是树的主干,从这里我们必须向下追踪到它的根部,向上追踪到它的分枝。这句短短的话是信念的简洁表示,即任何道德上的缺点都有其智力中的根源,是由于理解上的异想天开。换句话说——知道什么是对的人作对的事;缺乏洞察力是道德上缺点的一个和唯一的根源。鉴于这个学说,我们很容易理解苏格拉底是怎样地注定要赋予概念的明晰性以无限的价值。要看到这种对智力以及智力对生活行为的最高意义的过高估价是怎样在苏格拉底的心灵中形成的,那就比较困难了。可以肯定,努力做到用鲜明概括的概念和清晰的理解来代替不清楚的观念和模糊的猜测是整个那个时代(我们在上文章节中称之为启蒙时代)的主导特征。那个时代在智力文化上以及把智力文化应用于阐明公共生活与个人生活的主要问题上的热情,认真追求以自我学到的知识来代替传统,以受启发的思想来代替盲目的信仰——所有这些倾向,我们已经一再评论它们最富特色的表现形式。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记录人们被新的思想趋势错误导人的各种单方面的判断;例如倾向于对人类过去的非历史理性主义概念,特别是关于文明的开端和关于国家、语言及社会的起源。但是我们称之为那个时代的理智主义,在苏格拉底身上达到顶峰。在他的时代以前,人们认为:意志同智

力一样,需要加以培养,培养的方法是奖励和处罚、练习和养成习惯。读者可以参考上文已经提到的关于流行于那个时代的教育理论的论述。苏格拉底坚决主张,被亚里士多德称作灵魂的非理性部分的东西是不存在的。所有行动都由智力决定。而智力是全能的。知道什么是对的然而却不服从那个认识,相信一个行动是错误的然而却屈从于推动它的动机,这种事情对于苏格拉底来说不仅是可悲的和灾难性的,它完全是不可能的。他并没有怒斥或谴责、而仅仅否定那种他的同时代人叫做“被欲望战胜的”心灵状态。罗马诗人给这种状态一个典型的语言刻画:“我看到和证明了较好的,但却跟随较坏的”。

没有什么比查明和指责这个观点的片面性更容易的了。更加重要的是充分和完整地认识包含在这个夸大其词中的真理成分,理解苏格拉底怎样把真理的重要一部分当成整体,并估价由伟大“单眼人们”中最伟大的人,把这个真理的被忽略部分置于最耀眼的光芒之中这件为人类服务事业的巨大意义。

尽管苏格拉底否认其存在的心灵状态确实真正地发生,但它的发生是远比一般设想少得多的现象。那被激情克服的东西经常不是性格和信念,而仅是它们的相似物。思想清晰的缺乏、混乱的概念、对行为理由以及对训诫的整个规模和恰当含义的无知(从而对训诫作出含混和一般的赞同)。这些以及其它知识上的缺点,对于解释生活的最大祸害——原则与实践之间的分裂是大有好处的。即使这些知识上的缺陷不会完全摧毁性格的统一,它们也限制了性格的延续;正是通过它们,使得最相互矛盾的对立面得以和平地共处于同一个胸怀之中。正是缺乏明晰性和确定性造成了性格的脆弱和麻痹了它的抵抗力量,给错误的动机提供了轻而易举

的胜利,并且经常得出虚假的印象,认为招致失败的是攻击的力量而不是抵御的软弱。我们甚至发现思想的混乱使得人们承认几个互相抵触的判断的最高标准。由此造成的灵魂无政府状态,没有比一位现代法国喜剧作家的话表达得加恰当,他让戏中一位角色说:“你说的是哪一种道德?它们有 36 种,有一种社会道德,它不同于政治道德,后者又与宗教道德无关,而宗教道德又与商业道德无共同之处。”

但是尽管有所有这一切,断言正确思考是正确行动的保证,只有非常有限的正确性的范围。只有在行为的目的没有问题而唯一的疑问在于手段的选择时,才能严肃地做到这点。当目的由行动者的毫无疑问的利益所决定时特别是如此。农夫在他的田野上播种,驾驶员把着舵,工匠在他的工场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必定把他们的意志对准尽可能好地完成他们面前的工作。对于他们来说,成功或失败主要地依靠他们的一般聪明和他们的特殊知识。在这种类型的情况下,苏格拉底的基本原则至少近乎真实。没有什么东西比这样的观念更能引起苏格拉底如此持久的惊诧,这个观念不断萦绕在他脑际,那就是在生活的一些从属的部门,人们或者掌握看透手段与目的之间关系的清晰洞察力,或者认真地争取掌握这种洞察力,而在他们生活的较高事务中,也就是密切影响他们的祸福的事情上,就看不清这样的东西了。这个对照给了他尽可能强烈的印象,对他的思想的方向有决定性的影响。他看到在所有手艺和行业中,智力的清晰使粗糙的工作和笨拙的工作有一个目的,他期望一旦个人和社会的生活被清晰的洞察力所照亮并由不含混的行为规则所规范时,会出现相似的进展,而行为规则就是有助于达到最高目的的手段系统。

“没有人自愿犯错误”。这句话有双重意义。首先，有一种信念：所有实际发生的无数缺点，来源于理解的不充分发展。第二个信念是第一个信念的基础并成为它的条件，也就是说，它仅仅是行动的手段而不是行动的目的，这一点在人们之间存在分歧。每一个人毫无例外地被设想为希望好的东西。人们彼此间的区别并非在于他们所希望的东西，而简单并唯一地在于他们实现共同努力目标的能力的大小——完全依靠他们知识发展程度上的差异。

我们刚刚获得的解决办法还提出了另一个谜：我们圣人的这个道德乐观主义从何而来呢？他的信念认为每一个道德上的缺陷来自错误决不是来自内心的堕落，其根据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的初步答复是这样的：他认为毫无疑问的真理是：道德上的善和幸福、道德上的恶和不幸福是不可分开地相联结的，只有接近于盲目的错觉才会选择第二个而拒绝第一个。这都是无可怀疑的真理。喜剧诗人埃庇卡摩斯的一行诗句，稍加修改就是在苏格拉底圈子中喜爱的语录——

“没有人自愿是卑鄙的，  
违反他的意愿也不是幸福的。”

在这里翻译为“卑鄙的”(wretched)那个希腊语词具有双重意义，试比较两个词组便能明了：“不幸的生活”(a wretched life)和“邪恶的坏蛋”(a wicked wretch)。这种语言上的含混给予这个乐观主义的信念以自明真理的外观。而其实，它千真万确地并不具有这种自明的真理。特别是有一个词组，它的双重意义尤其有意识地要引起这种幻觉。希腊文“εὐπράττειν”，就像英语的“to do well”一样，是两个意思的共同的表达，一个意思是正确的行动，另一个意思是繁荣昌盛。这样，不仅没有实践经验的思想家被引向错误地

把“做得好”(well-doing)和“生活好”(well-being)等同起来;行动的“善”,是指有利于行动者利益意义上的“好”和指有意推进社会目的的“善”,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往往被抹煞。正如我们说到一个“坏”的性格,同时又说到“坏”的工具,或者“坏”的睡眠,同样地,在希腊语中也不乏谴责性质的形容词,它同样适用于一个不能使用的工具、一个对共同福利起相反作用的意志安排以及任何处于与本身的保存不相容的条件中的事物。因而,有许多段话里,柏拉图似乎考虑到苏格拉底的基本原则,“没有人自愿犯错误”,用简单提到的事实充分证明没有人自愿地选择坏的或有害的东西——这种推理方式完全忽略了我们刚才坚持的区别。

不耐烦的读者也许预料到我们将要说的话。可能有必要对于某些语言使用的误导性引起注意,不可能我们在这里已经接触到问题的根子。并非因为语词的含混或者因为在有联系的概念之间缺乏精细的识别能力,使我们期望有新的、有活力的和丰富的生活哲学出现。如果苏格拉底坚持美德与幸福的同一性,无疑他这样首先和主要地是由于他在他自己的经验中发现它们是同一的,这不是他同胞的语言,而是他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在这里对我们诉说。

2. 斯多亚学派的第二号人物克利安西斯写了一本书《论快乐》。他在书中引用了苏格拉底喜爱的语句:“这个人既公正又快乐。”在语词上几乎与这个引语一致的是以下的几句话,它是亚里士多德为他的学生塞浦路斯的欧德摩斯的早死而写的一首挽歌,但可惜只有它的残存片断保留下来:

“这样,他令人信服地用箴言和行动证明了

快乐和善永远不是两件事，而是一件事，  
单是二者之一就超过人的力量。”

这里说到的那个人就是“单独或普通人中的第一个”宣布上述学说的人——也就是欧德摩斯为他“崇高的友谊”所感动，亦即为虔诚所感动的那个人，当欧德摩斯来到雅典时，建立了一座祭坛，因而建立起对他的英雄崇拜（参照卷 1，第 167 页）。用不偏不倚的态度来看待这件事，这个人不会像古代和现代的一些注释家所说的是指柏拉图（柏拉图在欧德摩斯于公元前 353 年死时还仍然活着），而是指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但是，一个证据在这里或多或少是无足轻重的。把美德与幸福等同是全体苏格拉底学派人士的共同认识，不论这个学说在他们的手中可能经历了种种的修改也是一样。对于这个学说的创立者来说，这个原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或者近乎如此；但在学生们更善于批判的眼光里，清楚地看到加以证明的必要性。而苏格拉底学生中的最伟大的学生柏拉图在其全部著作的最有力的一部著作《国家》中，运用了他智力的全部力量来证明这个论题：“公正的人是公正的，因为他是公正的，就是快乐的。”

在我们继续讨论之前，让我们稍为停一下，谈一谈引导苏格拉底采取这个学说并运用其强大智力的全部力量来宣讲和强调它的动机。这个状况的主要的心理因素无疑如下：苏格拉底有一个理想——一个平静地自我拥有公正、无畏、独立的理想。他感到他是幸福的，因为他一直在实践这个理想。他注视周围世界，他发现其他的人也拥有理想，但仍然是半心半意的、不热情的、分心的、不一贯的；他知道这些原因的后果往往偏离原先进入的道路，有天赋的智力和坚强的性格，由于缺乏可靠的指引，在保证它们的拥有者的

内心和谐和持久的平安方面失败了。成为任意冲动这样的玩物，对于他似乎是一种“被奴役”状况，为一个自由人所不齿。这是在柏拉图的《会饮》中这个类型的最光辉的代表亚西比德对自己所作的责备。这样，至少当他带着心跳和眼中泪水聆听苏格拉底的教导时，他自己觉得在与苏格拉底作比较。那种感情的牺牲者没有任何其他人能使他那样激动，甚至像他的叔父伯里克利那样的优雅的演说家也不能做到。根据色诺芬的说法，那样一种“奴隶般”的性格，苏格拉底是指缺乏“善的、美的、以及公正的”知识的那些人。他们在他们的行动中探索和摇晃，像迷失路途的旅行者，或者笨拙的算术家，对同一个问题一会儿用这个答案，一会儿用另一个答案。苏格拉底痛苦地观察到，在他的甚至最先进的同时代人的性格中，缺少的是内在的一致性和自我的控制力——用一个统一的和不带一切分裂污点的意志来治理整个人类。我们曾把他叫做启蒙的伟大斗士，同时他也是最清楚地看到和最强烈地感觉到那个批判的和启蒙时代的不可避免的缺点。古代信仰已经崩溃；行为的传统标准似乎是外表未被触动，但它们的权威已荡然无存；人们的灵魂充满了不安和令人沮丧的冲突。这种令人心烦意乱的情况（今天我们可以从欧里庇得斯的戏剧中听到它的诉说声）必定在更深刻的本性中唤醒了对于新的生活理论的渴望。这种理论应当对于人类施加同样的不加区分的统治，就像从前宗教曾经做过的那样。苏格拉底就是那样一种理论的创始人。并非因为他的理想在许多要点上与他同胞的传统在实质上不一致。只是在几个要点上（主要是关于城邦的组织方面）他本人对传统进行严格的检验，但是他为更彻底的批判所有传统铺平了道路。他生活中激起同情的地方在于他坚持对灵魂中产生冲突与分裂的所有东西作坚

决斗争。正如克利安西斯在上面引用过的那段话中告诉我们的，他“诅咒最早把正义与有用分开的那种人是不虔诚的”，因而我们可以补充说，他们在人的灵魂中引入了双重的重量和尺度。对于他来说，以下的状况是不能容忍的：人们一会儿应当遵循一个伦理上足够好的理想，可以在高尚和神圣的日子里高谈阔论，一会儿应当遵循一个追逐幸福的理想，浅薄得只能以工作日的心境生活；他们一会儿应当向神的画像下跪，一会儿又要举起双臂礼拜偶像。他不能忍受人们一会儿应该团结起来谴责像马其顿的阿基劳斯那样的作伪证的、双手沾满鲜血的篡位者，一会儿又要无异议地联合一起对同一个人的伟大和昌盛投以羡慕和妒忌的目光。尽管苏格拉底让自己从事的任务是保证充分承认已经存在的生活准则，和在证明是不可争辩的第一原则的基础上接受它是正当的，然而，他仍然打开了一条不能不导向改革那个准则的道路。因为早先承认的命题“美德就是幸福”被颠倒成了“幸福就是美德。”最初主要（如果不是完全）是在建立传统规诫的有效性上形成的幸福论，受批判地详细检查这些规诫整个内容的可靠必要性的指导。为道德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学说的彻底重建的基础已经清理好了。

但是关于这场彻底改革和对于它的那些贡献由于苏格拉底本人之力证明是正确的，这点以后有时间再说。现在我们要做的是追踪苏格拉底的基本原理看一看它的后果。让我们听一听色诺芬在这个主题上说了些什么。有充分证据可以认为是色诺芬本人智力产物的那些谈话之一则是这样说的：“智慧与美德”——真的，开始只提到一种特殊的美德，而后来增加了其它的种类，使他的意见完整——

“他没有区分智慧和美德，但他认为一件事是两者的标



志,一个人应当认识和实践美的和善的东西,他同样应当认识和避免邪恶的(可耻的)和坏的东西。如果进一步问他:对于那些知道什么是他们应当作的,但却做了相反事情的人,他怎样想呢?他是否认为他们是智慧的和有德行的呢?这时他会回答说:“没有比它更愚蠢和更低劣的了。”

换句话说,他肯定在知识和行动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能的,并作出推论:所有道德上的德行是完全和唯一的聪明。把这个定论应用于生活的各个部门时,美德的外形是多种多样的。实际上它们是一个,因为它与洞察力或智慧等同。至于智慧,它能被教导——也许因为教导那样重要的事情不能从头脑中溜走——一旦获得就不会失去。我们在这里把部分取自柏拉图及部分取自色诺芬的材料交织在一起,从而把苏格拉底关于美德的教导的中心构架呈现在读者面前。因为我们能够提供的只是一个中心的构架,而不是完整的结构。苏格拉底怎样详尽地作出补充和润色,发展他的教导使之超出其原初部分,我们永远不可能充分真实和确切地知道。在这里我们要区分两件事——他伦理教导的正面内容和它在逻辑上的正当理由。我们首先从第二点说起。

3. 苏格拉底在我们可以叫做智力全面充足中的信念的心理学基础我们已经知道。它无疑包含在这个事实中,即他充满了太多的自己的理想,以致他看到的从理想偏离只能是认知错误的结果。但是一个理论的心理学上的正当理由是一回事,它逻辑上的正当理由则是另一回事。一个人希望有证据而不希望高谈阔论,一贯努力追求从最受普遍接受和不受怀疑的基础出发,他不可能满足于诉诸他自己的感觉。他寻求尽可能客观的证据,他的任务由于

那个时代思想中的特殊缺点而变得容易得多——思想缺点就是不能分辨,我们称之为个人伦理的东西和我们称之为社会伦理的东西。苏格拉底最初在个人伦理的基础上创立了他自己的伦理体系。每个人都希望他自己过上好生活。如果他的行为与这个目的相矛盾,如没有致力于认为较高的目的,或者由于难以抑制的激情而导致盲目性,这样的矛盾可以归因于缺乏知识,或者如像我们应当加上的,归因于缺乏应用知识的技巧。这个简单的反思似乎一直是苏格拉底理论的出发点,至少就此范围而言,这是以理解可以认识的理由为基础的。

无数的任性行为,对这种行为的执行者有害,并显得是偏离了目标,对这个目标的性质,有清楚认识的任何人都不愿意去责备它,以同样的眼光来看待违反社会道德是容易做到的一步。正是为了这个识别的利益,他寻求证明反社会的行动对于干这种行动的人是有害的。关于这个意义上的论证,在色诺芬的《回忆录》中俯拾即是。友谊应当培养,因为朋友就是最有用的所有物。家庭纠纷要加以避免,因为把自然界为了我们利益给予我们的东西变为对我们自己有害的东西是愚蠢的。应当遵守法律,因为那样的遵守有很大好处;如此等等。我们不能接受某些现代批评家这样的意见,即不仅由于其冗长和详尽的阐述,而且由于其主要思想是非苏格拉底的。宣称所有那样的事情对苏格拉底都毫无价值,就是忽略了在这方面不能不受惩罚地加以忽视的几个区别。更加重要的是,这就是无视从苏格拉底主义的基本趋势产生的后果。感情强烈地渴望拯救人类免于被自我矛盾的意志和被杂乱的意见和错觉所支配而左右摇摆,只能发出这种类型的逻辑证明。所需要的是把“应当是”还原成“是”,在无疑问和无怀疑的人类利益上用

象征性的举止代替无法证明的命令。在所有本地有地位的和有高贵教养的人都感到不需要任何证明的理智审判台前面,许多事情应该证明其正确性是必要的。这些阐述使现代读者产生烦躁的感觉,部分是由于这类原因,同时也由于色诺芬对待平凡琐事的态度,以及他把最明显的思想编写成不寻常长度的习惯。此外,这些告诫给人这样的印象:它们指向遥远的可以得到的利益,却以直接的相当大的努力和牺牲为代价,不适合用以提供促使行动的有效动机。甚至在这样的动机观念中还有某种令人厌恶的东西经常出现在那些被动机打动者的意识中。母亲抚养她生病的孩子带着这样的目的,也是唯一的目的,即把他养大成为她老年时的依靠,这是一个古怪的和令人反感的场面。但是除了供养的动机和曾经提出的动机之外,还有另外一种观点,它对这些研究十分有利,它在知识上有正当理由,是伦理责任的合理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考虑,这些研究在苏格拉底的体系中有其适当的地位,而且它们也并非没有它们自己的真正价值。对准的目标是在理性冷静地仔细检验面前为培养家庭和友好情谊以及其它的无私感情辩护,是用或多或少很好建立起来的学说支持意志的统一;而在社会要求和私人利益要求之间的冲突仅仅是表面上的。通过这个办法,尽管它也许不能为良好的行为创造新的动机,那些已经存在的动机也许会在知识方面得到加强,并能抵御反社会精神的攻击。在这种性质的最早尝试中更大的重点应该放在较粗糙、较明显和较表面的效用,而不是放在较精细的制度的效用,与此同时,后者在运作上是更为间接和更为持久的。

但是从理性的立场来处理伦理问题具有意义更加深刻的其他用途。善或者感情的仁慈不是来自反思。它是内在倾向、教育、环

境的产物。逻辑证明不能号召它出现。但是,假定他们发现它已经存在,他们就能做某些事情来指导它的运作。思想混乱比起无知来是应当克服的更严重敌人,也是苏格拉底的逻辑论证不断与之斗争的敌人。在这场斗争中,追求含义明确的努力,能提供非常有用的帮助。尽管概念的清晰不足以创造新的动机,但它足以阻止或延缓那些好像只在半朦胧状态下迅速生长的某种真菌一般的动机对灵魂的侵入。如果没有朦胧的思想帷幕遮盖他本人也承认应当受到指责的那类行为的执行者的话,那么,有多少伤害共同福利的行动会不出现啊。这段话适用于所谓的商业伦理认为是正当的种种可疑的做法,也适用于种种有损于国家利益的活动,国家的利益后来被有偏见的人认为是一种抽象概念而不是有感觉力人们的集体意识。有人提醒我们关于 J. S. 穆勒的一句有价值的话:“如果智力的谬见变得不可能,那末感觉的谬见由于没有工具可以使用,就将无能为力了。”除了经常在个人头脑中出没的思想混乱之外,使一般心灵处于同样苦境的能列出一份什么样的问题清单啊! 如果苏格拉底能够出现在我们中间,他会多么经常地和胜利地使用辩证的击剑术与公众意见的代表们交锋啊! 试想像一下他用轻蔑嘲弄的微笑迫使立法者承认,他们在同一时间对同一批人既命令他们决斗,又禁止他们决斗! 他会怎样乐于证明:他们对显然相同的事情根据它们出现的社会阶层作出不同的判断! 他会怎样地鞭笞教育制度,它有时是同时地,有时是连续地在我们青年中灌输互相排斥的生活理想! 他将以多么快乐的心境将所有极明显的矛盾置于光天化日之下,当新闻记者与政治家每当说到“政治道德”或“条约神圣”这种事情时,天天卷入于这类矛盾之中! 我们有把握地假设,他致力于促进概念的明确界限,驱散困扰人们心灵的

混乱和矛盾的黑云,是比理论更为重要;事实上,这样做在实践的领域结出丰硕的成果。如果说在苏格拉底之后的古代哲学家中间,出现了一大批以心灵和目的纯正专一著名的人,如果说理想(尽管遭到批评)仍然有最高的价值,并受到犬儒学派、昔勒尼学派,斯多亚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以令人印象深刻的坚持不懈的珍爱,并以可贵的一贯性加以实践,这就是这些结果主要来源的苏格拉底制定的心灵上的戒律。

关于苏格拉底有关道德基础的工作以及与道德基础密切相联的概念的批判性研究,就说这么多。现在我们来谈谈苏格拉底的伦理学的内容。无论如何,在这里我们的研究必须扩大其规模,同时讨论个人行为的规则与社会实践的规则。现在我们必须论述的不单是伦理学,而是伦理学与政治学一起论述。确实,我们要在这两个学科中探究苏格拉底学说的全面精心制作的体系。但是他讨论整个这些问题的精神,可以不含糊地从他的继承者理论中共有的某些特征推导出来,这些特性与我们所知道的他本人教导中少数经过很好检验的细节有尽可能密切的一致。

柏拉图说:“有用的是高尚的,有害的是低贱的,那是并且将永远是最好格言,”这里说到的有用性和有害性与社会有关系,而口述这位诗人哲学家这些话的“冷静的热情”人肯定地被他的老师(智力的使徒)胸中更加强烈的火光映照得通红。他不愿听到对别人有用可是不好的任何好事。“能派用场的拣粪篮子比一个不能使用的金盾更加美丽。”这是色诺芬报导的苏格拉底的格言。那些尖锐语句之一是《回忆录》的作者绝对不能为他自己发明的,而且没有理由怀疑它的真实性。即使如此,在苏格拉底看来,促进人类的福利肯定地是社会和政治实践的最高准则。其次,在他的眼中,

这同一个最高准则也是用以判断行为善和恶的标准。但是无论怎样,他没有作出努力来综合地建立一个基本义务体系。在这里,正如在探究个别人幸福的性质时一样,他没有足够的抱负来进行对基础的终极分析或者树立起正面教条的上层建筑。他也没有试图划出个人和社会个别领域的界限。他把这一切留给他的后继者了。

功利主义伦理学,或者我们宁愿叫它为因果关系伦理学,可以有把握地归之于苏格拉底。有用或者合宜是他考虑政治、社会和伦理问题时的引导之星,他可以被称为知识激进主义的创始人。这个主义一方面作为批判的手段和反对现存制度中无价值东西的进攻武器是极其珍贵的;但是另一方面,当它坚持立即和使用暴力来实现它的要求时,有时可能是危险的和灾难性的。毕竟在任何特殊场合,在后一种情况下这些要求只不过是容易犯错误的人类心灵的宣告而已。理性高于权威,功利高于传统或盲目情绪——这些就是苏格拉底准备的、但只有部分实施的战斗中的战斗呼声。他本人在相当程度上受他同胞的传统情绪的支配。他力求赢得承认的基本原则是开明理性的至高地位。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辨明有光明也有阴影。毫无疑问,承认这个原则旨在放松许多责任和感情的束缚。有人强烈要求谴责它(而且不无道理):它挑动孩子们反叛他们双亲的“不合理的”意愿,它推荐年轻人尊敬智慧而不是年龄,对现存政治制度的尊重只会被犀利的批评极大地削弱,他主张对政治制度进行批评。

特别是用抽签来任命官员,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他不倦地嘲骂这个办法。因此,他为未来而努力工作,在未来,特别的或专门的知识对于他和他的追随者说来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

西,它注定要在未来的国家管理中比他那个时候的雅典发挥更大的作用。由于所有这一切,对他的批评的支持并非是无保留的。最重要的官职在当时和在任何时候都不是用抽签来任用的。对于这个制度的无疑的缺点,我们可以提出某些为缺点作缓冲的条件和某些正面的优点。在第一元首之下可以设置由个人担任的短任期官职,大量的官员构成每个独立的机构,担心暴露使没有能力的人不敢参加导致担任更重要官职(如工作辛苦的500人会议的成员)的抽签。更加重要的是必须看到由此带来的政治教育的扩散以及公众精神的增强,最后和首要的是,一个小小城邦的党派分立(危险在于情况确实如此),如果胜利的政党由于其多数而占据每一个行政机构的官职成了习惯,从而在胜利者和被击败者之间的对比上加剧到致命的程度,情况本来会是更加灾难性的。但事实是,这种对比因为给予暂时少数派在公共事务上合作的特权而大大缓和。另一方面,当苏格拉底抨击反对自由劳动的偏见(那在每一个奴隶制城邦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时,他与现代思想感情完全一致;当他,一个人民的儿子由于他不蔑视所有“赚钱糊口”的行业,表现出他自己比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更加激进。他主张,女性能够获得比她的大多数同胞所想的更大的发展,这点与他认为许多事情加以教导能够教会的高度评价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柏拉图、色诺芬和安提西尼的说法一致,他们都反对性别上精神天赋有质的差异,如果它不是出自一个共同的来源,那么它至少是一个奇怪的碰巧的反常现象了。

但是我们不要让自己迷失在细节中。主要点在于强调地肯定批判的权利,即用由经验和推理深思查明适合于推进人类福利的单一标准来批判所有的权威和所有的传统,批判所有制度、法令和

戒律的衡量标准。这个标准应用于人类,换言之,应用于人类不可靠的双手,往往导致错误;然而,两千年来的所有哲学家都未能给我们提供较好的标准。功利主义、它的优点使它不能为人们完全理解的误解、可能对它提出的真正的或表面的反对——所有这些问题将在本书以后部分得到重视,那时我们将论述苏格拉底的继承者对这些问题更明确形式的基本学说。那时将有必要解开幸福主义、快乐主义和功利主义理论与从属于它们的各种分支理论之间的混乱的纠缠。就目前来说,单纯的观察就够了。完全可能彻底地反对把个人幸福主义作为道德的基础。而与此同时,坚定地主张社会的功利是伦理学和政治学的最高标准。也有可能甚至抛弃这个立场——虽然在我们这方面,尽管已经对它提出了吹毛求疵的反对意见,但是我们知道没有它的适当的代替者——然而还是保留这个方法,按照这个方法,每个机构、每个戒律、每个行动规则都被看作是实现清楚地懂得的目的的手段,并检验它迄今的合适性。谁坚持这个方法,他就马上立足于苏格拉底的理论基础上并处于理性研究的界限之内。可以说,不论在什么地方,有两三人聚在一起用理性的光辉来讨论人类关心的事务,他们中间就有苏格拉底。

4. 苏格拉底不是直接地而是通过他有知识的孩子们、孙子们以及更加遥远的后代的中介,对广泛的人群对久远的年代施展影响,这个影响在每一阶段都接纳旁系来源的添加物。这点非常不同于一位遥远的东方人,一位几乎与苏格拉底同时的性质上相似的人——孔子(死于公元前 478 年)。孔子受到“中央王国”以及邻近地区居民们的尊敬,把他看作是他们宗教的创始人,而他的被当



作教规似的著作提供了许多与苏格拉底的谈话相似的论点。我们在《礼记》第三十九卷<sup>①</sup>中读到，“致知”就是研究事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孔子就是这样说的。关于这段话，一位有高度权威的评论家格奥尔格·冯·德·加贝伦茨作如下表述：“我们知道，在他可以被期望探讨良心的地方，他就谈论知识及其完善。似乎他把道德看作是智力的事情，是某种可以教导的东西。”作为后者的基础，孔子从行为者的幸福出发，为伦理上的义务作逻辑推理。结果是，事实上他没有逃脱陷于幸福主义的指责。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建造起来的上层建筑是一种没有夸张成唐·吉诃德风格的利他主义。“彼此相爱”、“以善报善，以德报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就是他告诫的一些要旨。幸福主义为伦理学提供了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在伦理学的稳健中补充它提高所缺乏的东西。例如，在公元9世纪时一份中国官报中，我们读到以下的句子：“向陛下报喜，我听说那个自己根除了恶习，得到与他的工作相称的长处，而给别人增添快乐的人，他自己也享受幸福。这些从来就是先王的为政之道。”这里说的幸福是指在世上能享受的东西，因为对于儒家学派的中国道德哲学家们来说，完全没有身后的报答和惩罚的观点。在这个方面以及在对待不死问题上的不明确态度，都与苏格拉底密切相似。苏格拉底在柏拉图的《申辩》中承认他对于死的性质的完全不明确。虔诚的色诺芬在这里再次无疑地受到老师的影响，他借垂死英雄居鲁士之口说出各种形式的不死

---

<sup>①</sup> 原文如此。按以下引文系出自《礼记》卷60《大学》篇。原作者所说“《礼记》第三十九卷”是不准确的。——译者。

证据,然而,这些证据只能导致停止灵魂继续存在的议论罢了。

这种怀疑主义决不限于苏格拉底。迄今还保存着纪念那些在波提狄亚阵亡者的铭文的残片。如果也曾参加那个战役的苏格拉底看到这块铭文的话,他会读到这么一句话:“于是他的肉体入土,他的灵魂由以太接收。”人们几乎可以把这句话称为对个人不死的正式反驳。因为对秘教和奥尔菲士教的信仰在那个时代没有在广大民众中牢固建立,还需要与反对宗教信仰作长期斗争。苏格拉底的朋友欧里庇得斯和在他之前具有哲学气质的喜剧作家埃庇卡摩斯都相信,随着肉人土灵魂回归以太。令人怀疑的是灵魂的个人永生而不是灵魂在意识上的永生;因为以太或者天上的实体被看作是世上灵魂的载体,相等于至高神。如果在这一个事例中,欧里庇得斯坚定地持有确定的信念,而不是允许这个说法在整体上压倒相反意见,那么欧里庇得斯就不是欧里庇得斯了。与泛神论的信仰比较,他的戏剧显示出对灵魂归宿的完全不确定性;的确,希望在于坚持意识的最终熄灭。这种类型的踌躇连同对灵魂信仰的逐步削弱,在5世纪后半叶似乎是流行声调。甚至在毫无疑问地承认个人永生的一部分人中,也不承认死者的尊贵或神圣,任何地方更没人信心十足地认为死者还参与世间的事务。这种思想趋势的文学证据由纪念碑作有教育意义的补充。最古老的雅典墓葬群(大约早在公元前700年)从陪葬死者的礼物之丰富和华美以及纪念性祭品的安排,证明了对灵魂信仰的力量以及灵魂拥有的高度荣誉。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注意到这些感觉的逐渐消失。爱的献礼并没有停止,但是在纪念碑艺术上最完善的时候,它们以几乎技术上的一致性而著名。在4世纪末,所有富丽的装饰完全消失;由法莱雷奥斯的德米特里实施的葬礼费用限制得到立即遵守,

即使在这个限制停止实施时也是如此。这个变化的根源可能(并非不公正地)在于对灵魂的信仰的衰落以及人民的穷困。

5. 还有一些信仰的其它问题,苏格拉底对它们采取了中间立场。他既不是无神论者也不是正统派的支柱。至少,有许多地方似乎可以肯定,尽管在一些特殊细节上有重大疑问。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和死的记载证明了他深厚的宗教感情。他把自己看作是献身于对神的礼拜和受神的庇护。但是他神学信仰的确切性质则不能肯定地加以陈述。要说神话中的神是他个人崇拜的对象是先验地不可能的。如果说他的立场简单地是流行宗教的立场,那么用以反对他的控告就很难采取它所采取的形式,或者他的控告者不会成功地赢得了几百个雅典的陪审员的支持。在相似性质的其它审判中,如对狄亚哥拉、安那克萨哥拉和普罗塔哥拉的那些审判,对被告的证据是由他们自己的著作提供的。不像在这个案例中,肯定的证据被摒弃,作为证据的仅仅是道听途说。还可以看到,在柏拉图的《申辩》中对于控告的这部分答辩特别软弱无力。事实上,答辩使用种种辩论上的权宜之计来掩盖回答要点的不可能性。控告者被盘问弄得不知所措,被惊愕得把他的论点推到远离它的原有范围,从而为攻击提供轻易的可乘之机,答辩的其余部分是由无结论性的语言和逻辑的技巧构成的。我们也必须考虑:流行神话的立场是一种在哲学圈子内长期被看作站不住脚的立场,更重要的是这种意见分歧后来成为所有不同的苏格拉底学派的一个特征,尽管它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出现。这样说也不是没有意义的事实,那就是柏拉图叙述他向个别神祇祈祷或者以别的方式予以承认,或者说他以相当大的精力维护它的存在,这些神祇在一方面

指的就是阿波罗,这位特尔斐圣殿的主神,圣殿中崇高的智慧和先进的伦理文化都占有一席之地,在另一方面指的是太阳和月亮,也就是自然界的那些部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后来也继续把它们看作是神圣的实体。

苏格拉底所要求于神或神祇的,简单地说就是“善”。在这方面和在任何个别情况下,他认为神比人认识得更真实。向神要求确定的好处或求神帮助以保证达到确定的目的,对于他来说似乎是不适当的,就像我们预先期望到的那样,这对于一位伦理哲学家来说当然是这样,他愿意看到人们坚定地在他自己的基地上种植,亦即依靠他的知识所决定的力量,尽可能地独立于外界的事物。因此,他把祭神仪式看得很轻,嘱咐人们祭奠神不要铺张和过分讲究,要用“根据国家法律规定的”简单方式,要与特尔斐的神谕所宣告的相一致。在柏拉图的《欧惕弗罗篇》中,苏格拉底被描述为把他全部积累的轻蔑发泄到所有由德行产生的神圣事物上和所有教派的狂热上,并得出足够清楚地表达的结论,即虔诚应是一种伴随公正行动的性格——这个结论如今有人识别是柏拉图在别的地方作出的——而不是包括一组特别义务的独立美德。一个纯粹的心灵比丰富的献祭更加使神喜欢,这是色诺芬记叙苏格拉底的一个宣告,在这个问题上色诺芬与他老师的立场相去甚远。

苏格拉底对待占卜术的态度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本人对这些技术有强烈信任的色诺芬报导说,苏格拉底谴责人们去往神和神的符号解释者那里商量他们本人有能力知道和执行的事情。

这种敌意的一个例外是对待特尔斐的神谕,这个神坛已经以它墙上的铭文“认识你自己”赢得了苏格拉底的同情,这句话后来成了他所喜爱的格言之一。像他的同时代人中的压倒多数一样,

他在梦中看到过神显灵的多种情况。但是关于著名的 δαιμόνων,也就是关于神灵的那个声音,它在他的生活中起了不小的重要性作用,对此我们应说什么呢?我们能相信色诺芬说的,苏格拉底自称,依靠这个声音的力量,使他成为非常特殊性质的预言天才。使他预见未来,并利用他的预见力来嘱咐他的朋友做这件事或者不要做那件事;因此那听从他劝告的人得到好处,而拒绝他劝告的人会受到伤害。柏拉图的证言完全是另一种意思。苏格拉底不知道任何预言、没有任何对他发出的正面命令或任何由他向他的朋友们发出的忠告。对他来说,这种现象是一种更加特殊类型和更加有限范围的现象。从他早年以来,它经常在苏格拉底面前发生,既发生在重要的场合也发生在无足轻重的场合,使他在即将作某事时受到来自内心的强迫作用而克制不做,这种内心强迫作用他有时称为“一个声音”(在另外时候他简单地称它为“习惯的信号”)这一点他归之于神或灵,因为他不能解释这个现象,也由于服从它而得到的好处。这两种记述的分歧是有高度启发性的,有意启发我们对色诺芬的证言抱有深度的怀疑,他本来喜欢使苏格拉底成为一种预言者或奇迹制造者。他就是这样做的,他也许不是介绍他自己彻头彻尾捏造的谎言,而是用增加和省略的办法混淆事情的真相,这样就产生出一幅图画,正好与造成欺骗效果的现实一样。但是我们认为精灵(δαιμόνων)是什么呢?我们既不能把它列入名符其实的预兆,并把它与荣格-斯提林(Jung - stilling)的不断与神交往的经验相比较(每一步得到预期实现的证实);我们也不能同意不同的古代作者把它看作仅仅是良心的声音。每当他感到有积极参与政治的意向时,精灵(δαιμόνων)阻止他的陈述可以看作表明他在这里是受一种本能所引导,是受一种来自精神生活的下意识

潜流对自己能力的模糊而真实的估计所引导。也许一个相似的说法是可靠的,在那件事情上内在的声音阻止他依从某些学生的愿望,重新开始先前中断的熟悉的对话。在另外的场合,苏格拉底的这种独特状况,被柏拉图以半开玩笑的方式加以应用,为没有什么重要性的行动提供动机,仅仅是在对话结构中增加一点戏剧效果而已。如果把苏格拉底描写成正要离开他所处的地位或者正要中断对话,而仅仅由于他熟悉精灵的一个信号就被留住,这个谈话会使读者感到兴趣。无意识深处出现的警告是否采取听觉的实际幻觉形式,或者如我们全都经历过的微不足道的感情受抑制感觉是否也被苏格拉底当作神显灵的事例,因而精灵(δαίμονιον)成了不只是一种心理过程的共同名称——对于像这样一些问题,迫使我们回到了猜测,我们甚至难以构想出带有一定可能性的猜测。我们面对仍需考虑的高度重要的问题(即苏格拉底承认的至高神的本性问题),几乎是束手无策。认为他的立场应当是对传统的天真的接受,是我们肯定地有权利加以忽视的可能性。实际上,放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苏格拉底的至高神像色诺芬的至高神一样,也许是弥漫于宇宙的起激励作用的心灵或灵魂。或者可能是这样,他把神当作至高无上的力量,也许不是创世主,但无论如何是根据他自己的目标来命令和塑造世界的力量。换句话说,苏格拉底对于神的概念或者是一个泛神论的理想化概念,或者是自然神论的—目的论的概念。但是仅仅陈述这些供选择的两种理解,我们似乎听到读者的叫嚷,要求在两者之间作出决定,只有其中的第二种对神的设想似乎才适合于我们圣者冷静的思想和功利主义倾向的特征。无疑,在这种观点中有许多貌似有理的地方。但我们不承认它是将被立即和最终采用的观点。近在咫尺的一个事例

会弄清楚潜伏在这样推论中的危险。假如苏格拉底对他的精神告戒者的信仰我们只由模糊的传闻中得知,那么我们有多大信心可以不反对这个故事!既然所有这类神秘主义对于那个常识化身者的本性是格格不入的。伟大的人物在他们的本性中联合着非常不同的甚至是最相互矛盾的性格因素;的确,就是在这样的联合中形成他们的伟大。如果我们单从已向我们揭示的部分着手构思一个人物的未知部分,我们很可能把由此制成的图像画得比真实图像更加协调,同时也更加单调和平淡。在苏格拉底的学派内部,神在头脑中的映像有许多不同的形式。麦加拉学派的创始人欧克莱得斯推崇埃利亚派的“真正唯一”;犬儒学派领导人安提西尼宣扬单一神的最高权威,看来他更重视人格的属性。

如果问到两个学生谁更紧密地追随老师,这个问题很难肯定地回答。亚里士多德沉默少语;柏拉图没有报导任何东西,但是追求自己的由理念论为他标出的道路;留下的是我们证据中最少价值的人——色诺芬。这位作家把《回忆录》中出现频繁讨论的两节用于讨论神学问题,关于神学问题他用目的论和几乎完全是人类中心论的观念来回答。根据这个证据,苏格拉底完全从人类功利的观点来看待敬神的活动。两篇对话(即与阿里斯多德莫斯和欧西德莫斯的谈话)中处处提到包含在动物特别是人体结构的设计证据,并以对人类福利有助益的方式提到自然的一般秩序;所有这些影射的目的在于把怀疑者和不相信者转变为皈依者,办法是让他们牢牢记住神灵保佑的事实。对这些章节真实性提出的反对意见,证明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它们的内容是不是苏格拉底的或者是色诺芬本人的智力财富,仍然是一个争论的问题。肯定地说它们具有高度的首创性。我们已经在希罗多德(第1卷第267

页)那里看到过性质上相似的表达;而且设计问题也是安那克萨哥拉和阿波罗尼亚的第欧根尼花时间讨论的问题。但是,我们可能附带谈到过的这些思想家,他们采取对这个问题过分宽泛的观点,以致不能把整个动物王国看作是为人类服务而被创造的。在这些章节中有几处细节使我们想起,在这里向我们说话的声音是作过许多旅行、有多种经历和对世界有实际知识的色诺芬的声音而不是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的声音。也许可以把主要思想,即神性或“宇宙理性”的有目的运行归之于后者;然而对主要思想的发挥很难会是他的。

关于色诺芬用以解释苏格拉底为什么不打算继续在他之前的自然哲学家们的思索与推断的部分论点,我们给以相似的定论,大概是不会错的。的确,我们不会不愿意相信在他心头思考过的旧制度不可救药的不一致,证明他们讨论的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参照第一卷第494页)。一个人否定所有的东西都是静止的,另一个否定所有的东西都是运动的;一个人假设单一的宇宙物质,另一个假设物质无限多。对他的思想来说,这样显然矛盾理论的竞争,只能证明他们共同努力的无望。他们相互毁灭的断言(所有理论都有同等信心的支持)在他看来像是心智不完全正常者的言论——所有这些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不容易相信,在形成对于自然哲学家的判断中,像苏格拉底这样的有首创性的思想家却与普通的雅典寻常人站在同一水平上;在那些勤奋的先驱者的辛苦劳作中,他只看到夸张的假设和不恰当地干扰神独占的领域。如果这就是苏格拉底的思想方式的话,那么公众舆论就不至于错认他有无宗教信仰的“天堂探索者”和启蒙时代其他代表人物那样的致命的意图了。



## 第五章 苏格拉底的结局

1. 当长期以来威胁他的风暴在他头上爆发时,苏格拉底正接近老年晚期的门槛。在他的同胞公民的胸中长期积累起来的深深的恶意和愠怒的不信任,现在找到了一个宣泄口,这导致了一起最大的悲剧性事件,这一事件使得人类文明的编年史变得黑暗了。正确地判断这场在一个高贵民族与它的最高尚的儿子之一之间的冲突,是一项极端精细的任务。我们将尽最大努力尽量让事实本身平实讲话,并以最严格的公正性来掂量证据的分量。

一般雅典人对于每一种启蒙者的厌恶,称他们为“诡辩者”、“天堂探索者”,这点读者是很熟悉的。苏格拉底不仅被混同于这些类型的代表人物里,还被当作他们中的最高样板。我们从喜剧诗人的证词中得知这一点。就是说这些喜剧诗人最了解公众舆论如何,又对公众舆论有最大的影响力。我们已经引用过他们的一些轻蔑和恶意的说法;我们并不想详尽无遗地列举它们。但是我们可以提醒读者,就是在《奉承者》中把所谓诡辩者们加以漫画化的那个欧波利斯也没有饶过苏格拉底,而是把他与普罗泰戈拉完全放在一个水平上。两人都遭到了嘲笑,因为他们花时间反复思考最高的主题,但却堕落到采用最卑劣的权宜之计,以满足他们的日常需要。当普罗泰戈拉被最恶毒地说成是探索天体并从垃圾洞中寻找食物时,苏格拉底被描写为一个偷汤勺的客人。这也不是

少数个别喜剧作家方面心怀恶意的事例。保存下来的(大都是偶然保存下来的)有关句段的数目和花样太多,毋须再作这样的假设。除欧波利斯外,我们还得提到泰莱克利德、阿米普西亚和阿里斯托芬。对于其中的第一位,苏格拉底是令人憎恶的。因为他要对那些以多种方式伤害群众感情的戏剧负责——欧里庇德斯的戏剧,这位诗人在他家中高声朗读普罗泰戈拉论神的书。阿米普西亚说他是“少数人中的最好的,但是多数人中的最笨的;他学习每一件事,但没有学会得到一件新外套的本领”。在这同一出以苏格拉底音乐教师的名字命名的喜剧《孔努斯》中,合唱队是由“思想家”和“沉思者”组成的。我们注意到同时代的阿里斯托芬的《云》(首演于公元前423年),这部恶毒的讽刺作品中的主人公不像后来在《鸟》(公元前414年)和《蛙》(公元前405年)中的主人公那样,他仅仅是个粗鲁的令人讨厌的家伙,与他交往败坏了欧里庇德斯的艺术。那座“思想工场”简直是一处懒散冥想的场所、自由思想的异端之家,是训练青年无责任心和各种粗鄙的撒谎和诈骗技艺的地方。鉴于所有这种堆积起来的恶意,我们会很奇怪,在长达1/4世纪的时间内,苏格拉底继续毫无干扰地生活和工作在一个思想和言论自由不是公认原则的城市中。理由很明显,继承下来的不容忍倾向,在现行法律中成为现成的武器,这种倾向实际上被成为伯里克利时代特色的生活和思想习惯所抵销。我们猜测:一定有某种不寻常环境或经历煽动已经郁积如此之久的火星发出猛烈的火焰。对于那样的环境,我们没有作深层次的找寻。

伯罗奔尼撒战争已经过去,雅典衰落得很厉害。在外部敌人面前的羞辱加上痛苦内战造成的软弱。在内战中雅典平民胜利地出现了(公元前403年)。但是城邦的基础已经动摇;抚今昔思以

不可抗拒的力量使每个人看清形势，并使每个人的心中充满悲伤和哀悼。人们不得不探索周围寻求这个致命改变的更深层的原因，并努力从对他们不幸的沉思中争取学到某些有用的教训。

我们想像我们可以听到某个上年岁的雅典人发牢骚的声音，他在市场上不期而遇一位外邦的朋友。他说：“啊，你在这空荡荡的大街从这荒凉的海港几乎认不出雅典了吧。这一点也不奇怪。我们被打败了，丧失了我们的海军和殖民地，而战争赔款使得我们成了穷人，不但物质贫穷连希望也黯淡了。如果你希望看到兴高采烈的面孔，那么就到斯巴达去吧。但是你会发现我们骄傲的征服者卑微地俯伏在命运之神和它的神圣旨意之前。在那里，宙斯并没有被废黜，在那里宙斯并没有让路给‘旋涡国王’<sup>①</sup>我们神圣的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人对此谈论得很多。如果那种无赖之徒来到他们中间的话，斯巴达人会很快实施他们的“驱逐不受欢迎的外国人的法案”。看看我们，看看差距。我们的年轻人像你能够想象的那样大胆；所有宗教上的恐惧在很久以前就消失了。这全是新派浮华的哲学教师们的过错。真的，在一代人以前安那克萨哥拉就受到不虔敬的谴责，并被驱逐出国；普罗泰戈拉也是一样。但是他们中最坏的仍然留在国内：苏格拉底继续以老样子生活，就好像阿里斯托芬（他是正确一类人中的一个）在20年前没有揭露过他一样。现在这个人是多么地自负啊！有一天，阿基劳斯国王请他与所有我们的最好诗人一起进宫，他以他一贯的谦虚（我称之为傲慢）谢绝了这个荣誉。后来从麦加拉、埃利斯、底比斯以及远在昔勒尼等地的年轻外邦人都来到他那里，想从他的教导中获益。是

---

<sup>①</sup> 指一些自然哲学家以大气旋涡解释宇宙生成的理论。——译者

的,教导;因为尽管他讨厌被称为教师或智者,但是这个差别对于我们的贫乏的理解力来说是太细微了。他坐在肮脏的小屋中,他的学生们围绕着他,他读着黄色的书卷,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向他们解释诗人们和智者们的著作。他主要是靠富有的‘朋友们’或‘伙伴们’的馈赠生活,至于他夸大地说他不知道贫富的差别,一律同样对待——我说全是胡说八道。其他的智者们只有在他们收到丰厚报酬后才分发他们有危害的思想;他无偿地广泛地散布它。他对神做的事情没有比《云》上演时他在引起我们意见分裂的愚蠢问题上浪费时间与脑力更坏的了。如果只要他能坚持计算跳蚤在哈雷丰的眉毛与他自己的秃顶之间的跳跃的长度,那就没有什么大关系。但是他曾教育年轻人殴打和捆绑他们的“不讲理的”父亲。他动摇了他们对神的信仰。只要与色雷斯女人的儿子、私生子安提西尼谈话,或者和昔勒尼的亚里斯提卜谈话,他们会很快告诉你:他们认为保护我们城邦的女神雅典娜,仅仅是一个名字,一个空洞的幻影。这些学生中有些根本不相信神,另外的人中只相信一个神。谁知道究竟是不是我们提出了如此邪恶的思想,使得我们的保护女神发怒,引起所有我们的灾难呢?

“你不认为仅仅是一个谈话者有可能造成所有这些伤害吗?一切都简单之至。他的分析入微的深奥之处吸引了我们青年中所有的最有头脑的人,那就像吕底亚石<sup>①</sup>吸引铁屑一样肯定。他使这些人反对宗教并成为他们国家的敌人。我夸张了,是吗?那么,不要听我说,听听事实怎么说吧。在战争的所有那些年份中,有什么不幸比疯狂地企图攻下叙拉古、占领西西里更大的呢?谁对那个极端

---

<sup>①</sup> 古希腊人把在吕底亚首先发现的磁铁石称为“吕底亚石”。——译者

疯狂的行为负责呢？在这场疯狂行为中丧失了我们数以千计的最好公民。‘克莱尼亚斯的漂亮的儿子’（这是苏格拉底对他的美称）<sup>①</sup>唆使人民不听我们聪明而虔诚的尼西亚斯<sup>②</sup>的所有警告；是的，这位受宠的学生亚西比德也参与了不虔诚的毁坏赫尔墨斯神柱<sup>③</sup>和侮辱秘密宗教仪式的活动，他最终投奔了斯巴达，并且从那里搞阴谋反对他自己的国家。而这些还不是全部。正如亚西比德毁灭了我们的海上力量，克里底亚摧毁了我们内部和平。的确，他是有才能的，但是他怎样使用才能呢？在他的未能获准上演然而大量被传抄的悲剧《西苏福斯》中，他把对神的信仰叫做古时候聪明人的发明。他的生活也表明是与他的教导一致的。当在国内时，他是人民的最坏的敌人。被放逐中，他鼓动塞萨利农民反叛他们的主人。在他返回之后，他和他的同伙在这个城市中制造了怎样的浩劫啊！那么我再一次要问，克里底亚和他的同伙从哪里得到他们美妙的行为准则呢？他们全都是苏格拉底的‘伙伴’。好啦，让他在平安中安息吧。

---

① 亚西比德的父亲名叫克莱尼亚斯，阿尔克比亚德是远征叙拉古的鼓吹者和舰队司令。这个远征以彻底失败而告终。阿尔克比亚德投奔敌人斯巴达，反过来反对雅典。在随后的岁月中，他与雅典和斯巴达的关系时有反复，最后于公元前404年，在雅典与斯巴达双方的影响下，他在其寻求避难的地方腓立基被谋杀。——译者

② 尼西亚斯(Nicias, 公元前约470—413)，雅典政治家和军事领导人，伯里克利逝世后，他多次当选，历任要职，他主张温和路线，以达成公元前423年与斯巴达人的休战及公元前421年签署的所谓“尼克亚和平”条约而著名。尽管他反对阿尔克比亚德的野心勃勃的征服西西里的计划，但他仍被任命为与亚西比德一起（还有拉马库斯）统率这支远征军。结果于公元前413年战败被杀。——译者

③ 这是发生在公元前415年远征西西里前夕的一件事。赫尔梅斯是旅行者的保护神。饰以赫尔墨斯头像或胸像的石柱，被用来指示道路和标明边界。一天早晨，雅典人发现雅典城周围的赫尔梅斯神柱都被弄乱了。这被看作是反对当时极端民主派的统治者的表现。后来亚西比德也被怀疑参与了 this 阴谋，雅典公民大会决定召回正在前往西西里途中的亚西比德回到雅典接受审判，这是促使他背叛雅典投奔斯巴达的一个直接的原因。——译者

他和他的表兄弟哈尔米德两人都在反对人民的战斗中丧生。对他谈这些就够了。但是让我们不要忘记他的伟大的外甥柏拉图,这位智者的另一个爱徒,他只是发表演说来贬低我们历史悠久的光荣的宪法以及人民的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只是有一天我听到他以令人注意的情绪发表讲演,他说直到哲学家成为统治者或统治者成为哲学家,事情才会变好起来。也许某一天他也会到国外去寻求他的理想,正如他的同时代人、骑士格里鲁斯(Grylus)的儿子<sup>①</sup>不久前所作的那样。你听说过色诺芬不为他自己的国家服务而宁愿去亚洲,到覬觐王位者居鲁士那里去吗?那个居鲁士极大地帮助我们的敌人斯巴达人。你设想是谁鼓励他去向特尔斐神谕所求教,取得神的允许去到我们国家的敌人那里呢?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是他的亲密的朋友,那位白头发年老的自作聪明的、生着西稜努<sup>②</sup>脸庞和带着永远讽刺微笑的人。该是把辐条插入他的车轱辘的时候了。你认为我们会让这个老煤渣把自己烧掉;它不会再点燃年轻人头脑中的篝火吗?也许不。但是想一想这个例子。当所有青年看到他们的首领不受干扰地从事他的工作到底,并在平静和荣誉中结束他的人生时,会使他们去做什么呢?如果阿雷奥帕古斯<sup>③</sup>未曾失去它的古老的权力的话,事情会简单得多;它就会公正而坦率地命令他别管青年的事情。但是现在没有做到这一点,而让苏格拉底而对审判员。我们的最好的人中的一位安尼托曾是富有的制造商,

---

① 格里鲁斯是色诺芬的父亲的名字。——译者

② 西稜努是希腊神话中森林里的小神,以相貌丑陋为特点;有时与希腊神话中的森林神或半神,有着马耳和马尾的萨蒂尔(Satyr)相同。——译者

③ 阿雷奥帕古斯是雅典卫城西北的一座小山岗(原意为“战神山”)是雅典的政权机关以及“五百人大会”所在地。此处意指行政当局或法庭。——译者

但把他的财产中的最好部分献给了他的国家事业，他实际上接受了这件事情，并打算提出对他的诉讼。一旦让这场控告出现在执政官的法庭上，我们将会很快看到这个老人追随安那克萨哥拉和普罗泰戈拉的榜样，离开他不断骂人的悍妻克珊梯珀不会使他流许多眼泪；他将自行离开，到科林斯、底比斯或者也许在麦加拉度其余生。人们说在上述各地他都有许多热心的朋友。但是，让他去他爱去的地方吧。安尼托将表现出像他与色拉西布洛斯一起反对贵族斗争时那样的不倦的精力，他在看到事情彻底解决之前是不会休息的。人们说他已经确定了两位好助手，即演说家吕康和诗人梅勒托。梅勒托从这件事里很可能得到比他写关于俄狄浦斯的三部曲更多的荣誉。云与不可比拟的索福克勒斯甚至与欧里庇德斯作比较他心里能想什么呢？与他们相比除了梳得平整的头发垂在他的面颊上之外，几乎没有共同之点。他的鹰钩鼻子，他浓密短硬的下颏胡子，他瘦削的身于——啊，我在这里站着讲话，元老院房上的旗帜已经随风飘扬。如果我想要我的日工资，我必须出发去找我在会议中的位子。<sup>①</sup>苏格拉底在他的其它罪行上面，不会再犯使我失去德拉克马<sup>②</sup>的错误。”

事情并未完全符合我们可尊敬的评议员的预料。的确，柏拉图在《美诺》中描绘为智者的凶恶仇视者的安尼托，在他自己的热情引导下和得到他的支持者的支持下，及时提出一份起诉书。它是这样写的：“苏格拉底有罪，因为他不承认城邦承认的神，而引入

---

① 从伯里克利时代起，在雅典，为了鼓励人民，特别是穷人参加政府的管理工作，建立了发给参加公务者（比如出席五百人大会之类）的生活津贴的制度，即这里说的日工资。——译者

② 德拉克马为古希腊货币单位的名称。——译者

其他的新的神祇；他还有进一步的罪，因为他腐蚀青年。要求处以死刑。”对被告没有发出逮捕令，但他却服从传唤出庭，使他的朋友和敌人双方的预料都落了空。

2. 公元前 399 年一个晴朗的春天早晨，露珠像往日一样光彩夺目地闪烁在银莲花的花萼上，紫罗兰散发着它们的惯常的香味。但是那天的太阳在一桩不神圣的行为完成之前没有升到它的顶点。那天不是法定日历上的节假日。大批雅典人（绝大部分是上年纪的和只有微薄收入的人），那天早上起得很早，他们希望充当陪审员。他们有资格担任这个职务，由于他们有 30 多岁的年纪，没有污点的纪录和作了陪审员的宣誓。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任务等待着他们。他们手持他们的陪审员用的简板走往市场里进行抽签的办事处。在那里他们被分配去往不同的法庭，在天大亮之前，各自奔向自己的目的地，每个人都带着一个棍棒，寻找门楣上涂有与棍棒相同颜色的进口门，到达那里，他们用棍棒交换一个筹码。在这一天的活动结束时，他们每人凭它有权得到 3 个“奥波尔”（合 4.5 便士）的服务费。

这些 501 名的陪审员抽了决定性的签。当侧门在他们后面关上时，他们被告知：他们确实要审理梅勒托（因为起诉是以他的名字提出的）和苏格拉底的案子。由于起诉的是一件关于不虔敬的案子，一位每年由抽签选出的“国王执政官”已经办理了预审，现在由他主持这场审判<sup>①</sup>。陪审员们坐在盖有草垫的长条凳上；原告

---

<sup>①</sup> 在古代雅典，从纪元前 8 世纪至 4 世纪，逐步形成一套由若干名最高国务官员领导国家的制度，他们叫做执政官，各有不同分工，其中之一称为“国王”（Basileus）。这可能是沿袭旧有的称呼，但其职权范围主要是主管宗教事务，以及涉及宗教虔诚的案件，这些案件由他在开庭前进行准备工作，并在开庭审判时由他担任主席。——译者



人和被告人在 2 个毗邻的讲台上面对着他们。在横木栅栏之外站着许多听众。在那里可以看到：宽大前额的柏拉图（那时他还是一个 28 岁的年轻人）、柏拉图的兄弟阿季曼图、面容憔悴的克里托布鲁和他的父亲克里托、带着严厉有穿透力目光的阿波罗多罗斯与他的兄弟艾安托多洛。文雅和时髦的亚里斯提卜几乎是不会缺席的。当然到场的还有更加强壮的彼奥提亚的人物西米亚斯、凯韦斯和费宗扎斯，还有卷曲头发的年轻漂亮的菲多和安提斯塞内，后者坚定的脸庞四周衬着粗壮蓬松的头发。

诉讼以焚香献祭和掌礼官朗读祷词开始。法庭书记员读起起诉书和回答的辩护词。然后主席邀请原告的代表登上讲坛。梅勒托首先发言，强有力地强调他的爱国动机，没有一点卖弄修辞学技巧；但是他的讲演并不成功。接下来由安尼托和吕康发言，他们的话有较大效果。前者否认对被告所有的个人敌意。他宣称，如果苏格拉底不听从传唤并离开这个国家的话，他会更加高兴。但是现在他出现了，宣判无罪是对社会有危害的，因为它会鼓励学生们效仿他们老师的榜样。这些苏格拉底的“学生”以及他们的种种错误行为在控诉人的讲演里被大大地加以描绘。关于原告提出的证据我们一点也不知道。现在轮到苏格拉底发言了。在梅勒托的经常的和粗暴打断的情况下，他用简单的、无修饰的风格讲话。梅勒托则被他的修辞上的错误所激怒。他的讲演是即席发言或者有意像即席发言。言词中充满诚挚和庄严、精明和机智、最高程度的讽刺、绝对自我控制以及以倨傲态度绝口不提吁请法官们的恩惠或怜悯的话。显然它造成了某些印象，因为当陪审员们走上讲台把他们的投票筹码投入已经安置在那里收票的两个票钵时，人们发现：赞成无罪的中间有孔的筹码只比那些中间有厚轴的

筹码<sup>①</sup>少 30 个。

现在诉讼程序决定判刑。在这种以及相似的场合，被告人必须对控诉人要求的处罚提出供选择的惩罚办法。显然，这个供选择的建议，根据辩护人的顺从态度和刑罚的严重程度，或多或少有机会被接受。在这两点上，苏格拉底使陪审员中同情他的那一部分人感到痛苦的失望。只有在极为勉强的情况下，并且在公开声明以后，他才屈服于朋友们的压力，这些朋友以柏拉图为首，挺身为他担保，由他建议交纳不多的罚金（3000 德拉克马）。与此同时，苏格拉底以强调的语言（这些语言是有最高权力人民的代表听不惯的）抗议已经记录下来的裁决的公正性。结果是大大增加了有敌意的多数，不少于 360 票赞成判处死刑。

3. 我们试图从柏拉图不朽的描述中抽出这些事实，它们的历史真实性是无怀疑的。《申辩》不是一字不差的报导。甚至审判程序的外部情况也是以暗示一种适合迫切需要的方式来描述的。至少有一个这样的明显的事例。柏拉图让苏格拉底宣布为辩护想要请来一位证人的意向；后来没有再听到说起这位证人。在所有保存下来的阿提卡演说家的法庭演说中，尽管据说每一篇都是单个演说者的连续的发言，证人的检验用对他表扬的客套语和解释性插入“宣誓作证”字样来表示，正如在另外的场合，宣读从法令全书中摘录的句子时，同样使用“法律”字样来表示。柏拉图采用了不同的计划。在这里（在别的地方也一样），他不愿意仿效既定模式；也许他也希望避免旨在做到详尽无遗和丝毫不爽的外表。根据我

---

<sup>①</sup> 意即代表“判决有罪”。——译者

们已提到的在许诺和执行之间不一致的这一个例子,似乎只有这样假设才是公平的:即在其他特殊事例中曾采取相似的自由行动。例如,我们认为凯勒丰的兄弟,即上面提到的被告的证人,在我们看来不大可能是整个审判过程中传呼的唯一证人。事实上,在苏格拉底第一次的辩护词中有一段话,这个猜测可以从它那里得到有力的确认。在那段话中,苏格拉底要求梅勒托修补他的忽略,为控告召来所谓被腐蚀青年的父兄出席法庭作证。他说,他们肯定会提出恰好与控告人的期待相反的证词,并将他们一致同意的热情支持给予他。这种支持得到如此强烈的坚持,它作为证明的力量得到如此详尽的论述,以致我们只能猜想它涉及比假设事件更重要的某种东西。换言之,柏拉图为了文体的和个人的缘故使用了这种诡计,以避免提到这种为被告辩护的证词,在审判过程中实际上是提了上去的。但是,有必要比较仔细地考虑苏格拉底的演说,并检验它们与事实相一致的地方。

没有丝毫理由怀疑柏拉图重现了苏格拉底演说真实和原来的心境。辩护词传送出来的精神也同样可以这样说。在这些方面偏离历史真实不能以艺术家的自由为理由来证明它是对的;这样做违反了艺术也违反了责任。再有,辩护词的精神和目的是与我们所知的历史上的苏格拉底以及这个诉讼案所创造的形势达到最可能的和谐。没有人期望发现苏格拉底急于不惜任何代价来拯救他的生命。但是,另一方面也没有理由准许我们假定他坚决求死,不论是出于害怕老年体弱多病,或者是出于希望以殉道而把他的事业推向顶峰。真相似乎是这样的:除非他可以自由地生活,像他一直生活的一样,和没有阻碍地做他为自己选择的特殊的职业,否则生命对于他是没有价值的。因此在这个指明的限度之内,如我们

从《申辩》中得知的，他准备作出实质性的让步，包括交纳一笔罚金。但是在这个立场上，他不打算再有丝毫的游移；他不愿听到任何妥协；甚至一种暗含的同意的想法也会使他反感。不可否认，他采取的做法减少了对他有利的机会。但是绝对地摧毁这种机会的是少量的多数的反驳，他们确定他的罪名成立。可以提出一个反对这个观点的反对意见听起来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是从苏格拉底的第二次讲演的挑战性语调中摘引的。

“我意识到我没有罪。我不仅不应受到惩罚，而且我感到我本人应得到最高的荣誉，这是国家有权授予的——享受城邦公共会堂内的生活供应。”<sup>①</sup>

肯定地，一个被确认有罪的罪犯使用这种语言，似乎是在企求而不是避免迫在眉睫的死刑。但是这段话必须根据上下文来判断。这句话后面紧接着包括在提出供选择惩罚建议内的小小的让步。如果苏格拉底的强烈和有充分根据的自尊心没有受这个建议伤害的话，如果不产生那样的观念即他正在接受一桩含蓄的交易——法官们放弃死刑，被告则放弃他的事业——的话，如果苏格拉底能预防所有这种误解，同时又能避免自尊心受严重打击的话，那就有必要用一点自作主张来恢复平衡，把他的讲演提高到大大高于一般水平；如同意判决他死亡的刑罚。

如果我们以适当的注意力来读这篇辩护演说的话，我们不得不钦佩作为演说特色的辩论技巧的突出表演，尽管它们在语句安排上明显的缺乏艺术性和简明性。对于主要的指控——宗教的异

---

<sup>①</sup> 雅典的五百人大会设常设机构为“主席团”，由10个区轮流用抽签办法各选出50人组成，轮流主持日常工作，轮值的人在工作时间，享受由国家供给的伙食。少量有特殊贡献的卓越人士也可由国家授与此种荣誉。——译者

端——清楚地没有有效的回答。另一方面,对苏格拉底的指控有许多是喜剧作家,特别是阿里斯托芬提出的。对这些指控不仅能够如实地予以否认,而且易于表明它是以混淆和误解为依据的。相应地,对这些粗俗指控的驳斥放在辩护词的最前而,指控的材料巧妙地浓缩为公式化的控诉状。给予控诉状的优先地位超过原告方实际使用的材料。起诉状的后部分也是相当自由地处理的。它不是摘录完全精确的语句,这点我们从比较它的真实字句时可以得知(真实文字在别的地方保存着),并且从词组“这类某种事物”的使用中也能看出。这个不精确性的目的在于更大地突出较易遇见的控诉状的那一部分——腐蚀青年的指控。对于主要罪状不虔敬的辩护,使用荷马时代那么古老的原则来对付,即把弱勢的军队放在中间,把较强的军队布置在两侧来支援它们。这样,苏格拉底保留对他有利的最强的论点,即呼吁据说被腐蚀的青年的亲戚提供对他本人有利的意向,用来结束他的讲演。对同一指控的理论处理方面我们能看到一个有技巧的辩护者的手法。我们不提论证——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是有根据的,但是,在我们看来是一个明显的错误——即没有人能够故意地使与他接触的那些人变坏,因为他自己将遭到他们堕落变坏后果的苦头。情况若是如此,就不会有训练窃贼的学校,不会有养成儿子不诚实的父亲,不会有让女儿卖淫的母亲。事实上,把别人引人歧途,从他的有害工作中得到(或希望得到)的利益,也许会经常超过将来对他自己一切的伤害;或者,无论如何,由于这种利益的直接接近而更强烈地影响他的意志。此外,对于此人的伤害可能是或者显得是部分的,从而并不影响双方的关系。然而,对于苏格拉底及其追随者而言,有关这个问题的断言是一个更加广泛学说(没有人自愿犯错误和诸种

美德归于一)真正的推断。但是,并不是在这里我们认识到这位辩护人的高明手法,而是在对梅勒托起作用的一段话中认识到的(梅勒托这个人特别重视公众的好感,尤其是在法庭上),这段话迫使梅勒托一步步地不得不荒谬地承认,所有雅典人(除苏格拉底外)都是教育的专家,并忙于促进提高青年的道德。

这样,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来钦佩作者——不管他是苏格拉底或柏拉图——的辩护技巧。但当我们扩展我们的研究,不是着眼于仅仅几个段落,而是从整体来看时,我们的惊诧产生了。不管受影响的是不是陪审员或者仅仅是读者,要提出的问题是怎样使苏格拉底的工作为那些人所理解,他们的文化程度不可能使它们从它的真正和原来形式中领会它。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这个事实,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无可怀疑的证词,在这些演讲中,只字未提苏格拉底活动的中心特征——研究概念。他的逻辑论证有两个方面,借用格罗特制造的用语来说,我们可以称之为他的哲学的正负部分。对于很大一部分他的同时代人来说,对两者中的第二种比第一种有多得多的了解。这位批评和争论艺术的大师,永远备有好找岔子的论证和隐伏的讽刺,永远能压倒他的论敌使其蒙受羞愧和混乱——这些从一般群众看来,是苏格拉底不会引起妒忌的声誉;这些就是他树立无数敌人的性格。但是《申辩》给予这位不受欢迎的好争论人物以宗教使命的魅力。他的热心和忠实的朋友凯勒丰(现已不在人世了)去往特尔斐,如他的兄弟现在可以作证,他从神谕所得到了答复,说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聪明。后者由于神的这个晓谕陷入最深刻的困惑,因为这个回答与他自己意识到的无知形成反差太尖锐了。阿波罗肯定不会撒谎;这样,寻找神的宣示的隐藏的意义成了他的责任,这是无可逃避的任务;由此造成

他的“漫游”，使他企图探索所有被世界承认为聪明人——政治家、诗人和手艺人——的智慧。这个旅行播下有人仇视他的种子，而且是眼前这场诉讼的真正根源。他本人从中学到了教训，即所有其他人像他本人一样，都没有真正的智慧，但当他们自认为是聪明时，都感到上当的痛苦，只有他没有上过这个当。那么，这就是特尔斐声音的目的，皮提亚<sup>①</sup>的意思是说，人的智慧不过是可怜的东西；那些处于最好状况下的那些人——例如，苏格拉底——完全知道他们缺乏智慧。在我们考虑这个说法的效果前，我们必须检验它在事实上的基础。在这里有两件事我们必须严格地区分开——特尔斐神谕所本身的回答，和它对苏格拉底的生涯的影响。关于前者的历史真实性，我们不认为能有丝毫怀疑。没有人会相信柏拉图会愚蠢到不讲道德，企图把自己杜撰的东西作为证据提交给进行中的审判，目的在影响人们对有巨大重要性事件当前和今后的意见。尽管事实不容怀疑，但却不容易以任何令人满意的方式来解释它。它能够是苏格拉底谈话的有益影响在特尔斐已经得到承认并得到如此崇高的尊敬，以致认为以对他有利的宣告来帮助他是可取的吗？或者是他对民众会议的无助和无知的民主政府的轻蔑赢得特尔斐有贵族倾向祭司的同情吗？或者在宗教怀疑时期，苏格拉底对阿波罗和他神坛的深度尊敬，在神示所的祭司看来值得给予表示感激的回报吗？这些都将是我們根本不能回答的问题。但是，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在《申辩》中使用神谕是非历史的。它表明为苏格拉底的整个公开活动提供开始的推动力，但是在这

---

<sup>①</sup> 皮提亚是指特尔斐阿波罗神庙的女祭司。她的任务是表演在“昏迷”状态下，发布神谕，以回答祈求者提出的问题。——译者

个活动开始之前,怎能知道他在特尔斐的任何事情呢?他以他的工作获得声誉,神示所竟会承认一个完全不知名的渴望获得智慧者的要求,是绝对不可能的。说他逻辑论证的才能最早由神谕唤醒才付诸行动,这也是不可想象的。作为历史事实,他的逻辑辩证唯一地献给这里指定给它的目的也不是真实的。但是,始终未决的问题是柏拉图还是苏格拉底在这里对我们讲话。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因为回顾过去,即使是回顾一个人自己的过去,有可能陷入观点的错误。有可能把并不具有的重要意义和从未发挥的影响归因于一种特殊经验。然而在这个事例中,更加可能的假设是柏拉图曾深思熟虑地运用了他巧妙的诡计;也就是说:假如允许由果到因的论证具有一定份量。因为这件事情显示出的后果可能相当重大。所以许多没有怀疑的读者会大声呼喊:“那么,关于苏格拉底谈得很多的反诘中的提问是真实的。在那些诘问中,我们只看到坏脾气的恶意,攻击性和无耻的诡辩,但是事实上这些是深刻的谦逊的结果,对过份赞扬的抗议,最重要的是想理解神谕和证明他正确性的虔诚尝试。”我们对专用于苏格拉底哲学的正面部分的辩护词的那个部分能给予十分有决定性的判断意见。正如我们在这里毫不惊奇地观察到,这个申辩不仅与所有他的同时代人形成的对于苏格拉底的估价相矛盾,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它与我们根据无可辩驳的证据而知道的他的伦理教导的中心特征相矛盾。《申辩》中的一部分,在突出的位置上不止一处谈到,由于特尔斐神谕,苏格拉底进行测试人们的智慧,而且在他的全部生活中多次这样做。然而同一篇演说的另一个部分则向我们显示完全不同的图景。苏格拉底始终把自己描述为献身于“为神服务”,但在同样词组隐藏着完全改变的意义。现在苏格拉底承担美德的规劝者和宣



讲者的角色,他向所有他遇到的人——外国人和同胞都一样——讲话,试图说服他们思考他们的最高利益,离开为了荣誉和财富的斗争,专注于很好安排他们自己的灵魂。我们不需详述这种不可能性,因为那样的一个苏格拉底应该是喜剧舞台上苏格拉底的原型。只要指出这点就够了:所有我们所知的他的正面伦理教导是与对他的这样描述是矛盾的。“美德就是知识”的学说与它是完全不可调和的。他知道什么是善,就去做什么,他不需任何规劝,对他说规劝和鼓励的语言是徒劳的;只有教导和弄明白他的想法才有用处。因而,我们不能接受在谈论的这段话是对事实的恰当描述。但是它同样绝不是任意的捏造。柏拉图用“规劝的”目的(如刚才已经指出的)来代替苏格拉底谈话的“规劝的”结果。更精确地说,柏拉图了解为有意识和深思熟虑的努力产生的直接结果的东西,事实上是苏格拉底有时作为目标有时不作目标的间接结果。由于他谈话的魅力经常使甚至抗拒它的人着迷,把他们的兴趣从生活的外部事物引开,引导他们专心致志于最高尚和最深刻的问题。但是产生这些效果的东西是正式地研究概念。一个作家了解概念的澄清和加深对于道德进步是重要帮助,并且希望将他的这个信念传授给还不懂得这个因果关系的人们,他可能很理解把道德的分析者突然变为道德的宣讲者的方法。柏拉图在这里为了印象的精确而牺牲了事实的精确。他让我们看到的是经改制的真理而不是真理本身,通过一个有限智力的歪曲的媒体来看真理本身,它会显出巨大错误的形状。他的做法好象一个望远镜的制造者,后者校正第一个镜片作用的办法是加上第二个曲率相等而方向相反的镜片。在这两种情况的任何一种中,校正的程度如果过了头(这是很容易发生的),那么所有事物必然产生的不完善,责任必须

由校正者承担。

4. 以上的考虑阻止我们把《申辩》看作实际上在法庭陈述的演说的完全忠实的记录。根据我们可支配的材料,不可能在什么是真的和什么是虚构的之间划一条清楚的分界线。但是,有两点不应忘记。没有一位古代作者认为把他心目中主人公的讲演加以改变或修饰,使它们更接近于他自己完善的理想有什么害处。在柏拉图的政治理论中,使用“有用的谎言”作为药物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如果这个原则没有影响他作为作家的做事方法,或者如果他允许他的滔滔雄辩由于考虑到言词真实性的顾虑而受到限制,那倒是奇怪的了。另一方面,不管是他还是苏格拉底的任何朋友都认为,完全忽视这位老师在他自己辩护中的实际演说,而代之以新虚构的材料,那就是不忠实的和放肆的行为。我们因而被迫承认在《申辩》中真实与虚构并存,并放弃完全把它们分开的所有希望。所有我们能够以相当信心坚持的是:整个作品的艺术结构是柏拉图干的,而第二篇讲演(它是三篇中最短的,又是最紧密与审判过程相联系的)包含着真正苏格拉底原话的最重要的部分。

在一种意义上,也许是在最高意义上,全部《申辩》可以叫做苏格拉底的所有物。这部作品的智力和艺术的质量无疑是足够重要的,我们不得不给予它们相当的重视。但是更加重要的仍是灵魂的伟大,它给予整个奇妙的创作以色彩和一致性。它更多的是苏格拉底的特征面不是柏拉图的特征。清醒的意识和炽热的热情的混合或者最好说密切的融合,对外部事物的蔑视,对理性思想获胜力量的信心,“好人”能防止命运所有打击的坚定信念,一个人带着欢愉的自信走自己的路,既无恐惧也无希望使他不去完成他的任

务——所有这些使《申辩》成为坚强和自由精神的世俗祈祷书。这种精神甚至在 23 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感动人们的灵魂和点燃他们的感情。它是整个文学中最强有力的著作之一；很少有其它著作如此适合于培养沉着镇静的男子汉美德。很难把这个著作与宗教的关系摆正。著作中有许多涉及神的地方；但是对于神的敬畏情绪，对他们的恐惧，或者任何种类的对神的敬畏(δαιμονία)，却像卢克莱修的教诲诗<sup>①</sup>中一样少。其曲调到达我们耳朵的神的歌声实际上是一首合唱曲，它们伴着但并不压倒苏格拉底的主导部分，即他的人格和良心。这部著作的独有特性在苏格拉底死刑判决已经通过之后发表的最后一篇演说中表现得最清楚。这是这部著作中我们会自然地最容易看作纯粹由柏拉图增加的部分；然而它也是苏格拉底的思想状态在其中保存得最好的一个部分。不死的问题提了出来，但完全未作决定。两种可能性都加以讨论了：或者是死人继续存在，或者是死亡像一场无梦的熟睡；但这两个选择都不符合任何偏爱。真实情况无论在哪一方面，在两种情况中死亡都不能称作坏事。情况还不是全部，在针对未来存在的可能性的那段话中，未来生活的图景既没有令人沮丧的恐怖也同等地没有现世生活的狂喜。这里没有那种天国的欢乐或者那种地狱的折磨，如在柏拉图的其它著作中经常描写的。

苏格拉底生时保持的不易激动的镇静，在他前往另一个世界时也伴随着他。那里，在精神上他与早期世界的半神英雄们为伴，就像他自己的朋友和同伴；他密切考察他们，并指望从他们的回答

---

<sup>①</sup> 指公元一世纪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卢克莱修的长诗《论自然》，其中充满素朴唯物主义的精神。——译者

中得到许多愉悦与教益。带着同样的友好的幽默,他为以下事实祝贺自己:在冥府至少思想自由不能是招来极刑的罪过。怎样愉快地面对死亡是可以从《申辩》中学到的一课,即使对不相信他们由此就进入天国欢乐的那些人也是如此。

很可能苏格拉底的榜样会产生比他的教导还要大的后果。大家都知道,死刑的执行由于必须等待圣船从得洛斯岛来到而推迟。而这位已判刑的囚犯则利用这个暂缓执行来继续他与他的学生们进行习惯了的对话,并且用部分时间把伊索寓言改写为韵文。他进行这后一项任务是出于服从神的命令,它像许多从前的其它事例一样,是在梦中传达给他的。神嘱咐他使自己专注于“音乐”,这就是说专注于某些艺术形式。也许在这里我们又会看到从潜意识深处出现的启发(参照第 88 页)嘱咐他补充他自然天赋中的一个不足之处来力争使自己臻于完善。当他的最后时刻来到时,他是怎样送走他的悲恸的亲属,安慰他的哭泣的学生,与狱卒交换了几句友好的话,然后沉默而安详地喝干了那杯毒药,——所有这一切形成了一幅图画,重新画它将是浪费劳力,因为它以永远新鲜和生动的色彩存在于柏拉图的《菲多》篇中。

5. 只要人们在地球上生活,这一天的审判就永不会被忘记。为第一个将生命献给自由研究之人的哀悼声也不会停止。我们还必须把他看作是狂热不容忍的受害者吗?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仍然分歧。有些人不倦地斥责那个判决是最坏类型的司法谋杀,是雅典城邦纹章上抹不掉的污点。另一些人(数量要少些)站在“遵守法律”一边反对“革命者”,并贪婪地抓住看来能贬低苏格拉底伟大的每一件事情。在我们这方面,我们深信这个致人死亡的事件

仅仅在很小程度上是偏见和误解的结果,而在更大的程度上和决定性的标准上,它完全是具有正当理由发生冲突的问题。我们认为,黑格尔正确地陈述了这个案子的功过。生活的两种观点,人们几乎可以说人性的两个方面在当时争取统治权。由苏格拉底开展的运动注定要给予人类以无可计量的好处;对于那个时候的雅典人来说,它是值得怀疑的祝福。社会维护自身利益并反对瓦解势力的权利与一位伟大人物的权利相矛盾,后者要打开新的道路并大胆地向僵化的传统和所有权威的恐吓挑战以走上这条新的道路。个人的这个权利在读到这些话的那些人中间受到的怀疑要比城邦的对抗性的权利少得多。因此我们可以想像许多读者会大声说:“对于一个文明的和有高度教养的人民来说,以那样一种粗暴的方式破坏自由言论的权利,不是完全不相称吗?”我们回答说,自由言论的权利因为它有有利的后果,必须把它看作属于人类最宝贵的财富;但是它在任何地方决不是绝对没有限制地存在的。在我们自己的世纪里,没有比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更加热心和更加开明的言论自由的维护者了。然而,这位热情的个人自由的宣扬者也不能避免承认限制它的界限。他在《论自由》这部辉煌的著作中有这么一段话:

“没有人声称行动应有像意见那样的自由。相反,当发表意见的环境处于那样一种状况,使意见的表达构成积极煽动某种有害行动时,甚至意见也丧失它们的豁免权。一种意见认为谷物商是使穷人挨饿的人,或者私有财产是一种抢夺,当这些意见在报纸上传播时,应当不受干扰,但是,当口头地向集合在谷物商房子前面的一群激动的暴民发表或者把它作为传单形式在同样一群暴民中传递时,就可能正当地招致惩罚。”

我们可以问,如果传单的内容在暴民集会前一天已经在报纸上公之于众了,那会怎样呢?或者如果暴民还没有集合起来,但可能在任何时候集合起来,又会怎么样呢?大家都明白,在这里划的界线是一条波动起伏的界线,它随着威胁着的危险的大小和靠近而变动,也根据防御手段的功效与可信赖性而变动。事实上,没有一个社会,无论它的成员受到自由理论讨论的价值和重要性的思想怎么样渗透,它会走得那样远,以致永远和在所有情况下,包括它至关紧要的利益处于危险的情况下允许这样的自由。在这里,我们必须记住古代城邦的脆弱性。那些小小的城市共和国人数不多是个弱点,它们必然处于警惕邻邦攻击的永久威胁的危险之下是双倍的弱点。人口的同种其本身是一种力量的因素,从我们现在的观点看来,它可能容易变成一个脆弱的因素。对国家有危险的学说的传播,在我们现代的大的和中等规模的社会中,在从理论到实践的决定性步骤之前,可能要经历很长时间,它不过是一种遥远的可能性。人口中相当程度的摩擦可能被这样的学说扩大和加深,而其它重要学说则提供强有力的中和作用。想一想农村阶级与资产阶级间以及资产阶级与无产者阶级间的悬殊差别。存在于古代雅典的这种类型的差别,通过时间的消蚀作用以及伟大政治家针对这个目的的努力,已经失去了它们原有的尖锐性。乡村的人民容易受到城市的影响。只是在并非十分经常的修改法律本身的情况下,才邀请乡镇或地区进行像独立合作那样的事情。雅典的命运每天都在 Pnyx<sup>①</sup>上决定。城邦及其制度的持续,最终依靠

---

<sup>①</sup> Pnyx 是雅典的公民大会(εκκλησία)举行的地方。这里的说法不太准确。实际上“每天”决定雅典的命运的是常设的“五百人大会”或“四百人大会”(βουλή)及其主席团(πρυτάνεις)。公民大会只有在重大问题上才会举行。——译者

的是公民的忠诚,这当然是一条普遍真理。但是它可以在更加字面意义上的古代城邦国家得到肯定。城邦基础的震动马上就可以感觉出来。这种震动毫无阻拦地从这座大厦的基础传递到它的顶端,设有中间的因素来使打击消失。城邦的利益缺乏由世袭传递的最高行政长官、有组织军事力量和公共部门系统提供的保护。雅典没有王族,没有常备军,没有官僚制度。城邦能够指望于公民忠诚的需要就更加重要了。像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一样,公民包括少量的领导人和大量的被领导者。前一个范畴中主要是能够最有技巧地使用言语武器的那些人。再有,这个优越性是由于辩证的或修辞的训练而获得或增强的。因此就非常容易理解,几十年对于兴起的一代人中最有抱负和最有能力的许多人施加持续的影响,同时他又是当代伦理学和政治学方面最有创见的思想家的逻辑辩证大师,理所当然地成为具有不小重要性的政治因素和判断善或恶的伟大力量。

苏格拉底的影响被广大范围的人们看作是一种恶影响的事实,必须当作是几个不同原因的共同结果。悲惨地伤害了他们城邦的亚西比德和克里底亚投射到他们老师形象上的阴影,也许第一眼看来似乎是不幸的偶然事件。因为色诺芬坚持以下看法也许是对的:至少就克里底亚来说,他寻求加入苏格拉底的社团的主要动机是希望取得政治权力,而关于他和亚西比德的性格成长上,他们都没有从苏格拉底那里得到深刻的和持久的印记。但是除此之外,完全可以理解,在选择这种特殊教育形式的许多有很高目标的青年中间,发觉其中少数人后来所走的道路对城邦是灾难性的。看来更适合称作不愉快偶然性事件的是这样的情况,即在那些担任城邦显要职位的人中没有人出自苏格拉底的门下。而这一点还

有更深的原因,并具有双重性。读者已经熟悉苏格拉底不喜欢现存民主宪法,宪法与他智力至上的学说不协调。色诺芬引用了“控告人”(也许是指由文学家波利克拉特斯在这场审判几年后写成的作品中的安尼托)提出对苏格拉底的指责中有如下一条:“苏格拉底使他的伙伴成为现存法律的藐视者。”对于这个指控,色诺芬没有作出切题的回答。他仅仅否认老师曾煽动他的学生:“粗暴地”攻击宪法。还有更加重要的一点,苏格拉底的朋友们不仅对于在他们的城邦中流行的事物秩序坚持一种冷淡或不友好的态度,而且对于城邦本身也是如此。在这方面,色诺芬以他的生活为对他老师的指控所提供的材料比能够摧毁辩护方的他的全部著作还要多。如色诺芬有许多年在波斯和斯巴达,柏拉图在叙拉古几乎比在他自己的家乡城市更加舒适自在。安提西泰尼和亚里斯提卜故意躲避出头露面的生活,在前者的学派中,用平实的语言宣扬聪明人的“世界公民”的理想并以此为信条。在这里,这些学生追随他们老师的脚步,这是没有人会否认的。

我们也不会完全处于猜测之中。苏格拉底尽管有伟大的天赋,却有意回避为城邦服务,这是一桩普遍感到惊异的事。柏拉图在《申辩》中说到他说他在辩护词中极力主张一个奇怪的道理:“如果一个人真正地希望为反对不公正而斗争,那么他的场所是在私生活中而不是在公共生活中。”这个判断只有下面一些可能理由的支持:所谓的所有此类努力的无用,政治状况的无望和大众的不可改正性。因为这是苏格拉底以下断言的唯一可能的含义:如果他对政治有积极的兴趣,他就不能活到较大的年纪;他将一再被迫冒生命危险与民众对抗,从这种对抗中民众不会得到好处。看得出这是在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中当作典型所指的同一批人。肯定



地,当这批人在失败之下屈服并由于遭受苦难而得到净化时,不能把他们真正地叫做仁慈和聪明的城邦创造者手中的无法处理的材料。想到这些事情很难不带有深深遗憾的感觉。最高贵和最可教的人民之一却被一群最好的人所抛弃,这群人冷淡地不理睬他,并把他为改进提高所作的全部努力称为大大浪费的劳动。但是不要在遗憾上浪费时间,让我们力图理解。说苏格拉底和他的朋友们缺乏对他们的家园的真正的和衷心的爱,这是无可争论的。但对这一点的解释不是苏格拉底是(像弗朗西丝·赖特对边沁所说的,尽管是在某种不同的意义上)一个“冷冰冰的人”;而是他充满了另一种新的理想。“知识”并不是雅典人的;“清醒判断力”不是斯巴达人的;“勇敢”不是科林斯人的。在任何事务和每一件事物都要接受理性判断的地方,那里任何传统本身不会受到尊重,而是要求每一事物都要由思考和反思来证明其正确,限于几平方英里城市的地方爱国主义应保存所有它的古代力量是不可能的。面对“命运已经把人们弄得焦头烂额的大地之角”而无动于衷,肯定会得到这个结果(尽管我们刚才从爱比克泰德那里引用的所谓苏格拉底的警句可能是伪造的),即在全神贯注于普遍人道的地方必然忽视其他任何事情。这是哲学从一开始起就决定的命运,那就是它要对国家的情绪和制度施加瓦解的影响。读者会记得那个旅行了许多地方,思想深邃的年老行吟诗人,他的犀利的批评造成希腊生活不可补救的破坏。在我们现在达到揭露历史的时刻,在哲学批评和国家的理想之间的差距可以说更加深刻了,也更加众所周知了。哲学家们现在威胁要摧毁的是希腊生活中老的狭隘性、老的平庸性、老的温暖和力量。在理智道德之后很快出现对世界公民身份的崇拜。再以后我们看到世界帝国,在它之后又是世界宗教。

我们没有任何愿望暗示,在公元前 399 年春天,安尼托、吕康和梅勒托能瞭望这么远,看到这一切。但是,如果他们对苏格拉底及其朋友对于他们的国家和宪法的爱有所怀疑,如果他们在他对概念的推理和研究中看出对国家宗教和整个国家存在的危险,如果他们因此在雅典历史上这个特殊的关键时刻,下决心让这个新倾向的发言人缄口沉默,我们既不必大为吃惊,也不必归因于这些人任何心灵中不寻常的邪恶或智力上的缺陷。他们所希望做的就是使苏格拉底缄口沉默,既不多些也不少些。在一个现代国家中,这样一个目标可能很容易办到。剥夺教授职位、纪律调查制度,或者在限制自由较严的国家里,用警察抑制、驱逐出境或行政调动;这些手段中的任何一种都能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在雅典,情况不一样,这些方法没有一件可以采用;只有刑事审判能够满足这个条件。法律提供的唯一处理办法是控告不虔敬之罪。雅典民主的保守精神早已占了上风,以致古老和严酷的法律(根据它,无神论者可以处以死刑)并没有被废弃,不过代以比较宽容的执行。我们从柏拉图和色诺芬那里知道(他们没有虚假陈述的动机,非常愿意将这桩致命公案的全部责任放在控告人和法官的身上),如果苏格拉底愿意的话,他可能容易地避开死亡。他有不出现在法庭上的自由,但是他出庭了;他有自由提出选择流放刑罚,这样的建议完全有可能被接受。甚至如果他不愿意那样做,他还是有自由避免死刑,只要他把他的行为在稍稍仿效一下被告人的正常的惯例,不要完全鄙视向法官吁请怜悯。最后,甚至在判决已经宣布之后,对于他来说,从拘留中逃出来也是一桩容易的事情。如柏拉图在《克里托》中告诉我们,已经作好了充分准备帮助他出逃。但是他是坚定的材料制成的。他是负有迫使人们的思想和感情进入新的渠道这个任务

的那些人中的一个。他不会同意任何的妥协。他的决心是坚定和不可改变的；要么他继续进行教学活动，要么他将不再活在世上。

在后来的岁月中谈论的关于雅典人如何后悔、为苏格拉底建立雕像以及给予控告人惩罚的故事，早就被认为是纯粹的虚构（主要理由牵涉这些故事在年代学上的不可能性）。苏格拉底的处决真正地引发的事情是一系列文学上的争论。在波利克拉特斯赞成这个案子起诉的文学描述之后，勤奋和有才能的演说词作家吕西阿斯的笔随即作出回答。这个题材继续是修辞练习的受到喜爱的主题一直到罗马时代的后期，那时的一个样本利巴尼奥斯的《申辩》保存至今。但是，雅典人普遍的感情清楚地由以下状况表明：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流逝之后，政治家和演说家埃斯基涅斯<sup>①</sup>能够希望以向集会的人民发表以下演讲提出当时他正在推进的目标：“还有，雅典人啊，你们把智者苏格拉底处死，就因为证明了克里底亚这个民主制度 30 个摧毁者之一，接受过他的教育。”<sup>②</sup>

死去的苏格拉底重新站起来了，不仅仅在各学派中，而且在他学生们的著作里。他们一直不倦地介绍他们尊敬的老师的人品，访问市场和运动场，与老年人和青年谈话，如他活着时候的习惯那样。因此，甚至在他死后，他的的确确继续在教导人们。

---

① 这位埃斯基涅斯（约公元前 397—前 322 年）是与著名政治家和演说家德谟斯泰尼同时，并互为政敌的雅典政治家和演说家。望注意勿与同名的苏格拉底的一位追随者（生活于公元前 4 世纪）相混淆。——译者

② 引自公元前 345 年他发表的演说：“反对提马库斯”。

## 附录 苏格拉底

第欧根尼·拉尔修

苏格拉底是雕塑匠苏福罗尼斯库和接生婆费娜勒特的儿子，这是柏拉图在《泰阿泰德》中告诉我们的。他是一位雅典的公民，属于阿罗珀克居民区。人们认为他帮助欧里庇得斯创作戏剧。因此穆涅思马可斯写道：

欧里庇得斯的这个新戏剧叫做《弗里吉亚人》<sup>①</sup>；

……苏格拉底为它提供了素材<sup>②</sup>。

他还称欧里庇得斯是“苏格拉底铆接的引擎。”而卡里亚斯在《被禁锢的人》中写道：

甲：请问你为什么这般庄严，为什么有如此高尚的神态？

乙：我有种种权利：我得到苏格拉底的帮助。

阿里斯托芬在《云》中说：

是他为欧里庇得斯编写那些灵巧的剧本，

它们十分精湛，却缺乏智慧。

按照有些作家的说法，他是安那克萨哥拉的学生，据亚历山大在他的《哲学家师承记》中所说，他也是达蒙的学生。在安那克萨

---

① 弗里吉亚是小亚细亚一个古代国家的名称。——译者

② 这里的原文是意为“木柴”、“烧火木材”。这两句诗利用了“弗里吉亚人”与“木柴”的发音近似，构成一个双关语。——译者

哥拉被谴责时，他成了自然哲学家阿基劳斯的学生；阿里士多克塞诺斯断言阿基劳斯非常喜欢他。杜瑞斯把他说成曾经是一个奴隶并受雇于石工作坊，有人把装饰在雅典卫城上的美惠三女神雕像说成是他的作品。因此在提蒙的《讽刺诗集》中有如下一段话：

从这一切衍生出这位雕塑匠是一位法律的空谈家、希腊的蛊惑者、微妙论据的创作者、取笑精美演讲的嘲笑者、假装谦恭的半个阿提卡人。

根据伊多墨纽斯的说法，他在公开演说中是令人钦佩的；还有，如色诺芬告诉我们，三十暴君禁止他传授言语艺术。阿里斯托芬在他的戏剧中攻击他使较坏的东西看来好像有较好的理由。法沃里努斯在他的《杂史》中说，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埃斯基涅斯最先教授修辞学；这一点在伊多墨纽斯论苏格拉底小圈子的著作中得到证实。再有，他是论述生活行为的第一个人，也是受审判处死刑的第一位哲学家。斯平塔诺的儿子阿里士多克塞诺斯说他赚了钱；他在无论什么情况下都投入本金，收集增殖的利息，然后，在这笔钱花光之后，再一次投入本金。

拜占庭的德米特里提到：克里托被他的灵魂之美所触动，把他从他的作坊中接走并且教育他；他在作坊和市场中讨论道德问题，深信对自然的研究与我们的环境无关；而且他宣称他的研究包括房屋中无论什么善的或恶的东西<sup>①</sup>。

由于他议论中的激情，人们常常饱以老拳或者撕掉他的头发；而在大多数场合他遭受鄙视和嘲笑，然而他耐心地忍受着所有这种虐待。这种事情太多了，以致当他被踢而且有人对他的泰然处

---

<sup>①</sup> 荷马：《奥德赛》，iv, 392。

之表示惊讶时,他回答说:“假如它踢了我,难道我应当与一头驴子打官司吗?”德米特里说到这里为止。

不同于大多数哲学家,他没有需要去旅行。除了他被征召参加远征之外。他一生的其余时候都在家里度过,并且越来越渴望和与他交谈的任何人进行辩论。他的目的不是改变对手的意见,而是获得真理。他们提到,欧里庇得斯给了他一部赫拉克利特论文,并问他对它的意见,他的答复是:“我懂得的部分是卓越的,我敢说,我不懂的部分也是如此;但它需要一个提洛的潜水人深潜到它的底部。”

他注意锻炼他的身体并保持着健康。无论如何他参加了对安菲波利斯的远征;在德洛之战中,色诺芬从马上摔了下来,他赶忙过去救了他的命。因为在雅典人的总溃退中,他个人毫无困难地撤退了,悄悄地不时改变方向,准备在受到攻击时保卫自己。以后他又在波提迭亚服役,因为陆上交通被战争阻塞,不知他是否从海上去到那里;当他在那里时,据说他曾保持一个姿势一整夜没有改变,并且还获得了勇敢奖章。但是根据亚里斯提卜在其论文集《论古代人的奢侈》第四卷中的记载,苏格拉底把奖章让给了亚西比德,因为他对后者有最深挚的情感。开俄斯岛的伊昂说,在他年轻时与阿基劳斯一起访问萨摩斯岛;据亚里士多德说,他去过特尔斐<sup>①</sup>;根据法沃里努斯《回忆录》第一册中的记载,他还去过伊斯特谟。

他意志的力量和对民主政治的忠诚,从他拒绝服从克里底亚

---

<sup>①</sup> 此处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占希腊文原文为去到毕托,按毕托乃著名的特尔斐神庙所在地,故英译文直接译作去到德尔斐。——译者

及其同僚的命令一事得到证明,当时他们命令他把萨拉米斯的富翁莱昂带到他们面前处死;能进一步证明的还有这个事实,即只有他一人投票赞成宣判 10 位将军的无罪;再有另一个事实,即当他有机会从监狱中逃脱时,他拒绝这样做,他还制止他的朋友们为他的命运而哭泣,并在狱中向他们发表他最值得记忆的谈话。

他是一个有伟大的独立和尊严品质的人。潘菲拉在她的《注释》第七卷中告诉我们,亚西比德有一次怎样地提供给他一大块地基来建造一所房子;但是他回答说:“假如我需要鞋子而你提供给我一整张兽皮,我拿了它,难道不是很可笑吗?”每当他看到有许多货物摆出来出卖时,他会对他自己说:“没有这么多东西我照样生活!”他还不断地吟诵以下的诗句:

紫色的大氅和白银的光辉

更适合演员的需要不是我的需要。

他拒绝接受马其顿的阿基劳斯、克拉农的斯科帕斯以及拉里萨的欧里洛库的礼物或去往他们的宫廷以表示对他们的蔑视。他的生活方式极有规律,以致有几次当瘟疫在雅典流行时,他是唯一能免于传染的人。

亚里士多德说,他娶了两个妻子:他的第一个妻子是克珊娣珀,他与她生有一个儿子兰普罗克勒;他的第二个妻子是法官阿里斯泰德的女儿米尔陀,他娶她没有花费财礼。他和她生下了索福罗尼斯科和梅列克塞努,有人把米尔陀当作他的第一个妻子;有些作家,包括萨提罗斯与罗德岛的赫罗尼穆斯在内,则肯定她们在同一时间都是他的妻子。因为他们说,雅典男人少,希望增加人口,于是,通过了一项法令,允许公民娶一个雅典妇女,若无子女可另娶一个妻子;苏格拉底就是据此这样做的。

他会对那些嘲弄他的人报以蔑视。他以过简朴的生活而自傲,从不向任何人要求酬劳。他经常说,他最喜欢最少需要辛辣调味品的食物和使他感到最少渴望其他饮料的饮料。他感到,他向往的东西最少,他离开神最近。这是可以从喜剧诗人那里看到,他在取笑苏格拉底的剧本中高度地称赞了他。阿里斯托芬是这样说的<sup>①</sup>:

啊,公正地期望伟大智慧的人,你生活在雅典人和希腊人之中将是多么有福,你是一位记忆力极强的思想家,具有耐劳的品德;无论是站着还是行走,你从不疲倦消沉,决不因寒冷而冻僵,决不因饥饿而寻觅早餐;见到葡萄酒和油腻食物以及所有其他无聊行为,你掉头就走。

阿米普西亚也一样,当他把穿着大氅的他搬上舞台时也说:

甲:苏格拉底啊,你这位小集团中最优秀的,又是最空虚的人,来到我们中间吧!你是一位健壮的家伙。我们从哪里能给你弄到一件合适的外衣呢?

乙:你糟糕的苦境是对笨拙工匠的侮辱。

甲:然而,像他那样的挨饿,这个人没有堕落为马屁精。

他的这种倨傲的、高贵的精神也得到阿里斯托芬的注意,他说<sup>②</sup>:

因为你沿街高视阔步行走,转动着你的眼珠,赤着脚,忍受着许多艰苦,并且凝视着我们。

然而有时他甚至会穿上华丽的衣服以适应某个场合,就像在柏拉图的《会饮》中提到<sup>③</sup>,当时他在去往阿加松家的路上。

---

① 《云》第 412—417 行。

② 《云》第 362 行。

③ 174A。



他在说服人和劝阻人两方面都表现了同等的才能；这样，正如柏拉图所说，在与泰阿泰德进行了关于知识的对话后，他送走了他，心中充满了炽热的冲动；但是当欧西弗罗控告他父亲杀人时，苏格拉底与他就孝顺问题交谈几句之后，就把他从这个话题引开了。他又用规劝把吕西斯转变成一位最有德行的人。因为他具有从事实取得论据的本领。当他的儿子兰普罗克勒对他的母亲狂怒时，如同我相信色诺芬曾告诉我们那样，苏格拉底使他感到为自己的行为而羞愧。当柏拉图的哥哥格劳康向往进入政界时，苏格拉底阻止了他。（如色诺芬所说）因为他缺乏经验；但是反过来，他鼓励哈尔米德参与政治，因为他有这方面的天赋。<sup>①</sup>

他唤起了将军伊非克拉特斯的尚武精神。方法是给他看理发师米底亚的善打斗的公鸡是怎样地拍着翅膀向卡里亚的那些公鸡挑战。格劳科尼德期望他应当受城邦之聘，好像他是某种雉鸡或孔雀一般。

他经常说，奇怪的是，如果你问一个人有多少头羊，他可以很容易地告诉你准确的数字；然而他却不能叫出他的朋友的名字，或者说出他有多少朋友，他对于朋友的价值看得太轻了。看到欧克莱德斯对争辩论据有强烈兴趣时，苏格拉底对他说：“你将能与智者很好相处，欧克莱德斯，但根本不能与一般人相处。因为他认为这种过细的辩论没有用处，如同柏拉图在《欧惕德谟》告诉我们的。

还有，当哈尔米德送给他几个奴隶，以便他能从他们身上获得一些收入时，他谢绝了赠送；而且据有的人说，他看不起亚西比德

---

<sup>①</sup> 《回忆录》Ⅲ.7。

的美丽。据色诺芬在《会饮》中所说,他称赞闲暇是最好的财富。他说,只有一种好事,那就是知识,只有一种坏事,那就是无知;财富和良好出身并不给它们的拥有者带来高贵,而是相反地带来邪恶。无论如何,当有人告诉他:安提西尼的母亲是色雷斯人时,他回答道:“啊,难道你期望一个如此高贵的人会由两位雅典的父母生育的吗?”他使克里托赎买菲多(他在战争中被俘为囚犯并降级为奴),由此赢得了后者对哲学的热爱。

还有,在他老年时,他学习弹奏竖琴,宣称他认为学习一门新的技能没有荒唐之处,如色诺芬在《会饮》中提到的,跳舞是他固定的习惯,他认为这种锻炼帮助他保持身体处于良好状态。他经常说,他的超自然朕兆事先提醒他有关未来之事;有一个好的开端并非无足轻重的好处,而是足以使天平倾斜的小事;并说他除了知道他的无知这个事实外一无所知。他说,当人们付高价买早熟的水果时,他们看到适当季节成熟的水果必定感到失望。有一次当被问及什么构成一个年轻人的美德时,他说:“做任何事都不过分。”他认为学习几何学应学到那样的程度,即一个人可以丈量他得到的或出卖的土地。

当听到欧里庇得斯的戏剧《阳光》中诗人谈到美德的诗句:

最好让她尽情地漫游<sup>①</sup>,

他站起来并离开了剧场。因为他说:为了不能找到一个奴隶而大叫大嚷,让美德在这种方式中消亡,那是荒谬的。有人问他,他应当结婚还是不结婚,得到的答复是:“无论你娶哪一个,你都将后

---

<sup>①</sup> 这行诗句出现在欧里庇得斯的《埃勒克特拉》第 379 行。它也许是佚失的《阳光》中的诗句。

悔”。他经常表示他对以下一点的惊讶：大理石雕像的雕刻家应当努力把一块大理石造成完整的人的肖像，而不应努力只管自己的事情，免得仅仅造出石块而不是人。他向青年人推荐经常使用镜子，以达到漂亮的人可以获得相应的行为，而丑陋的人可以通过教育去掉他们缺点的目的。

他曾经邀请一些富人，当克珊媞珀说她为饭菜寒酸而感到羞愧时，他说：“没有关系，因为如果他们是懂理的，他们会忍受它；而如果他们是毫无善意的，我们大可不必为他们而烦恼。”他会说，这个世界上其余的人为吃而活着，而他自己为活着而吃。关于那些不值一提的广大群众<sup>①</sup>，他说，那好像是有人不接受一个看作是伪造的4德拉克马银币，而与此同时把一整堆恰恰是真正的伪币当作真的接受。埃斯希内对他说：“我是一个穷人，送不起别的什么东西，而我只有把我自己给你。”苏格拉底回答说：“不，难道你没有看到你正把世上最贵重的礼物给我么？”有一个人抱怨在三十暴君当权时他被忽视了，苏格拉底说：“不，你并不为此而遗憾，对吗？”有一个人对他说：“你被雅典人判决处死，”他回答说：“他们也被自然作了同样的判决。”但是有的人把这个话归之于安那克萨哥拉。当他的妻子说：“你不公正地受苦了，”他反驳说：“为什么，难道你要我公正地受苦么？”他曾做了个梦，有人对他说：

到第三天你将来到了弗提亚的肥沃原野<sup>②</sup>；

---

① 此处原文为“关于不值一提的广大群众”，Loeb本英译得不确切。——译者

② 荷马：《伊利亚特》，Ⅸ. 363，按，弗提亚乃荷马史诗中的英雄阿基里斯的故乡。——译者

而他告诉埃斯希内：“到第三天我将死去。”<sup>①</sup> 当他行将喝下毒药时，阿波罗多罗斯送给他一件华美的大氅让他穿着它死去。他说：“我自己有什么善行可以活着穿它而不是穿着它死去呢？”当有人告诉他，某某人说他的坏话时，他回答说：“是的，因为他从未学会说好话。”当安提西尼翻转他的大氅这样能看到破裂处时，他说：“我通过你的大氅看到了你的虚荣心。”有人对他说：“你没有发现某某人十分无礼吗？”他的回答是：“不，因为要两个人才吵得起架。”他常说，我们不应反对成为喜剧诗人的对象，因为如果他们嘲讽我们的错误，他们将对我们有好处；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就不会碰我们。”当克珊娣珀先辱骂他随后用水把他淋得浑身透湿时，他的回答是：“我不是说过，克珊娣珀的雷霆会在雨中收场吗？”当亚西比德宣称克珊娣珀的辱骂是不能容忍的时候，他说：“不，我已经对辱骂习惯了，就像习惯于辘轳的不断咕噜声。而且你不会介意鹅的咯咯叫吧。”亚西比德回答说：“不，但是鹅向我提供蛋的小鹅呀。”苏格拉底说：“克珊娣珀则是我孩子的妈呀。”当她在市场上把他的外套从背后剥脱时，认识他的人劝他还击，他说：“是的，以宙斯的名义，当我们进行拳击时，你们每一个人都会参加进来喊着：‘加油，苏格拉底！’‘干得好，克珊娣珀！’”他说，他与一个泼妇生活在一起，就像骑士喜欢烈马，“但是正如当他们制服了这些烈马时，他们就能容易地对付其余的马匹了，所以在我与克珊娣珀相处时应该学会使自己适应世界的其余人。”

这一些以及与此相似的就是他的言语与行为，对此皮提亚<sup>②</sup>

---

① 苏格拉底应当由狱中逃走的建议归之于埃斯希内，也归之于克里托。这句荷马诗句的引用见于柏拉图的《克里托》，44B。

② 此处指特尔斐神庙，参看前面的有关脚注。——译者

的女祭司提供了证据,当时她给了海雷封这个有名的答复:

在所有活着的人中苏格拉底是最有智慧的。

为此,他最遭人妒忌;而且特别因为他要责备那些自视甚高的人,证明他们是愚蠢人,根据柏拉图的《美诺》的记载,他确实是那样地对待安尼托的。由于安尼托不能忍受苏格拉底的嘲笑,因而首先唆使阿里斯托芬及其朋友反对他;随后他与人共同说服梅勒托控告他不虔敬和腐蚀青年的罪名。

根据法沃里努斯在《杂史》中的说法,这场控告由梅勒托发动,而控告词由波利欧克图宣读。根据赫尔米浦的说法,控告词由诡辩家波利克拉特斯撰写的;但是有人说它是安尼托写的,蛊惑人心的政客吕康作了所有必要的准备。

安提西尼在他的《哲学家师承记》中和柏拉图在他的《申辩》中,都说有3名控告人:安尼托、吕康和梅勒托;安尼托被激怒了。他代表工匠和政治家,吕康代表修辞学家,梅勒托代表诗人,作为这些不同阶层的代表,他们感觉到苏格拉底尖锐的讽刺。法沃里努斯在他的《回忆录》第一卷中宣称波利克拉特斯对苏格拉底的起诉词不是真的;因为他提到科农重修城墙之事,而此事直到苏格拉底死后6年才发生。这就是理由。

这场讼案的宣誓书仍然被保存着。法沃里努斯在他的《麦特罗昂》中这样说,它的文字如下:“这场控告和宣誓书由庇托斯区的梅勒托的儿子梅勒托宣誓,控告阿罗珀克区的苏福罗尼斯库的儿子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罪是:拒绝承认城邦所承认的神,并引进其它的新的神祇;他还有腐蚀青年的罪。要求的刑罚是处死。”在吕西阿斯为他写了辩护词之后,这位哲学家通读了它,并且说:“吕西阿斯啊,这是一篇极好的辩护词,然而,它不适合于我。”因为它

明显地更多是法庭论辩式的而不是哲学式的。吕西阿斯说道：“如果它是一篇极好的辩护词，那么它怎么能不适合你呢？”他回答说：“是的，不是漂亮的服装和漂亮的鞋子同样不适合我吗？”

太巴路的尤斯图斯在他的名为《花环》的书中说，在审判的过程中柏拉图登上讲台开始说：“雅典人啊！尽管我是所有登上这个讲台向你们发表讲话的最年轻的人”于是法官们高声叫道：“下去！下去！”因此当他被超过主张无罪的 281 票判定有罪时，当法官们估价他应受何种处罚或者他应交纳多少罚金时，他提议交付 25 德拉克马。欧布利德确实说他提出交付 100 德拉克马。当这句话在法官中间引起一阵喧嚣时，他说：“考虑我为公众的服务，我估算处罚应是由公众出钱由城市公共会堂供给膳食。”

死刑以添加 80 票新的赞成票而通过。他被送往监狱，数日之后，在作了许多柏拉图在《菲多》中记载的高尚谈话之后喝下了毒药。还有，据有些人说，他写了一首派安赞歌，它的开头是这样的：

万福啊，阿波罗，得洛斯的大神！

万福啊，阿耳忒弥斯，你们高贵的一双！<sup>①</sup>

狄奥尼索多罗否认他写过这首赞歌。他还写了一篇伊索寓言，不过写得不是很高明。它的开头是这样的：

伊索高声叫道：“你们科林斯人啊！

不要像陪审团法庭裁定那样地来判断美德。”

这样他从人们中永远消失了；过了不久雅典人感到如此悔恨，以致关闭了训练场和运动场。他们放逐了其他的起诉人但是将梅

---

<sup>①</sup> 阿波罗是希腊神话中司音乐、射箭、预言、医药的大神，得洛斯是他的出生地和最重要的祭祀地。阿耳忒弥斯是司生育、健康、狩猎的女神，她被认为与阿波罗是一对孪生兄妹。——译者

勒托处死；他们以一座青铜像来纪念苏格拉底，铜像是吕西波斯的作品，雅典人把它安置在列队行进祈祷的大厅中。不久安尼托访问赫拉克利亚，那个城市的人民当天就驱逐了他。不仅在苏格拉底这桩讼案上，而且也在许多其它的案子中，雅典人都以这种方式表达悔恨。因为他们当荷马是疯子罚了他 50 德拉克马（赫拉克利特是这样说的），据说提尔泰乌斯就在他的身边。他们在埃斯库罗斯和他的兄弟诗人们之前就以一座青铜像来纪念阿斯提达马斯。欧里庇得斯在他的《巴拉麦德》中这样谴责他们：“你们已经屠杀了，已经屠杀了最有智慧的人、天真无辜的人、缪斯的夜莺。”这是一种说法；但是费罗科鲁断言欧里庇得斯死于苏格拉底之前。

按照阿波罗多罗斯在他的《纪年》中的说法，他诞生于阿普色菲昂执政时期。在第 77 届奥林匹亚赛会后的第四年<sup>①</sup> 塔尔盖利昂月的第 6 天，正当雅典人净化他们城市的时候，按照德洛人的说法，这一天是阿耳忒弥斯的诞辰。他死于第 95 届奥林匹亚赛会后的第一年<sup>②</sup>，时年 70 岁。法勒留的德米特里同意这个说法；但是有人说他死时是 60 岁。

苏格拉底和欧里庇得斯两人都是安那克萨哥拉的学生。欧里庇得斯生于第 75 届奥林匹亚赛会后的第一年，在卡利亚得斯执政时期<sup>③</sup>。

我认为苏格拉底谈论物理学以及伦理学，也作一些关于天命的谈话，可是根据色诺芬所说，他只讨论伦理学问题。但是柏拉图

---

① 469—468 B. C.

② 400—399 B. C.

③ 480—479 B. C.

在他的《申辩》中<sup>①</sup>在谈到安那克萨哥拉以及某些其它的物理学家之后,谈到他自己的所长,详细论述苏格拉底不擅长的主题,尽管他把每一件事都借苏格拉底之口说出来。

亚里士多德提到一位从叙利亚来到雅典的术士,除了威胁苏格拉底将遭遇其他厄运之外,预言他会有一个惨死的结局。

我也写过一些关于他的韵文,现录如下:

啊,苏格拉底!在宙斯的宫殿里,痛饮吧!  
因为智慧之神确实宣布你是有智慧的;  
因为当你坦然地饮下雅典人手里的毒药时,  
随着它通过你的双唇,他们自己也喝干了它。

根据亚里士多德在其《诗学》第三册中的说法,他遭到了利姆诺斯的某个安提罗科斯以及预言者安提丰的尖锐批评,正像毕达哥拉斯遭到克罗顿的库隆的批评一样,或者像荷马在生前遭到西亚格鲁的攻击和死后遭到科洛丰的色诺芬的批评一样。赫西奥德也在生前遭到凯尔科普斯的批评,死后受到前面说到的色诺芬的攻击;品达罗斯受到科斯的安菲梅内的批评;泰勒斯遭到菲勒塞德斯的批评;比亚斯受到普里恩的撒拉鲁斯的攻击;皮塔科斯遭到安提梅尼达和阿尔卡欧的攻击;安那克萨哥拉遭到索西比乌斯的攻击;以及西蒙尼德遭到提谟克里昂的攻击。

关于那些继承他并被称为苏格拉底派的人,主要的是柏拉图、色诺芬、安提西尼和传统名单上10个名字,最杰出的是埃斯基涅斯、菲多、欧克莱得斯、亚里斯提卜。我必须首先说到色诺芬;安提西尼则在以后与犬儒学派一起谈;在色诺芬之后,我将谈苏格拉底

---

<sup>①</sup> 26D.



派本身,因此轮到柏拉图。与柏拉图一起开始了 10 个学派,柏拉图本人是第一个学园的创始人。这就是我将遵循的顺序。<sup>①</sup>

关于那些取名为苏格拉底的人,有一个是历史学家,他写了一部关于阿尔戈斯的地理方面的著作;另一个是一位比希尼亚的逍遥派哲学家;第三个是写讽刺短诗的诗人;最后是科斯的苏格拉底,他写下诸神的名字。

---

<sup>①</sup> 本段所谈的“顺序”,乃第欧根尼·拉尔修在他的《名哲言行录》中,在苏格拉底之后的叙述的顺序。——译者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苏格拉底传 ( 英 9 9 1 1 )

作者 =

页数 = 1 9 9

S S 号 = 1 0 3 5 4 8 7 1

出版日期 =